

中国共产党百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辉煌历程和宝贵经验

包心鉴

(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一部党的政治建设史。用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其他各项建设,是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延安整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走好赶考之路”,改革开放新时期注重制度治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调坚持党的自我革命——这几大辉煌节点,生动彰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在百年党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坚持政党属性、坚持政治功能、坚持政治权威、坚持政党使命、坚持总体布局,是在百年历程中积累的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蕴含着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坚守政治立场、严格政治规矩、净化政治生态、铸造政治文化,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根本统领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的历史经验;新的时代要求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成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犹如一条红线,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成为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法宝,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史诗的根本要素。回顾总结百年党史,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推动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强调:“必须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

收稿日期:2022-03-03

作者简介:包心鉴,男,江苏淮阴人,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特邀研究员。

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30} 这些重要论述,是对百年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辉煌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精辟总结,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方向。

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百年辉煌节点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一部党的政治建设史。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点;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是解决突出问题、应对严峻挑战、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根本要求;用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其他各项建设,是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在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有几个重大事件堪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辉煌节点,彰显着党的政治建设的鲜明特色和丰富内涵,浓缩着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和基本规律,蕴含着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 1929 年的古田会议,明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之先河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和指引下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政治使命的政治组织。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3]36-37}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出具体规定,明确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建党原则。^{[3]45}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意识到必须坚持党的政治属性、重视党的政治建设。然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对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一个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重大问题。那时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政治意识淡薄,没有把党的政治建设提到突出位置,不能不说是党内存在种种非无产阶级

思想甚至发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教训和几次武装起义的严重挫折,使党逐步认识到坚持党的政治性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29 年 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2]5} 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统领党和军队建设,开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之先河。古田会议的直接背景是在建设工农红军问题上党内存在严重分歧,以及党和军队内部存在着极端民主化、盲动主义、流寇主义和军阀作风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和军队建设必须从加强党内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抓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4]741}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近三万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案,贯穿一条主线,这就是以思想建党统领政治建军。古田会议的突出贡献是明确确立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向、规定了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于党的政治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而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自身必须坚强有力。正是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建设,不断清除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各种错误倾向,为建设一支自觉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民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建设,厘清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等重大政治关系,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科学化,为如何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和军队各项建设,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二) 1942 年至 1944 年的延安整风,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切入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堪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光辉典范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指出，通过长期斗争和巩固发展，“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和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这个重大任务已经尖锐地摆在了党的面前。为此，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5]603,602}之后不久开展的延安整风，有力推进了这一“伟大的工程”。从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报告和重要文章，突出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主要体现在：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是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立场；坚持和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是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保证；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路径；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是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举措。总之，以延安整风为突出标志和强大动力的党的政治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遗产，为如何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创了正确道路。

（三）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增强全党应对重大考验的自觉，为走好“赶考之路”、打好执政根基做了充分准备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在党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处于重大转折和党面临更大考验的重大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全会。七届二中全会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增强全党应对新的重大考验等重大问题上，确立了若干重要制度，立

下了诸多重要规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充分彰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功能和重要作用。（1）鲜明提出“进京赶考”的重大命题。毛泽东把即将进驻北平，完成新中国建国大业，形象地称之为“进京赶考”，强调一定要考出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进京赶考”论，对于警示全党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应对重大风险和挑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毛泽东的“进京赶考”论，强调指出：“这项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6]28}“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必须顺应时代所问、人民所向，时刻保持“赶考”状态，以优异成绩向人民交出合格答卷。（2）明确发出“两个务必”的政治告诫。毛泽东深刻地分析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甚至会在糖弹面前打败仗。为此，毛泽东鲜明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1438-1439}“两个务必”，既是对党即将取得执政地位后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深刻告诫，又是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具有长久性的政治警戒意义。（3）严格确立党的政治规矩。为了防止被“糖衣炮弹”打倒，力戒骄傲、保持清醒，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六条政治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几条规定，尽管没有写进全会决议，但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率先垂范和自觉坚守，已经成为党的重要的政治规矩，有效保证了全党在和平与执政的新环境中经受考验、保持本色。2013年7月习近平到西柏坡视察，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房子里意味深长地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8]（4）总结凝练党委会工作方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仅需要坚定的原则和严格的规矩，而且需要科学的方法。在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发表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报告，系统阐述

了12条工作方法,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不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方法秘诀。正是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政治规矩,使全党尤其是高中级干部在巨大胜利面前保持了清醒头脑,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确保党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领导力量方面作出开创性历史贡献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开启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新征程。新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鲜明特点是,紧紧抓住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这两大基本环节,深入推进以清除官僚主义弊端为主要任务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着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9]145}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长期积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深重影响,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邓小平深刻指出,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机构中存在种种问题的“总病根”;官僚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压制民主,侵害人民民主权益;官僚主义现象的总根源,就是特权思想和特权制度。邓小平特别强调,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严重官僚主义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333}因此必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任务。

在高度重视制度治党、着重从领导制度改革的层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同时,邓小平还特别重视发扬党的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着重从思想作风层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重新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10]382}“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9]114}二是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9]365}要“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

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10]38}三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0]147}“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0]382}四是严格加强党的纪律。“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善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9]147}五是端正党的作风,坚决惩治腐败。“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9]178}“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0]372,379}

正是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加强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为突出标志的新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使党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五)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根本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全面从严治政为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的。正是由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高度政治自觉,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坚定政治决心,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政治态度,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坚强政治勇气,正风肃纪、反腐倡廉,以铁的纪律和规矩加强对权力的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党才有效改变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从而紧紧团结和依靠人民开创了新时代,意气风发走在时代前列。

勇于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进伟大工程的鲜明特色和根本之点。在领导伟

大社会革命中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用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党品质和治党逻辑,也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特殊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确保这一政党性质和政治本色,党必须时刻警惕,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他特别强调:“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1]这一重要论述,令人警醒、发人深思,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核心价值指向。历史和现实再三警示中国共产党,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慎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必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自己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延安整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走好赶考之路”,改革开放新时期注重制度治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这几大辉煌节点,生动彰显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在百年党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

作用,深刻蕴含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基本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迪和鲜明的实践指向。

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遵循。

第一,坚持政党属性。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从根本意义上说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政党是特殊的政治组织,政治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以谋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无产阶级政党,尤其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政治属性,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政治属性是党组织的根本属性,政治功能是党组织的基本功能,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强化各级各类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11]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决不能放弃政治。《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293}恩格斯在回应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要求工人运动“放弃政治”的欺骗宣传时明确强调:“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当作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斗争的最近目的。”^{[13]123,201}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政治性质的团体”。“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

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入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入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14]305-306} 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15]

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特殊的政治实体，肩负着特殊的政治任务和政治使命，有着远大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讲政治，既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传家宝，又是党的突出特点和本质特征。为了维护和彰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和发挥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尤其是新时代新任务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加强党的全面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正如习近平明确强调的，“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16]“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15]

第二，坚持政治功能。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还是由政治的独特功能决定的。政治是什么？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家和理论家对“政治”作出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诠释具有经典意义。列宁深刻揭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17]302}“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18]407} 这些精辟论断，为深入回答为什么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怎样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和逻辑依据。其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具有深刻的统领性和引领性。作为处于国家政治生活核心领导地位、深刻影响着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有坚定不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增强党的各级领

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定力，提高全党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别力，注重从政治的高度认清形势、应对挑战、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才能确保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正确前进方向，推动经济社会朝着有利于国家富强繁荣和人民幸福安康的宏伟目标顺利发展。其二，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政治的根本功能是确保国家运行的正确方向。国家问题是“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19]42}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政治功能，就是确保国家沿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方向运行，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并时刻警惕和消除国家脱离社会、沿着反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运行的状况。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进国家发展的根本价值指向。其三，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凝聚民心、造福人民。政治的基础在民众，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习近平精辟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6] 这是对一切政治现象的最合理解释。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坚持政治的人民性，强调必须坚持人民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就是党的立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归根到底“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5] 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过程中凝聚起伟大的民心力量。

第三，坚持政治权威。

正确认识和强调领导核心和政治权威在政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20]375} 列宁深刻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21]225}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在伟大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权威，对于确保党的前进方向、巩固党的集中统一、壮大党的领导力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政治权威、维护领导核心，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发挥政治统领作用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路线“左”右摇摆，党的事业屡遭挫折，根本性原因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党内没有一个坚强有力、众望所归的政治权威。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扭转中国革命被动曲折的局面，根本性原因就是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果断开创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并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性原因就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邓小平在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历史经验深刻表明，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事业胜利，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权威，必须要坚定维护政治权威的核心领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发展面临复杂情况的形势下果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确立了习近平在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确保党和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确保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品质，具有长远性决定性意义。

第四，坚持政党使命。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政治建设之所以成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根本依据和内在逻辑。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贯穿党百年奋斗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各个发展阶段得以充分彰显和不断升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实现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基础上继续奋斗、踔厉奋发地走向强起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履行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实现党的百年目标和伟大梦想，靠什么？归根到底要靠党的政治引领这一核心力量，要靠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根本建设。实践反复表明，能否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能否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揽，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就是通过坚定不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就是通过坚定不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确保党担当新作为、展现新气象，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时代先锋、人民楷模、民族脊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这就是通过坚定不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道路，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总之，党的政治建设贯穿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各个方面，决定着或影响着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进程与质量，是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全局的一项根本性建设。

第五，坚持总体布局。

从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高度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上的新理念

新实践。着眼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布局和总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坚持一个原则，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统一；贯穿一条主线，即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与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有机统一；坚持一个统领，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打牢一个根基，即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把握一个着力点，即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完善一个体系，即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抓住一个关键，即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实现一个目标，即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坚持思想建党、强化制度治党、严格纪律强党、落实质量兴党，并将这四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不啻是基础工程。而这四个方面，从本质上说都是政治建设，都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

坚持思想建党，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价值。思想是政治的灵魂，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党的思想建设为引领。从政治的特有内涵和思想的根本功能来说，思想建党本身就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加强思想建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践行群众路线、扭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这个“总开关”，这些都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都必须融入党的政治建设全过程。

强化制度治党，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保证。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特征，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制度既是一种基本架构，又是一种行为规范，同时还是一种心理约束；对于党的整体来说，优良的制度是使党的组织得以正常运行并取得良好工作效果的根本支撑；对于党员个体来说，优良的制度是使党员、干部的积极因素得以充分调动、消极因素得到有效抑制的不可欠缺的强制性力量。这正是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治党中为什么要更加突出强化制度治党、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起来的内政治逻辑。

严格纪律强党，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纪律严明、步调一致，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特殊政治组织的鲜明特征，是党具有强大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尤其是政治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把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光荣传统，是立党兴党强党的关键要素。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尤其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重要位置，用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规矩确保党的政治本色，确保党永远坚强有力。

注重质量兴党，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党员队伍质量决定党是否具有先进性和战斗力，乃至决定党的生命。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纪律强党，归根到底要落实到质量兴党上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是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 9500 多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22]“大的样子”，就是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自觉甘做忠诚为民的公仆。做到这一点，既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容，又是判断党的政治建设卓有成效的根本标准。

以上五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蕴含着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必须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新的时代要求

历经百年锤炼、创造百年辉煌的中国共产党，意气风发带领全国人民踏上了新征程。《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

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2]无论是党走过的辉煌历程，还是党面临的伟大任务，都深刻表明，百年大党要永葆青春风华，团结带领人民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进一步揭示历史规律、传承历史经验、把握历史主动，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根本统领作用，通过持之以恒的党的政治建设，使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坚定政治信仰、坚守政治立场、严格政治规矩、净化政治生态、铸造政治文化，确保党始终走在前列、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始终充满青春活力。

（一）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人皆有政治信仰，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人应当信仰什么？中国共产党是有崇高政治使命和远大政治目标的先进政党，崇高的政治理想和远大的政治目标，是立党兴党强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坚定政治信仰既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内容，又决定党的政治建设的方向。现实生活中，党员政治信仰问题，还是一个亟待高度重视和深入解决的突出问题。一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不信明规矩信潜规则，乃至信仰缺失、信念泯灭、信心丧失，由此导致种种消极行为乃至腐败现象。现实问题表明，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首先必须解决好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信仰不坚定，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23]80-8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永不动摇，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所在，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充满生机活力所在。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24]7}“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6]7-8}

坚定政治信仰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重点在于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坚定理论信仰。坚定的理想信念来自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来自对科学真理的自觉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把握真理、夺取胜利的强大理论武器和根本思想遵循。党的百年奋斗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5]13}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尤其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前进方向。二是坚定理想信仰。永远保持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永远保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梦想和远大目标的执着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精神境界和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就是因为它既占据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社会美好目标的道义制高点，又坚守着人类社会变革与发展基本规律的真理制高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梦想和奋斗目标，就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宏志夙愿和执着追求，集中彰显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不变主题。在当今时代、当代中国，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坚守民族复兴伟大梦想，集中体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执着追求和不懈奋斗的伟大成果，是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定“四个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懈奋斗，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政治信仰的最本质体现。

（二）加强党的政治立场建设，牢牢站稳人民立场

立场决定感情，立场决定态度。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政治立场是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既是阶级的政治组织，又是人民群众的政治组织。这一特殊性质决定，加强政治建设、站稳政治立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有机统一。一切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首先要站稳党的立场，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服从党的组织，始终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站稳党的立场与站稳人民的立场是有机统一的，这种统一，集中表现为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党性是人民性的最高体现，人民性是党性的根本基础。党的百年奋斗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25]11}一切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都必须把坚定的党性原则融化在坚定的人民性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作为行为准则。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起来，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出发，崇尚实干、勤政为民，把履行党的执政使命融化到为人民谋利益的具体工作和实际行动中去。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

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5]12}这“三个从来不代表”，不啻是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的最大底线，是加强党的政治立场建设必须时刻坚守的最基本原则。

政治立场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紧密相连，政治立场不稳，突出表现为“四观”不正。习近平反复告诫全党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是“总开关”，“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26]94-95}因此，“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27]65}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根本的就是要自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最根本的就是要正正派派做人、清清白白做事；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最根本的就是要以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为最大价值追求；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最根本的就是要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是人民的意志，自觉用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决不以权谋私。

（三）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严守党的政治规矩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中国共产党是按照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一个松散的社会团体。党的百年历程深刻表明，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是维系党内团结、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本原则。习近平突出强调严守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特殊意义。他明确指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坚守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27]116}

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党的政治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和鲜明的问题导向。由于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内一度存

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守政治规矩现象：在政治立场方面，突出表现为不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在党内团结方面，突出表现为搞“团团伙伙”，拉山头、结小圈子、搞宗派主义，乃至形成一定规模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党内关系方面，突出表现为缺乏党的意识、组织意识、程序意识，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任人唯亲、任人唯派，搞人身依附；在处事规则方面，突出表现为不按党的规定规则办事，而是热衷于按“潜规则”做人行事；在作风形象方面，突出表现为“四风”盛行，尤其是官僚主义严重、形式主义猖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重要会议和重要场合列举了如此种种不守政治规矩的突出表现，通过持之以恒的从严治理，现在情况已有所好转，但其政治危害性和顽固反复性不可低估。许多事实尤其是不断发生的领导干部消极腐败案例表明，党的政治规矩是党员、干部的政治底线，一旦逾越政治规矩，突破政治底线，他们就必然要走向错误乃至腐败；党的政治规矩是维系党内团结、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政治生命线，一旦规矩松弛，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必然会危及党内团结，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损害党的先进性乃至党的生命。

党的政治规矩包括丰富内涵，主要是四个方面：党章是党的政治规矩的核心内容，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总规矩；政治纪律是政治规矩的重要体现，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是党的政治规矩的政治保障，是党员、干部必须自觉遵守的政治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被实践反复检验行之有效的政治规矩，必须坚决传承和弘扬。严守政治规矩，尤其需要大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26]188}要强化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形成尊崇制

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27]111}

（四）加强党的政治生态建设，确保党内风清气正

政治生态是指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政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大体区分为政治内生态和政治外生态。政治内生态是指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政治外生态则是指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生态联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使命决定，党内政治生态是否健康、优化，不仅对所有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且对其他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系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因此，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的政治建设，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切实充盈正气、扼制邪气，切实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用持之以恒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习近平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用了“净化”“优化”“修复”等概念，从不同层面表明解决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突出问题和营造风清气正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所谓“净化”，侧重于“破”，这就是要坚决破除因党内政治生态被污染而产生的种种突出问题；所谓“优化”，侧重于“立”，这就是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政治监督，提升党内政治生态的优质度；所谓“修复”，则是针对少数高层腐败分子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党内政治生态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而言。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包含，“净化”之中有“优化”，“优化”必须以“净化”为前提；而无论是“净化”还是“优化”，都有一个“修复”乃至“重构”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重大任务。

政治生态与政治生活密切相联。党内政治生态能否优化，决定于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着力

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政治生态与政治心态密切相关。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一个突出任务是不断矫正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心态。事实表明,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少数腐败分子的灰色政治心态,是造成一些地方和领域政治生态被扭曲、被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权力私有心态,“权力为我所有,我可为所欲为”;地位特殊心态,“我是一把手,特殊一些理所应当”;物欲攀比心态,“别人有的,我也应该有”;掩耳盗铃心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出问题”;消极应付心态,“宁可不干事,也保不出事”“干事越多,风险越大”……正是如此种种扭曲的、灰色的政治心态,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从起初的小心谨慎到后来的肆意妄为,从开始的担心害怕到后来的心安理得,从开始的不作为到后来的乱作为,一步一步滑向腐败的深渊。深刻的教训警示我们,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既要注重制度治党,又要加强思想建党,不断矫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心态,加强政治心态修养,切实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

(五) 加强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的重要活动及其精神成果。文化的根本功能,一是“文以载道”,文化承载着真理并阐释着真理;二是“以文化人”,文化的根本功能在于教化人、培育人、发展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人类的政治活动及其形成的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更高层次意义的文化形态。政治文化主要包括:(1) 价值文化——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价值;(2) 行为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关系、政治生态;(3) 制度文化——制度体系、体制支撑、运行机制;(4) 精神文化——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动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在百年艰难历程和伟大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党的性质、宗旨、目标和凝聚力、影响力的集中体现。精神是文化的精髓,党内政治文化,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

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25]⁸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是形成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党内政治文化的精神动力。

党内政治文化包括丰富内涵,具有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优秀的政治文化,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是培育党内政治生态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之“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入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哲理,渗透着“修齐治平”的政治智慧,彰显着推进当代中国发展乃至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难题的重要启示,反映着中华民族独特而悠久的历史和精神世界和坚定执着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从而使之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党内优良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根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之“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斗争中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突出体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追求的有机结合。这种扎根人民、志向高远的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屡遭曲折而不懈奋起、历尽苦难而走向辉煌的深层精神文化因素,构成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之“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价值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一“主题”,也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对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22 (1).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3]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6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7]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8]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N]. 人民日报, 2013-07-14.
- [9]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10]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2019年1月31日)[N]. 人民日报, 2019-02-28.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N]. 人民日报, 2018-07-01.
- [16] 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N]. 人民日报, 2016-05-03.
- [17]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8] 列宁文稿: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 [19] 列宁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1] 列宁全集: 第1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22]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N]. 人民日报, 2017-10-26.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24]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2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 郭彦英]

Glorious Journey and Precious Experie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Work over the Past Century

BAO Xinjia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250022)

Abstract: The 100-year history of CPC is essentially a history of political work of the Party. The guidance of all the other works by political work of the Party guarantees the development of CPC from success to success. Gutian Conference establishing the principle of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political army building”,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promoting the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nes, the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7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ing “two musts” and “progressing on the new journey of examinati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ocusing o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and the Party's self-reform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l these key periods exhibit the crucial status and role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building in its centenary history. The exercising of political party's nature and vision, its political function and authority, and the integrated plan i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work on the journey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the embedded logic of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On the new journey for a new era, we must commit to political belief, stance and discipline, purify political ecology, creat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building for the new great project.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s political building;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Party's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for a new era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杨根乔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自我革命”凝练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深刻揭示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员人胸怀千秋伟业的使命担当,为党在新时代深化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坚持运用党长期奋斗形成的这一宝贵经验,必须准确把握和深刻领悟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强化思想引领,站稳人民立场,发挥“头雁”作用,完善制度机制,不断将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的根本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永恒课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把“坚持自我革命”凝练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全面诠释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深刻揭示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员人胸怀千秋伟业的使命担当。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坚持和运用好党长期奋斗形成的这一宝贵经验,对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党的自我革命的精髓要义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永恒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和优良传统。《决议》指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

收稿日期:2021-12-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反腐败战略思想及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BKS1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根乔,女,安徽潜山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等。

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这一表述不仅深刻阐释了自我革命作为主线始终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之中,而且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部署、实践成就和宝贵经验。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准确把握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这是我们学习领会《决议》中“坚持自我革命”这一党长期奋斗形成的宝贵经验时首先要把握的基本观点与核心要义。同时,我们还要深入把握自我革命的责任主体、方式方法、基本原则、制度支撑、价值追求、目标指向等重要和基本问题。

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自我革命,是主体把自身作为革命的客体与对象,在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中,实现变革与提升自身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着力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2016年,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2017年,他在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时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3]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重申:“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4]2019年,他又集中论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成果。2021年,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5]的要求。从这些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党的自我革命蕴含着三层深刻内涵:从全面深化改革看,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勇于冲破和敢于突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从全面从严治党看,必须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解决好长

期执政条件下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与自我监督问题,把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社会革命看,党要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推进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和善于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永葆青春活力。

自我革命的责任主体。革命是主体“革”客体的“命”,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6]根据“自我革命”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自我革命的主体与客体,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而不能是特殊利益集团,也不能是其他什么政治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7]必然承担着自我革命的主体责任。要把党的自我革命引向深入,各级党组织就要把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的责任履行好,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党员干部队伍;广大党员干部就要将党员义务履行好,不断践行初心与使命,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自我革命的方式,是“破”与“立”的辩证统一。既有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这一革故鼎新的“破”,又有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这一固本强基的“立”。^[8]通过自我革命的“破”与“立”,党能够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纠正偏差、弥补不足,推动党的事业与党自身建设的不断创新,从而达到整体性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之目的。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法并且始终贯穿于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决议》指出:“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1]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永葆党的肌体健康、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的有力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7]

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方向和效果相统一。自我革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为了实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目的。同时,要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以革命性的自我改造,克服和解决党自身存在的

足与问题,增强党的生机活力。二是坚持继承和創新相统一。必须一以贯之地传承党在百年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同时又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党的自我革命理念、机制和方法。三是坚持全面和重点相统一。必须将新时代党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的新要求,覆盖到各级领导干部和每一位党员,同时又要抓住关键和重点,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上率下,争做自我革命的先锋与模范。四是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统一。自我革命既要发挥各级党组织严格教育、管理与监督党员干部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激励他们严格自律,增强政治免疫力。^[9]

自我革命的制度支撑。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的组织和政治纪律,也是党不断修正错误、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六大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三条根本原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对民主集中制作了深刻阐述,指出“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0]1057}邓小平也曾鲜明地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1]17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加以明确,为在新时代常态化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我革命的价值追求。以人民为中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取向,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坚持人民立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党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党和国家制度更加健全完善,党才能实现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的目的。只有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党才能检视自身不足,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实现自我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党在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

进行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过程,^[12]只有坚持人民立场,党的自我革命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在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否解决到位,人民群众最清楚;党的自我革命是否有成效,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党才能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自我革命的目标指向。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本质就是党通过自身革命性锻造,不断修正错误、克服自身缺陷,使自身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强大战斗力与旺盛生命力。从党的百年历史看,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与时俱进的,其内涵与要求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迁以及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党进行自我革命,既促进了党员提升党性修养,实现由党员个体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向党的整体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飞跃,又推动着党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世情国情党情变化,始终保持强大定力,有效应对自身面临的各种风险与考验。

二、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决议》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辉煌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揭示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逻辑和深邃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就必须勇于自我革命。这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当前,党自身建设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勇于自我革命是党应对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鲜明的本质属性。这一本质属性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以革命批判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不断进行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探索实践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本质属性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不断革命”的口

号,认为共产党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13]171}强调共产党人只有在革命斗争中才能改造自己。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14]351}他认为,“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并由此强调“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14]352}可见,勇于坚持真理、坚持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必然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历史洪流中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始终充满生机、具有强大创造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理想,就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毅力,敢于直面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党内一切不良现象作坚决彻底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自我批判性和革命自觉性基因,并将其深深融入到党的肌体和血液之中。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智慧凝练。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百年来,党始终坚守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用实际行动诠释勇于自我革命的誓言。建党之初,党就通过“自清门户”的方式同党内无政府主义者展开坚决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把在党内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写进党章。之后,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八七会议及时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方向,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运动是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一次自我革命,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又使全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与自我革命精神,适时地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的坚强决心与鲜明态度,把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深刻融入到新中国政权体系和政权建设中,采用整党整风、“三反”运动方式,营造了从严治党、清廉治国的良好政治风气。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党内部搞好,要求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在改革中纠正错误、在纠正错误中不断前进。江泽民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号召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将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不断推向前进。胡锦涛要求全党“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15]155}使党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精神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由此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历史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

中国共产党履行新时代历史使命的战略选择。

继往开来、接续奋斗,不断付出更为艰巨与艰苦的努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履行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其实质就是进行“两大革命”——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在统揽“四个伟大”中,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党要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就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从严管党治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6]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自身及党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带来深刻影响,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从国内看,当前我国已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以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党就会落后于时代,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削弱。从党内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而复杂、尖锐而严峻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已解决的问题可能

有些还会反弹，新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当前，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要统揽“四个伟大”，就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拥有善于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坚决消除一切不利因素和有害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

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要全面落实《决议》要求，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充分运用并不断发展党的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强化思想引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使自己不断强大的关键原因，就是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断推进理论的传承和创新。为实现救国、兴国和强国的梦想，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寻找“主义”、坚持“主义”、发展“主义”、创新“主义”的过程，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伟大思想以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一系列历史性开创性重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引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思想，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思想，也是照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思想灯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历史决议的形式郑重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并用“十个明确”进一步对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系统概括，为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思想指导和根

本遵循。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准确把握这一伟大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的政治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用信仰信念铸就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不断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站稳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血脉、力量在人民，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党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和底气所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必须站稳人民立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党的百年历史启示我们，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充分信任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植根于民，服务于民。从长征路上的红军鞋，到淮海战役的小推车，从小岗村村民的红手印，到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正因为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衡量标准，才能不断将人民的力量激发和凝聚成为改天换地的历史伟力，党的自我革命才有了最坚强的支撑。新时代党要协同推进自我革命和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就仍然要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对的、发扬好的，有缺点、有问题就克服缺点、解决问题，有错误就承认并纠正错误，“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1]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确保党始终成为推进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发挥“头雁”作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领头雁”。党的自我革命需要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形成“头雁效应”。一是要做深学笃行的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做实，在“知”上狠下功夫，在“行”上表里如

一,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提升运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与水平。二是要做“两个维护”的表率。《决议》作出了“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1]的重大论断。要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融入血脉、付诸行动,在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与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落地。三是要做一心为民的表率。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走好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到行动上,多为民办实事,多建民心工程,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更好满足。四是要做清正廉洁的表率。要严守廉洁自律规定,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要抓班子带队伍,涵养培植好家风,管好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切实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公仆本色。

完善制度机制。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途径。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党的百年历史经验表明,以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强化思想引领机制建设,突出制度和纪律建设。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一要健全完善党内制度。着力从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组织制度建设等方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以制度保障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培植为民情怀。二要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立健全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以及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法规遵循和制度合力,切实提高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三要形成长效机制。坚持和完善学习与遵守党章的制度,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和组织生活会制度,总结提炼党内主题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

度形式加以固化并长期坚持下去,形成符合实际、管用有效的长效机制。四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用严明纪律维护制度的权威,完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杜绝执行制度时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确保制度落实落地。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
- [2]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N]. 人民日报,2016-07-02.
- [3]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 人民日报,2017-10-28.
- [4]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N]. 人民日报,2017-10-26.
- [5]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J]. 求是,2021(7).
- [6]甄占民,唐爱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系统构建[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6).
- [7]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N]. 人民日报,2016-05-03.
- [8]本报评论员. 勇于直面问题 不断自我革命[N]. 人民日报,2019-01-14.
- [9]赵绪生. 为什么新时代还要强调自我革命[N]. 学习时报,2021-04-09.
-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2]王公龙. 自我革命的理论资源[N]. 文汇报,2018-02-28.
-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胡锦涛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6]颜晓峰. 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创新实践[N]. 解放军报,2018-02-07.

[责任编辑 张 华]

(下转至第63页)

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与其共同体思想的内在关联

——兼评 40 余年来学界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论争

胡为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第 24 章结尾处论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中国学界对此已论争 40 余年。要真正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仅要懂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更要懂得马克思的哲学和共产主义思想,明白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根本主张。马克思提倡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他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一说与其共同体思想具有内在关联性。这既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也要参照现实样本来分析论证,同时还应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重视对《资本论》译文的修改建议。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第 24 章“所谓原始积累”结尾处论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981 年中国学界将之作为论题提出后,已发表讨论文章 1600 余篇,涉及该论题的著作有 2272 本。学者戴道传 1993 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之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研究》一书,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视为一个极难破解的问题。至 2021 年,对该问题的探讨仍在继续。曾有学者梳理,有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的解读已有 11 种:(1) 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2) 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3) 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4) 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综合占有;(5) 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及其产品的完全占有;(6) 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7) 作为社会主义补充形式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8) 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私人所有制;(9) 个人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是一种理想的“纯粹的”典型形态,是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10) 个人所有制即现今的股份制;(11)

收稿日期:2022-02-01

作者简介:胡为雄,男,湖北通城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个人所有制是与民主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所有制。^[1]检视这些观点后发现,有些提法本身就不正确,这主要是因为其研究方法不正确。有的论者,只利用新译本中意译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而未关注郭大力、王亚南译本按原文表达译成的“建立个人所有制”;并且只聚焦于这一概念,而忽视它在整个段落中的意义。实际上,《资本论》德文第三、四版相关句段已增写了“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接下来的表述才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个人所有制”,意思清楚而完整。而人们的致思方向却局限在“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一种怎样的所有制这一狭窄道路之上。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一些论争者在知识结构上有一定缺陷,未能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只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去理解、解释马克思,难以与马克思的视界融合。要真正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仅要懂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更要懂得马克思的哲学和共产主义思想,在融会贯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明白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根本主张。马克思提倡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他设想每个社会成员以共同体的方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分享生活资料,因此社会中不存在人剥削人的现象,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平等。

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他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一说与其共同体思想具有内在关联性。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就不能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主张,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个体结成共同体或联合体是实现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而人类解放,是指工人阶级经历政治解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将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有之后,极大地发展生产力,让集体财富之源充分涌流,社会每个个体在共同体中充分享有属于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成为“自由的人”并结成“联合体”,各自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自然界和社会中获得自由,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是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在更高水平上的复活。

笔者认为,只有在指向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学说整体视野之下,只有紧密联系共同体思想,才能准确理解和解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不再纠结于它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还是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如果没有关于人类解放的大视野,不了解共同体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必定成为难解之说。

本文检视了中国学界40余年来关于此问题的论争过程,挈其瑰宝、绝其淄磷,试图把一些有价值的论点采摘出来,以作为完成真理性解释的前提。当然,更重要的是细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在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解析“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实践家,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我们在研究时,须将《资本论》置于其产生的19世纪西欧社会环境中,了解马克思对西欧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对人的生命活动的理解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尤其是关于个体与共同体或联合体关系的理论来加以论证;同时参照现实样本如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夫”等实践案例加以论证,克服只从字句到字句进行论说的弊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让问题变得更清晰、结论更具真理性,以达成共识。当然,我们也应从语言学角度重视对《资本论》中译本词句的争论与改译建议,更精准地翻译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结束无休止的论争。

一、对同一文本的截然不同的解释

40余年来,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出现了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两种解释:一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二是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当然,人们肯定公有制是其大前提。参与论争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戴道传、卫兴华、王启荣、王成稼等。前两位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论者,后两位是“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论者。

1981年,戴道传在《论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一文中提出,“马克思本意上的个人所有制,则应是劳动者个人对于生产资料的联合占有制。

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是对立同一的”。他先是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的一段经典话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他进而指出：对于马克思的这个著名论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把它解释为是指生活资料的。列宁又进一步肯定了恩格斯的解释。这样一来，人们便习惯性地吧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看作是指生活资料的。然而，由于生产决定分配，马克思一般都不在所有制意义上讲消费品或生活资料，通常只是在分配意义上讲它们。就连恩格斯所列举的，马克思在其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中讲到的消费品也是从分配的意义上讲的。他认为，“不能以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分配，来说明马克思从另一个角度讲的‘个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资料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和他论述‘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还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正指明了个人所有制与私有制的本质区别”。^[2]戴道传最后还联系中国社会现实来说明个人所有制的理论意义。

戴道传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论在当时属于新见解，但并不孤立。同年，梁万成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人人都有一份的个人所有制”。^[3]

但这种论点遭到了多数人的反驳。1982年，王启荣发表《评〈论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一文，提出“戴文所作的解释是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原意的”。“马克思说的个人所有制决不是指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仍

然要建立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则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岂不变成一句空话？”“从《资本论》总体思想而论，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总体而论，马克思是决不可能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的。”“马克思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产资料，而是指消费资料。”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正指明了个人所有制与私有制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一个阶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所有制，都不能是生产资料，而只能是用于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用的消费资料。“马克思说：‘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由此可见，马克思本人对他的‘个人所有制’的解释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仅就这一点来看，我们也无论如何找不出恩格斯和列宁的解释有丝毫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地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辩证法。否定的否定》一节中，对马克思这段话作出的解释，是经过马克思同意的。”王启荣接着引用了《反杜林论》中的“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等话语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还提出，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财产，“不是如戴文说的什么劳动者个人联合所有的财产”。^[4]

同年，刘晓铎也发文对戴道传的观点进行反驳。他认为，“戴文不同意恩格斯的解释，从四个方面（包括从德语字面的解释到否定之否定规律）论证马克思的本意。按照戴文的解释，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而是指生产资料的。这种解释显然不正确”。对于恩格斯紧接着引述的马克思关于“联合体的总产品”“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等关键的话，戴文“避而不谈”。^[5]

戴道传、王启荣等学者之间的论争，拉开了这场历时40余年的论争的序幕。他们的文章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的论争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戴道传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中国《资本论》

研究会发函邀他出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

之后，“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论者不断发表文章并形成影响。1990年，王成稼发表《正确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一文，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先是引证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部分论断”，即《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述和另一处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总产品被分配为生活资料的论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个人所有制所作的解释及列宁的话，强调“重建个人所有制讲的是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在反驳不同观点时，王成稼引述了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话，指出“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个人所有制’和‘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二者等同起来”，并认为有的同志“把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误解为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从而混淆了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的不同的性质。并且，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提出，应该把重建个人所有制作为改革的理论模式，那就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6]

继之，王成稼又在《再论正确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兼答马德安同志》一文中，针对有关商榷意见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他先说明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重要意义，继而谈了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的区别，提出要对占有对象、占有主体、分配前和分配后的不同、劳动者社会地位的二重性进行区分。他指出，“集体中的生产者具有二重地位，一方面处于社会成员地位，另一方面处于私人地位。从劳动者处于社会成员地位来看，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从其处于私人地位来看，‘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7]“如果不区分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及其所包括的不同的物质内容，就会在逻辑上陷入杜林的‘混沌世界’。”在阐述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的关系时，他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构成的生产关系的总体着眼，指出“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既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而产生的结果，又是公有制借以体现自己的条件”。最后，他强调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7]

此后，王成稼还发表了《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辨析》（《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论“重建个人所有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兼评谢韬、辛子陵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试解》（《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错误观点和错误翻译的几个问题》（《经济纵横》2009年第2期）等文章，继续阐发自己的观点。

王成稼的观点遭到卫兴华的反驳。从2008年开始，卫兴华撰文与王成稼商榷。卫兴华认为，王成稼的《论“重建个人所有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兼评谢韬、辛子陵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试解》一文对“‘重新建立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的诠释论证无力”，其“论断与马克思的原意相悖。否定的否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趋势，阐明资本主义所有制否定了个体劳动者的所有制，在发展中又将被社会主义所有制所否定，这是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否定的否定”。卫兴华指出，王成稼提出的其他论据也难成立。第一个论据是，《资本论》中设想了一个联合体，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这一部分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但“任何社会生产的生活资料都是由社会成员消费的”，“不能由此证明，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所讲的‘否定的否定’，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指重建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第二个论据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驳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时，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进行的解释。“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恩格斯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解释并不符合原意”，“解读马克思，还得以马克思自己的原意为准”。第三个论据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极其明确的说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但“马克思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问题。由于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每个人向社会生产提供的只能是劳动，从社会领取的只能是个人的消费资料”。“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劳动者，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卫兴华还指出，王成稼的文章本是着重批评

《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一文的，但存在理论是非不清的问题。王成稼“先说谢、辛二位作者‘试解的思维路线仍然没有走出杜林强加给马克思的混沌世界’，接着又说‘二位先生的试解，肯定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和强调个人所有制的重要意义，这是对的，比有些学者和翻译家把作为基础的公有制曲解为共同使用，把个人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即把个人所有制与决定它的基础或前提混同起来，要强得多’”。而谢、辛二位先生恰恰是高度肯定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理论，是要运用这一理论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至于他们理解和批判的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怎么能说他们二人与杜林一样，强加给马克思混沌世界呢？”^[8]此后，卫兴华与王成稼又有两次理论交锋，主要还是围绕经典作家的话语展开。

卫兴华后来发文强调，“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相统一，讲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是从社会整体即‘共同体’着眼；讲个人所有制，则是从组成为‘共同体’的每个劳动者个人着眼。每个劳动者都是所有者集体中的一分子，都是与公有制利益相关的主人翁。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共同利益不能实现为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就不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有制。如果国家所有制名为全民所有制，但与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无关，国有经济的发展不能惠及广大劳动者个人，就徒有‘全民所有’其名”。这里卫兴华已涉及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可惜他未进一步对此问题展开论述。他还特别指出，“不能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绝对准确”。^[9]

从总体上看，参与论争的学者很多，但基本分属两大派别，其说法也各有差异。例如，胡钧属“生产资料公有制”论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所有制关系。“马克思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不是个人都握有自己支配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是联合起来所有个人都握有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10]280}

然而，无论是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解释成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还是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相关论争似乎都没有澄清杜林“强加给马克思的混沌世界”。这是为什么？

二、马克思“深奥的辩证法之谜”其实是共同体思想，应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来解读“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谈辩证法的“否定的否定”时，引述了杜林对马克思用“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说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会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攻击：“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为事实的逻辑提供根据……马克思先生安心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在对杜林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时，恩格斯称“处于这个‘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11]137}对于“混沌世界”，恩格斯进行了解释：“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还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11]138}恩格斯在这里确实不是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出发来解释问题的，而是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其成员需分配生活资料，故而不经意间把“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留了下来。由此，中国学界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论争了40余年，对杜林的“混沌世界”却仍未予澄清。而症结就是论争各方都存在一个理论盲点——不重视或不了解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不了解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如果把握了共同体思想，就既可以正确理解和解释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意涵，亦可以较易澄清杜林所说的“混沌世界”，破解马克思“深奥的辩证法之谜”了。

马克思一生未留下有关共同体的专著，但共同体思想贯穿于他的许多著述中。他在青年时期深

受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有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情怀。纵观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他对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的说法基本上是连贯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53}这里,他们提出的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就是共产主义共同体。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为何会“发生完全的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形式一旦消除,“结果就会是他们社会地占有而不是作为各个私的个人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13]386}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如果合作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14]158,159}

以上,马克思对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对联合体,已经作了说明;但对个体与共同体或联合体的内在关联,对个体生活方式和生活资料则没有作说明。共同体思想是一个超越政治经济学范畴,与人类解放与自由发展相关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借助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知

识,并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具体关系着眼,才能让“个人所有制”问题变得明朗。

对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他在论述古代人类的所有制状况时,追溯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原始部落共同体。他指出,“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做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13]124}这种“个人所有制”不是个人私有制而是个人共有制。这种原始的共同体是人们共居共生形成的群体,其个体离不开共同体。只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个体才能生存,并在劳动中生产共同体的财产。也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得到基本的温饱。

1877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它为马克思了解原始的共产制生活方式提供了材料。马克思在1880—1881年研读该书时,关注并摘录了“普那路亚家庭”一章中的这些话:“共产制生活方式看来是起源于血缘家庭的需要,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继续存在,而在美洲土著中继续存在于对偶制家庭中,一直实行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15]359}在阅读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时,马克思摘录道:“蒙昧人的财产是微不足道的”,蒙昧人“占有的对象很少,没有占有欲;没有现在这样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心灵的贪欲”。“土地归部落公有,而住房则为居住者共有。”^{[15]380}这里的“公有”与“共有”都是以共同体为前提的,“共产制生活方式”不过是各个个体的共同生活方式;个体没有占有欲,但是享有自己的一份生活资料。

通过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可以看到他获得了崭新的古代人类历史知识:氏族,人类原始群体的劳动方式,原始所有制;两性结合的方式,人本身的生产;财产的简陋,无贪欲的财产观;等等。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则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该书为马克思丰富自己的天然的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极好材料。

马克思关注氏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在《易洛魁人的氏族》一章中，他注意到了氏族内部的十种权利与义务，即选举酋长和酋帅的权利；罢免酋长和酋帅的权利；不在氏族内通婚的义务；相互继承已故氏族成员的遗产的权利；互相援助、保护和代偿损害的义务；给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收养外人加入氏族的权利；氏族宗教仪式中，没有居首职的人，也没有僧侣等级的任何特征；氏族成员有一处共同的墓地；氏族会议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马克思特别注意到氏族的根本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易洛魁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人身自由的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特有权利和个人权利方面一律平等；不论酋长或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社会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单位，是组织起来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15]416}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更高级社会会复活古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故他在摘录时在括号内加了“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一语：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5]398}

出于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马克思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构成的资产阶级国家称之为虚假的共同体是理所当然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打倒这种虚假的共同体。他们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6]571} 他们在追溯人与社会的历史发展时指出，个体自主活动的条件与交往形式

的“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是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的”。“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人，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16]576} 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主张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以实现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

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国外学者的研究可资借鉴。例如，美国学者乔治·麦卡锡在研究马克思与古希腊思想文化传统之联系的基础上来审视《资本论》。他写作《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一书，就是要“展示希腊人的价值和典范如何影响了马克思后来关于社会正义、共享民主的理念，以及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17]1} 他认为，马克思处于工场现代化和新阶级制度形成的半途中，“古典传统迫切渴望平等、共同体和社会正义”，“在18世纪的政治哲学和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个人自由理想和人权保护意识之后”，这些价值观由马克思“整合并转化”。^{[17]2}“《资本论》绝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理论的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著作；这一著作毋宁代表了对现代性之深层结构——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所不可逾越的界线——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呈现。”“对马克思而言，一个压迫性经济体中的社会关系是阻碍了个人自由与理性行动发展的。”^{[17]7-8} 亚里士多德的普遍正义理论代表个性发展的道德状态、社会政治特性的法制状态，也为共同之善创造出公正的法则。“真正的问题不外乎，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同样也是这些类型的问题和疑惑吸引了马克思的注意力，并且贯穿于他后期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中，它们是马克思自身伦理思想的基石。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对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论而言并非核心。”^{[17]87} 麦卡锡还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普遍正义处理的是法律、德性和共同体，而特殊正义关注的是社会交往直接的、当下的形式。分配正义聚集于社会共同财富——包括像社会荣誉、金钱

和共同体所有物——的分配，即在基于比例平等的政治体制保障下分配给所有共享者，而调节正义则是基于算术比例，试图去拉平或矫正由不同形式的社会交往导致的不正当获益”。^{[17]88} 麦卡锡认为，风靡北美的“马克思与伦理学的主体讨论”“没能深入去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所立足的哲学背景与传统”，“研究仅流于对马克思话语的泛泛之论，而遗漏了赋予其话语以意义和关切的潜在精神”。他指出，“更深入地考察古人们，将有助于解开马克思如何看待唯物主义、科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实践的一些奥秘”。“把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扩展到包容古人，也就产生了对一些特别复杂问题的更宽阔、更全面的理解。”^{[17]2,3}

麦卡锡确有洞见。参照古希腊思想文化传统来读《资本论》，我们会感到这是一部贯穿元伦理学的著作，含藏着正义论。马克思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进行理论探索，在不少著作中分析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他向往自由人的联合体，渴望古代的那种自由、平等、博爱在更高水平上复活，渴望人类的史前时期以资本主义时代而告终。他设想基于资本主义时代取得的成果，联合起来的人在对土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配置个体财富。这样，每一个结成共同体的个体都是自由、平等的，人人享有幸福。在这种视角下来理解《资本论》中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就变得明朗起来，就不会狭隘地拷问“个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还是指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

个体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回顾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区分个体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不是他关心的重点。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展望，每个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劳动与生活方式的关系。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认为“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先要从它

里面扣除维系社会发展的各种部分之后才能进行个人分配。“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马克思进而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14]432-434} 马克思谈到，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435} 这里，马克思把个人能力与社会经济结构及由它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了。

而从马克思对处于共产主义社会更高阶段^①的

①于光远指出，《哥达纲领批判》中译本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应改译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更高的阶段”，因为原文“*In einer hoher Phase der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中的“*hoher*”是“比较高”的意思，这“可以解决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无限发展过程的问题”。参见于光远：《重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私有制社会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笔记》，《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人们生活的展望,可以看到他所思考的重心总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4]435-436} 依照马克思的思路进行分析,在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个体进行生产与生活的界限就变得模糊起来。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论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时指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发展、支出、消耗自己的能力,生产资料也被消耗,这是“生产的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13]14} 并且,个体对生活资料的享用这种直接消费是不可让渡的,因为它是对自己生命的生产,个体不吃喝休眠就不能维持生命,这种生产也是联合起来的个体即共同体整体(不仅仅是其总生产力)的直接生命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16]532} 可见,处于生育期的男女在过最隐秘的性生活时,是在进行他人生命的生产,即生产共同体的新一代个体。总之,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16]519-520} 显然,这些表述没有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从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出发来审视人类的生命活动。

不仅如此,在社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只需极少劳动时间就可提供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时候,许多个体生活的第一需要是劳动本身。那时,种植、养鱼、放牧、开发工艺产品、读书、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绘画、音乐、美术、太空探索等,就像打球、

游泳、健步、观剧、休闲一样成为人类优先追求的活动。个体在凭兴趣进行各种活动的同时耗费了材料——这都不再只是为了谋生,更不是进行商品生产,其本身就是享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界限消失了,生产劳动与消费的界限也模糊了。这时候,人曾被异化的本质都归还于人,每个人都成为“自由的人”。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解释过“自由的人”产生的社会条件:无产阶级取得并利用公共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摆脱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4]566} 这实际上是“自由的人”的联合体产生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人物。他们都崇尚人类解放,希望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得到发展,但对未来共同体的形式和规模都没有具体规划。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及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劳动者本身创造出来的共同体(它又分两个历史阶段:劳动与土地相关的是第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列举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这种“公社”与奴隶制、农奴制相关联;劳动在城市的是第二个历史阶段,有手工业者的同业工会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成一个现代共同体,包括资本家的共同体、货币共同体、交换共同体、劳动共同体;等等。资产阶级国家这种虚假的共同体将会被自由人联合体所扬弃。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一词也可以改为“共同体”。1875年,他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负责人奥·倍倍尔的信中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14]414}

纵观人类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同体或联合体确实曾经产生过并且有的至今仍然存在。我们不妨引入实例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其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就可以知道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一说到底何指。至少,可以知道其视野完

全超越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狭隘领域。

三、个体与共同体相关联的现实样本及其检验作用

40余年来,学界有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或享有个体财产(权)的论争,大多是打笔墨官司,未能恰当地引入历史与现实中的典型例子来进行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理论的同时还指导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工作,并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对于仅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马克思也进行了及时的总结、研究。但是,当时没有任何工人政党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成功付诸实践。然而,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一种共产主义实践在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试行了。那些离开欧美国家的犹太人回到了中东故土,建立起“基布兹”,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色列。这种充满活力的基布兹,可作为典型来验证马克思的理论。

据国外学者介绍,建立基布兹的思想可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1862年,赫斯在《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一书中预言民族主义会导致种族反犹太主义,“他同时还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社会”。^{[18]463}19世纪末,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1905年,俄国掀起了一轮反犹太主义杀戮运动。这迫使不少犹太人向巴勒斯坦迁移。一名叫戴维·格鲁恩的锡安工人党员,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后来改名为戴维·本-古里安,并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1909年,他们在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维夫,之后又在北部创建了一个集体农庄,即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18]474}“基布兹的基本原则是:财产共有,成员绝对平等,民主协商,劳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共同抚养管教孩子,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基布兹的成员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工资,他们的基本需求,如衣、食、住、医、教育等,全部由集体提供。吃饭通常在基布兹的食堂一起吃,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基布兹的成员每周开会商议各种事务,并以投票表决的形式作出决定。许多工作都是大家轮流做,像基布兹的领导职务,如行政主管、工厂管理人员、监督等每两三

年换一次人。”^{[19]343,344}

至2010年,270个基布兹遍布以色列全境,成员有12万多人。“根据以色列的《犹太人百科全书》,所谓基布兹:即一个志愿组成的集体社区,主要务农,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它对它的成员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负责。”^[20]国内学者根据相关材料,对基布兹的管理原则进行了归纳:“第一,自愿原则。任何人都可以基于完全自愿的原则加入或退出集体农庄,申请人应认可并遵守集体农庄的规则。”“第二,平等原则。基布兹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可以对基布兹的方针、政策、生产、经营和生活中的一切事务进行表决。劳动是人人遵守的社会准则,所有成员只有专业分工不同,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完全平等。管理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不享有特权或额外报酬,他们都有自己的劳动岗位,对基布兹的服务只是正常工作之外的一种业余服务。这反映了其他成员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为了不辜负其他成员的期望,基布兹的所有领导者尽职尽责。专业委员会的成员定期轮换。在基布兹里,雇工是禁止的。直到近几年,因为人员流动、劳动力短缺,才开始允许雇工劳动。”“第三,生产资料公有原则。基布兹是一个集体和公有组织,国家拥有土地,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和各种产品等其他资产归所有成员共同拥有。以色列建国后,收回了所有的土地,基布兹只能从国家租赁土地。”“第四,民主管理原则。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向基布兹所有成员公开,全体会员会议具有最高权威。”“第五,‘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21]

围绕基布兹这一典型样本,我们就能把《资本论》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说法解释清楚。基布兹是“协作,土地及各种由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的共同体,消灭了少数人利用生产资料奴役多数人的条件。任何人加入其中就是它的平等一员,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个体,与其他成员共同占有土地与生产资料。生产决定分配,个体财产中包括生活资料。无论基布兹的成员是在公共食堂用餐还是在家用餐,孩子们住或不住在集体宿舍,都不改变其配置个体财产的性质,因为个体在进行生产劳动的同时享受了生活资料。个体对生活资料的享用是不可让渡的、他人不可代替的消

费,不能像工作那样可让人临时代替。这是个体的直接消费,是生命也是生产力的再生产。停止几天饮食或睡眠,作为生命的个体就会死亡。但是,某成员一旦退出某基布兹,他就不再是该组织的共同土地与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就失去了享有个体财产或财产权的资格。可见,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他虽然隶属于共同体的整体,却是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根本。个体所有与集体公有是二位一体的,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其实,基布兹的实践在某些方面已超过了马克思当年的设想。基布兹中的一切都属于集体。它为成员子女无偿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义务教育服务,如果成员子女考取大学,基布兹承担其就读大学所需的所有费用。但在基布兹中,劳动还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仍然是谋生手段,分工还不能消灭,集体财富之源还未充分涌流,每个人的发展还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个体还不是真正的自由人,至少个体不会随意脱离共同体。马克思设想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通过与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关系而拥有自己的财产。基布兹则是由有志青年在荒漠之上勤俭创业、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不完全建基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一段关于基布兹创始理念的介绍道出了这种共同体的真谛:“这群人想要打破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桎梏,在与人的交往互动中获得力量和启迪,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22]这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是相通的。

以色列的“莫沙夫”农业合作社同样可作为实例来引证。第一个莫沙夫成立于1921年。莫沙夫的公有制程度低于基布兹,更注重个体和家庭,个体享有一定程度的私有财产。莫沙夫的“产生与基布兹农业合作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莫沙夫农业合作社是对基布兹农业合作社的改良”。^[23]莫沙夫的最大特点是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在莫沙夫,“住房、耕地、收成均归农户,而供销、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则由各户参加的莫沙夫合作组织集体负责”。^[24]莫沙夫对农户农业生产、销售的全过程实行精准的个性化服务。“莫沙夫是典型的多功能合作社,具有生产、存贷款、物资供应、储存、加工、

消费和技术服务等功能。”^[25]莫沙夫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社员大会,其充分的民主管理职能与基布兹是一样的。莫沙夫同样是“协作,土地及各种由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的共同体,没有少数人利用生产资料奴役多数人的条件。每家农户都是它的平等一员,以户为单位享有土地、住房等,享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通过劳动获得成果,集体则提供供销、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服务。这种状况下存在的不是个体财产权而是“户”的财产权,但其基本性质未变。一旦某家农户脱离莫沙夫,就不再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也就没有财产权了。

以基布兹、莫沙夫作为典型来验证马克思的理论最为合适。基布兹已有超过110年的历史,莫沙夫亦有百年历史,这些共同体的实践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当然,全球范围内还有全球性共同体。例如,马克思极为关注的“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这种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已遍布世界。1844年英格兰北部罗奇代尔镇的第一家现代化合作企业——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现在已发展为拥有来自112个国家的318个会员组织的国际合作社联盟。限于篇幅此处不作细析。

历史上作为“小农大国”的中国也存在过以户为单位的“共有”制度,这也可作为例子来引证。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记录了江西寻乌县的旧有土地中有“公田”,占总田地的40%。寻乌县还有公共地主,分为祖宗地主、神道地主、政治地主三类。祖宗地主是由后人“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费外,大概总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积蓄,而是拿钱积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粜给贫民,把钱积起来。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它的子孙均分了去。”“分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是怎样一种分法呢?就是当那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26]^{176,177}由于重男轻女,这里的以户为单位实际上是以男丁为单位,与以个体为单位相近。这样,个人财产与公田、个人所有权与公田制是一体的,个体与整体是相关

联的。当然，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隔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但其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联是相似的。

这种“共有”制度，不是在打倒资产阶级后联合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占有，不是整个社会占有或国家所有，亦不是发现了新大陆后去殖民、去占有，而是“凑份子立公”，即各农户出一份田产凑成公田，又通过公田的积蓄分配而得到自己的一份财物。这其中的法律意味并不强，更多地体现为习俗与道德规范。可见，共有制或公有制，有古代与现代之分，形式是多样的；而个人所有的什物内容不同，其丰富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讲公有制又讲“个人所有制”令我们心存困惑，那么中国历史上公田制的产生与个人（农户）财富的分配与享有，则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发。

以色列的基布兹不完全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上建立起来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有些差异。但它的创立者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归中东故土的，其头脑中有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思想成果——社会主义理论，手中也有一些资金和技术。他们在“协作，土地及各种由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的基础上结成合作社，吃苦耐劳，努力奋斗，使这一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有了幸福生活。基布兹这一社会主义实践标本足以释清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我们不再重复论争。但这绝不是说论争无意义，相反，它对我们准确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十分重要。

四、文本翻译与精确解读

40余年来，学界在论争中的一大进步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原著相关词句进行对比，研究怎样翻译才更精确，力求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所言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较发达的西欧，而近代中国则是落后的农业国。国情与文化的差异以及时空距离，增加了中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理解难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中能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是《资本论》的人凤毛麟角。将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英文、法文等写成的文本转化为中文，殊为困难。即便是郭大力、王亚南穷一生之力所译的《资本论》，其文字表达仍然有精益求精的空间。要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作出精准

解读，准确的文本翻译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甚至可以说，“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之所以作为一个论题被提出来并论争40余年，在很大程度上与翻译过程中对汉译概念推敲不够有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检视学界对相关译文的论争。

1983年，余名汉提出《资本论》中译本中的“个人所有制”是误译。他指出，“有些同志对恩格斯和列宁的解释提出异议”，认为《资本论》中译本中的“‘个人所有制’不应指消费资料，而应指生产资料”，“引起了理论上的一些混乱”。“引起这些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一个翻译上的失误。”德文中的individuelle Eigentum根本不应译为“个人所有制”，而应译为“个人财产”。并且，英文版《资本论》此处原文是individual property。“英语的property和德语的Eigentum具有‘财产’、‘所有’、‘所有权’、‘性质’等等意义。在翻译时，应根据其不同的用法，采用不同的汉语译文。比如，与个人联系使用或与社会、集体联系使用时，可译为‘财产’或‘所有’；而译为‘所有制’时，则是专与社会经济形态或经济成分联系使用的。”《资本论》中的individuelle Eigentum“是与个人联系使用而非与社会经济形态联系使用，故不应译为‘个人所有制’，而应译为‘个人财产’。按马克思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对未来社会所作的设想，生产资料既然已属公有，而在全部生产资料属于单一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又没有了商品生产和货币，那么‘个人财产’当然只能有消费品了”。“可以作为佐证的是”，“1887年由恩格斯亲自指导和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在这段文字中第二次就没有用reestablish（重建），而是用的gives（给、分配），在第二个重建处，中文所译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英语为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很明显，作为gives（给）的宾语的，只能是消费品或财产，而不能是所有制”。^[27]

奚兆永赞成这一见解，他说如果改译，“人们在理解上的困难和学术界的长期争论就可迎刃而解”。^[28]但阮震不赞成改译。他认为改译“虽然字面上也讲得通，但实质上已背离正确理解很远”。因为马克思实际上是把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来把握的，它“既体现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也凝结在生活资料的占有与支配中”。“《资本论》

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论断，其内涵是十分明确的，它意指建立公有制。”^[29]

刘明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和德国乃至欧洲的法律文化出发来理解此问题，认为应将 individuelle Eigentum 译为“个人所有权”。他指出，英文“‘property’的释义有：所有、所有权、财产、所有物。原本没有‘所有制’的释义。但英译本中‘property’与德文‘Eigentum’（所有制、所有、所有权、所有财产、所有物）相对应，依据英文本的上下文将‘property’分别译为‘所有权、所有制、财产’似乎均有可能。问题是在‘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这一语境中如何译介‘property’这一语汇”。“马克思在讲到‘否定之否定’时先后提到的生产方式、占有方式和共同占有等经济学和法学范畴，并指出未来社会所有制将以资本主义已经获得的成就——即协作和对土地、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实际上是将法律上的物权关系与政治经济学范围的生产关系予以综合。从法律实践的历史看，在所有权与占有权分立的情况下，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在法学上的要素必然包括所有权与占有权二者。所有权意味着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对财产的任意处分权；占有权则指对物的实际控制。设若在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给生产者以个人所有制’，或如目前德文第4版、法文本中译文的表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且在对‘个人所有制’的理解中排除个人拥有具体的所有权，则必然在共同占有基础上使所有权虚置。那么，所有权为谁之有？”“马克思的逻辑论证过程是一目了然的，即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给生产者以个人所有权’。”恩格斯主持翻译的英文本对这一部分叙述的变化源于马克思的书面指示，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 可译作“给生产者以个人所有权”。“与英文‘property’和德文‘Eigentum’对应的法文词语是‘propriété’，可以作‘所有，所有权，所有制，财产’解，故在法文本中可以接受‘个人所有权’的译法。”^[30]刘明的这种改译主张论证得比较精细。他结合当时的德国民法，从法学角度出发进行纵深理解，说明译为“所有权”比译为“所有制”“财产”等更恰当。这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论》中的表述，摆脱对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困惑。

李济广的看法是：“马克思关于‘individuelles Eigentum’的本来意思是‘赋予(give)劳动者个人财产’或‘重新确立(re-establish)劳动者的个人所有’，译为‘给劳动者个人所有权’也不错，译为‘个人所有制’不符合词义但也无原则错误。某种语言中的许多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并没有含义完全相同的词汇，只有多个词汇的综合才能较好反映某种语言某一词汇的内涵。”^[31]

马嘉鸿在吸收学界讨论成果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了更细致的解读。她在《如何理解〈资本论〉“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一文中，引用、对照了《资本论》1867年德文初版、1872年德文第二版、1883年德文第三版和恩格斯审定的1890年德文第四版的相关段落，指出后两版与前两版的区别在于前头加了一句“这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将“公有制”(Gemeineigentum)修改为“共同占有”(Gemeinbesitzes)，删除了“协作”前的“自由人”(freier Arbeiter)。这两版是参照马克思亲自校订的法文版修改的。而恩格斯校订的《资本论》1887年英文版，用“给予生产者以个人所有权”(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来对应“建立个人所有制”(das individuelle Eigentum)。郭大力、王亚南按照德文第四版所译的《资本论》第一卷(1963年版)中的相关译文是：“这是否定的否定。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获得的成就——协作，土地及各种由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所有制。”后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相关译文稍有不同，在“建立个人所有制”之前增加了“重新”一词。这是意译，“照顾了上下文，其意义并没有背离马克思的原意”。马嘉鸿认为，“将‘Individuelle Eigentum’具体翻译成‘个人所有’、‘个人所有制’还是‘个人财产权’，并不影响对这段话的理解，因为马克思的重点在于对个人与社会之间一种全新关系的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并不是为了具体规定未来社会条件下所有制形式的具体样态，而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提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经过否定之否定而重新建立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将是个人与社会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这样一种新的所有制，变更了原有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关系中，不

再是孤立个体的绝对至上,也绝非国家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而是每一个自由人在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中获致了前所未有的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由”。^[32]

马文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联出发来说明问题,但说马克思设想“重新建立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将是个人与社会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则仍没有准确把握个体与共同体的共生关系。并且,文章提出的“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与《资本论》德文第三、四版将“协作”一词前的“自由人”删除不相协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重视“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因素,但合作工厂的工人远不是真正的自由人。《资本论》德文第三、四版删除“自由人”一词,可能是考虑到了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的协作状况。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既要从共同体出发来解释个体,也要从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条件出发来理解“个人财产权”。

然而,将 individuelle Eigentum 译为“个体财产”或“个体财产权”才更为精准,因为 individuelle (个体)与 person (个人)是有区别的,马克思往往将个体与共同体 (Gemeinschaft/Gemeinwesen) 对应使用。如果真正明白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联系社会主义共同体来解释个体及其财产配置,就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简单。

精准的翻译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郭大力、王亚南直截了当的译文有利于读者完整理解整个句段,即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成就基础上通过“协作,土地及各种由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建立个人的所有制”。而中央编译局意译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则可能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重新建立”而不是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条件,从而导致对“个人所有制”的种种推测与论争。

为了使理解更加精确,可对《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中的这段原文再作推敲。原文是:

Es ist Negation der Negation. Diese stellt nicht das Privateigentum wieder her, wohl aber das individuelle Eigentum auf Grundlage der Errungenschaft der kapitalistischen Ära: der Kooperation und des Ge-

meinbesitzes der Erde und der durch die Arbeit selbst produzierten Produktionsmittel.

这段文字翻译成中文可以这样表述:“这是否定的否定。这不是恢复私人所有制,而是个体财产权,乃基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协作和共同占有土地及由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这种句式表达比较接近原文,只在“个体财产权”后增加了一个逗号,以免句子太长。把 Privateigentum 这个合成词不简译为“私有制”而译为“私人所有制”,将“私人所有制”和“个体财产权”对应处理,节奏感强,有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与期待:未来社会在整体上不再代表私人所有制。

需要指出的是,德语中 stellt 这一动词的含义非常丰富,有竖立、安置、调节、供给、提出、制造、阻止、站到、接受、重新排列、恢复、再次代表等多重意思。笔者未能查到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德文词典,而马克思使用 stellt 一词的情况也同样复杂。把它译为“恢复”或“再次代表”可能比译为“重建”更好。在与马克思视界融合的基础上可以这样联想:马克思写作时头脑中的意向是,资本主义制度被否定后,人类社会不会复归到包括小私有制在内的各种私有制,而是发展为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那种共同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一份应得的财产权而不被他人剥夺。马克思是从社会形态角度来考虑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是处在怎样的一种经济制度中的。他在这里没有进行系统阐述,没有涉及政治制度、文化等。

并且,中文“重建”的德文对应词是 wieder-aufbauen,“恢复”的德文对应词是 wiederherstellen。所以,不应沿用传统译法来译“Diese stellt nicht das Privateigentum wieder her”,即不译成“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为好。

这样,此段文字转换为中文后,意思就很清楚了:否定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私人所有制后不会再搞任何其他私有制,而是搞社会主义共有制、确立个体财产权。换言之,联合起来的人进行协作,共同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实现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会配置财产。这是在更高级的条件下复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体与共同体的那种社会生活。马克思在这里确实是在“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33]22}正如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

中指出的，“否定的否定”是“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34]412}

最后，对《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中“7.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个语篇进行整体分析，亦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私有制是“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接下来马克思继续论述：“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是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会导致“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并且“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这是第二个否定。经过否定的否定后会形成新的综合：它不再是私有制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会恢复每个被剥夺个体的财产权。它基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协作和共同占有土地及生产资料。个体财产权以公有制为前提，最后一段话中“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直接点出了这一点。^{[33]872-875}

马克思是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顺便论及了资本主义制度被否定后，大多数以前被剥夺的人共同占有土地及生产资料并进行协作，每个个体都享有财产。但他在这里并没有充分展开。再加上中文译文与德文原文的差异，文本理解的文化语境差异，个体与共同体关系视角的缺失，把杜林当年对马克思“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误解转换成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争，

以上种种，导致了对一个句子的误解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奇怪，也完全可以理解。若从德文原文出发来看“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翻译不准确。马克思本身并没有表达中文译文中所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意思。所以，我们头脑中曾有的所谓“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也就消解而不复存在了。

要顺便说明的是，本文沿用了学界习惯用的“个人所有制”而没有改用“个体财产权”等，是尊重《资本论》中译本的传统译法。新术语的界定与使用，宜在学界形成新的共识和校准译文之后。

参考文献：

- [1]裴晓军.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思潮的兴起与探索[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1 (5).
- [2]戴道传. 论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J]. 江汉论坛, 1981 (3).
- [3]梁万成. 马克思讲的“个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吗[J]. 江淮论坛, 1981 (2).
- [4]王启荣. 评《论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J]. 江汉论坛, 1982 (4).
- [5]刘晓铎. 也谈“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J]. 江汉论坛, 1982 (4).
- [6]王成稼. 正确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J]. 经济研究, 1990 (1).
- [7]王成稼. 再论正确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兼答马德安同志[J]. 《资本论》与当代经济, 1991 (0).
- [8]卫兴华. 再析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涵义——兼评王成稼研究员的有关诠释与观点[J]. 当代经济研究, 2008 (9).
- [9]卫兴华.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再辨析——兼评王成稼的解读[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3 (1).
- [10]胡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几个带根本性的理论分歧[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美] 乔治·麦卡锡. 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M]. 王文扬，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8]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 耶路撒冷三千年[M]. 张倩红，马丹静，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 [19] [美] 马丁·J. 甘农. 异域文化之旅：体悟23个国家的文化象征[M]. 黄华光，徐力源，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 [20] 刘洪. 以色列“人民公社”的蜕变和改革[J]. 中国经贸导刊，2014（10）.
- [21] 程恩富，孙业霞. 以色列基布兹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示范[J]. 经济纵横，2015（3）.
- [22] 韩梁. 以色列基布兹的蜕变与新生[EB/OL]. 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19-06/14/c_138131005.htm.
- [23] 解安，朱慧勇. 以色列莫沙夫：农业合作化的创新实践[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4）.
- [24] 刘志民. 以色列特有的农业合作经济形式——基布兹和莫沙夫[J]. 世界农业，1997（9）.
- [25] 张凤. 以色列的莫沙夫[J]. 农村经营管理，2011（1）.
- [26]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7] 余名汉. 《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处误译[J]. 江汉论坛，1983（2）.
- [28] 奚兆永. 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的讨论[J]. 中国经济问题，1991（1）.
- [29] 阮震.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那段论述需要改译吗？——与奚兆永同志商榷[J]. 中国经济问题，1992（1）.
- [30] 刘明.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若干范畴译名与释义考辨[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 [31] 李济广. 马克思“个人所有制”（个人财产）概念的翻译争论及其症结[J]. 海派经济学，2012（10）.
- [32] 马嘉鸿. 如何理解《资本论》“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J]. 哲学研究，2017（5）.
-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4]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黄云龙]

**Inner Link between Marx's "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 and His Thought on Community: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Debate on "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U Weixi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At the end of Chapter 24, Volume 1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apital*, Marx mentions "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 which arouses intellectual debate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0 years. Its understanding requires the knowledge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his philosophy and thought on communism, and his advocacy of human liberation. He promotes "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 on the basis of the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age of capitalism, i.e.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and joint possession of land and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produced by labor. His "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 has inner link with his thought on community, which must be made clear theoretically and proved by the analysis of samples in practice for revi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Key Words: Marx; *Capital*; "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 the thought on community

(续接第73页)

Chen Yun's Status in the Long March and the Study of Its History

JIANG Jiannong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Chen Yun is one of the four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fore and during the Long March. His role is displayed by the promotion of the Party's trans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bjectives at several stages, the resumption of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ultimate success of the Long March of different lines of the Red Army in China. As the participant of the Long March, he is the first person to publicize the Long March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o unite it with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o regard the success of it and anti-Japanese coali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ocuments of his notes, essays and the other writings on the Long March of Red Army establish the basis of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the Long March history.

Key Words: Chen Yun; Long March; study of the Long March history

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两重意境及其意义

杨泰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和俄国的实际情况,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反复的说明和论证。在1905年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发展了民主革命理论,建构了“一般民主革命”和“彻底民主革命”的两重意境。前者为工人阶级和一切反专制制度者共同进行的“全民性”民主革命;后者则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实行的民主革命,具体表现为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列宁对民主革命理论设想的演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列宁;民主革命;俄国革命;政治自由

列宁有关俄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在1905年俄国革命进程中趋于成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列宁曾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1]其原因既包括对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反思,也包括对革命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学者甚至主张将1905年的俄国革命称为“第一次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的俄国民主革命”^[2]“俄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特异民主革命”^[3]等,以凸显

1905年俄国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性、独特性、重要性。1905年的俄国革命兼具这些极具研究价值的属性,所以学界极为关注。围绕列宁民主革命思想中的领导权问题、政权设想问题,列宁民主革命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创新问题、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等,学界均有不少深入具体的研究成果,但在对该理论建构发展的具体细节上,既有研究仍显不足,甚至严重制约了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建

收稿日期:2021-11-2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共农民革命的话语演进和理论建构研究(1920—1927)”(项目编号:19YJC7100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泰龙,男,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构和相关纷争的根源性认知。实际上,在指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深入考察俄国国情的基础上,坚持主张先进行民主革命,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理论,提出了“彻底民主革命”的构思,创造了民主革命的两重意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构想。1897年,列宁被流放西伯利亚时,便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进行了系统思考,撰写了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小册子。列宁在文中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具有“两种具体表现”:“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和“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4]431}1905年10月,列宁更具体描绘了革命进程的蓝图。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肩负着在现在和未来进行两种性质、目的、参与的社会成分截然不同的战争的使命:目前全体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未来“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5]284-285}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和将来革命的循序渐进和各有其责,被列宁视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始终承认”的“两条基本原理”,“谁背弃这些基本原理,谁就是背弃社会民主党”。^{[6]238}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社会主义已经临近”,所以并未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也并未区分“最低纲领跟最高纲领”。^{[7]229}无产阶级政党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列宁却要求社会民主党先进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民主革命,难免遭到质疑。为此,列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俄国国情,对其主张进行了深入、反复的说明和论证。

1899年底,列宁在文章中指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

所必需的组织”。^{[6]220}1903年,列宁在《告贫苦农民》中强调,政治自由虽不能使劳动人民马上摆脱贫困,但却是工人“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所以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争取政治自由,“以便广泛地公开地把全俄工人联合起来”,“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8]113,118-119}1905年6月,列宁对政治自由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进行了系统阐述:“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有高度的组织性。”而没有政治自由,既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公开的和自由的阶级斗争,更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教育、政治培养和团结”。^{[7]258}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俄国国情具有其特殊性,即特别专制和特别落后,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具备的政治自由在俄国并不存在。人民仍是“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治奴隶”,“沙皇拥有独揽的、无限的、专制的权力”,^{[8]115}这一特殊性构成俄国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1896年,列宁在彼得堡狱中所拟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指出,其他国家工人能够通过联合逼迫资本家让步,进而影响国家法令,而“俄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也只有俄国)”却由于“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平民百姓权利受到的侵犯“达到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几乎都不可能有的地步”。俄国政府“完全不受限制”,“凌驾于一切等级和阶级之上”,^{[4]83}所以列宁在党纲草案中明确规定,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4]70}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列宁具体将英国与俄国进行对比,认为尽管官僚机关在不同国家均存在,但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监督”,而俄国人民“在官吏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4]439}在1899年为《工人报》所写的文章中,列宁也指出,如果俄国工人不能像“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工人一样享有集会、结社、办报纸等权利,“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6]162}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是“为推翻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9]112}而俄国极端专制,人

民毫无政治自由可言。所以列宁反复强调,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最迫切任务”。^{[6]156,335} 列宁甚至将当时俄国的时代称为“政治奴役的时代”“政治自由以前的时代”,^{[10]310} 凸显了政治自由在俄国现实中的极端缺乏,也反映出政治自由是俄国当时革命的首要目标和未来革命的必要条件。

不过,“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也就必然“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5]284} 所以政治自由作为民主运动争取的目标,虽然是工人联合的前提,但更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契机,“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11]258} “首先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12]63} 这也是应否支持民主运动成为社会主义者争论乃至分化的焦点问题的根源所在。对此,列宁既反复强调“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5]95} 又具体解释“在政治要求方面,工人民主并不是在原则上而只是在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别”;^{[10]251} 既坚决批判“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5]12} 又坚持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以政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为理由而放弃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7]25}

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有高度组织性,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工人阶级高度组织性依赖于推翻专制制度并取得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并争取政治自由则依赖于民主革命的进行。此一逻辑,构成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基本设想,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历程、革命任务、革命目标。

二、“一般民主革命”

列宁能够成为当时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实际情况丰富、发展、完善其理论和主张,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尽管列宁十分确定俄国革命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他对民主革命的具体设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俄国情况变化不断调整适应。

虽然并非泾渭分明,但大致以1905年为界,列宁话语中的俄国民主革命具有“一般民主革命”和“特殊民主革命”两种形式。二者最显著的差别表现在革命盟友或者说革命动力并不相同,革命程度彻底与否,除此之外,后者更有替代前者的总体理论架构。一般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即“民主分子”进行民主革命,也即列宁所谓的“全民的革命”,此种形式是以无产阶级立场根据马克思主义借鉴西方民主革命一般经验得出的。特殊民主革命则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实行的彻底民主革命,也即农民革命、土地革命。

1905年之前,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进行理论探讨时,对革命力量及其同盟者的论述主要依据“《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即支持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支持同盟者反对“特定的敌人”。^{[4]436} 就俄国而言,特定的敌人即俄国专制制度。为了团结一切持反政府反专制态度的群体,列宁划定的同盟者非常抽象,囊括群体极为广泛,只要对当时专制制度不满即可,无论阶级阶层。

1894年,列宁在批判《俄国财富》杂志发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时便宣称,俄国工人将会“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11]264} 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列宁除了对俄国革命历程提出宏观构想,还具体阐述了当前革命策略: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切反对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阶级、反对一切阻碍竞争自由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残余的社会运动”,^{[4]70} 所以,“所有反对专制政府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的同盟者”。^{[4]91}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列宁对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斗争、民主主义斗争任务中的区别进行了说明,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为:在社会主义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至多“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斗争中,“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具体包括“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迫害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4]435-436} 随后,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再次强调,在民主主义

政治斗争中，“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等，都会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6]163}

为了向俄国社会表明态度，争取支持，扩大影响，1900年3月底，列宁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中称，俄国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将“争取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正直的人，不管他们持有什么观点，属于什么阶级”。^{[6]290}8月、11月，列宁又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等文章中重复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主义斗争中以是否反对现存专制制度判断敌我的原则性立场，并呼吁团结“一切民主分子”，争取“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6]318,338}1901年，列宁更清楚地指出，应当支持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立场，“不管它是由于什么原因和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表现出来的”。^{[12]63}

为了集中力量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列宁极力呼吁团结一切有着相同诉求的“民主分子”。又由于极端专制制度下民主要求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列宁经常使用超阶级的概念，目的自然是为了避免民主力量的分化。“正直的人”“进步分子”等说法其实尚有所妥协，“全民”概念更能反映这一意图。

1902年2—3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称，俄国正处在“全民性的民主运动前夕”。^{[10]305}1903年3月，列宁在阐述农民革命的步骤和动力等问题时也称，“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求有进行斗争、进行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广泛的、全民的大斗争的充分自由”。^{[8]165}甚至直到1905年后，列宁在理论阐述上仍不乏将民主革命视为全民革命的表述。如在1905年7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小册子中，列宁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应当是“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5]97}10月，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中，列宁则对民主革命为何是“全民的革命”作出了解释：“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实质

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也就“不可能不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5]284}既然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民主革命自然应是全体人民共同的革命。

三、“彻底民主革命”

尽管列宁一直“十分重视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革命政党、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合作”，^{[13]69}但这种无产阶级与抽象对象的合作，尤其是与群众、人民、全民的合作，主要指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而并非列宁坚持的“彻底”民主革命。不仅如此，对于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列宁其实一直持怀疑态度。

1897年底，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虽提出资产阶级、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受专制制度压迫的分子均会在民主革命中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但同时也分析了资产阶级具有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前者“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后者“会屈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4]438}考虑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具有的潜在反动性、妥协性，列宁对革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阶级力量的分化组合十分清楚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列宁便提醒工人阶级，“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4]92}1902年2月，列宁阐述了对待其他党派的原则：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善于在任何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10]252}

1905年，国内各地兴起的罢工和斗争逐渐酿成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2]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始终坚持“严格地区别本质不同”的各革命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到来的条件”的列宁，^{[9]112}对俄国民主革命的构想进行了很大调整，形成了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也不同于欧洲民主革命实践的“特别”民主革命形式。1931年，米夫在《中国问题》杂志上便称，“布尔什维克认为1905年革命同一般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许多区别”，“是非一般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4]341}这一“非一般型”的民主革命，是列宁为探索如何彻底进行民

主革命,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而提出的,故暂名之为“彻底民主革命”。

1904年11月,列宁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呼吁“必须支持任何(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坚持民主主义的民主派”。^{[9]69}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施压,俄国政府由“血腥的镇压政策”转向“经济上的让步”,^{[9]186}政治上则放开了“几乎完全为资产阶级所享有”^{[7]141}的一定的政治自由。在此前提下,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开始动摇,革命力量内部的矛盾渐趋激烈。1905年1月,列宁撰文指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同时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老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便已阐明,新则是因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会导致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同流派“发生特别的、独特的结合”,并且“这个老问题目前在我们俄国也已成为特别新的问题”。^{[9]165}

随后,列宁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及资产阶级态度转变导致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态度转变的问题,表明了他对形势发展的审慎思考。列宁认为,不仅俄国的资产阶级,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开始懂得战争和革命的联系,开始害怕节节胜利的反沙皇制度的真正人民的运动”,^{[9]354-355}“不分民族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已经形成并正在投机以求平息俄国革命。^{[9]360}为此,俄国资产阶级一方面“正在竭力使工人运动完全受自己支配”,^{[9]321}另一方面“主张在人民和国王之间搞‘调和’”,“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了“妥协、买卖和渔利政策”的“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7]251}1905年6月,列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中断定,民主派资产阶级中“最先进、最有教养、最少直接屈从于资本”的代表人物,也已“掉在革命的后面当尾巴”。^{[7]261}在《无产者报》上,列宁更接连发表《资产阶级背叛的头几步》《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讨价还价,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讨价还价》等见题明义的文章,强烈谴责整体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出卖“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政府媾和的妥协、背叛行径。^{[7]283}

在资产阶级逐渐动摇、背离的同时,俄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逐渐反动

和农民革命的此起彼伏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印证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后者为列宁进一步探索俄国民主革命道路提供了思路。在此基础上,列宁断言:“革命的农民”开始成为城市工人运动的“新的同盟者”,^{[9]324}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把“土地纲领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9]339}

1905年10月,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中的有关论述大致体现了他有关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原因。列宁称,在反对专制制度中,“似乎是统一的、完整的社会”,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鸿沟已经永远地分裂了”,业主、富人与工人、无产者、劳动者形成了“两个民族”。^{[5]284}由之前反专制的统一社会到现在分裂为“两个民族”,正对应列宁话语中1905年前俄国社会反专制求自由的普遍趋向和革命风潮激荡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的逐渐背离。如何积聚革命力量,推动民主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成为列宁思考的新问题。

1905年4月,列宁在与马尔丁诺夫等人关于时事问题的论战中,将民主革命的胜利、临时政府政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结合了起来。列宁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争取共和国斗争的胜利是“毫无希望的”,^{[7]23}要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临时政府“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7]27}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推动民主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成为列宁此时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构想。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由于生活条件却“必须要这样做”。^{[7]131}会议通过的《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案》也要求促使农民将“民主主义要求坚持到底”。^{[7]152}随后,列宁又在《胜利的革命》一文中具体列举了革命力量的阶级内容和革命彻底胜利的条件:“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和农民”“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7]214}在会后所撰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列宁对资产阶级、农民在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作了盖棺论定式的总结:“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5]82}且“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下的政治自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5]95}

无产阶级同农民一起，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成为列宁对民主革命新的根本主张。“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被列宁视为“无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任务，无产阶级一切工作的纲，无产阶级的整个有组织的阶级活动的灵魂”。^{[15]197}1906年5月，列宁虽然在文章中依然赞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就不能完成革命”的观点，但却将资产阶级民主派分为立宪民主党民主派和农民民主派，并认为只能同农民民主派、农民群众一起行动。除开农民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被列宁置于民主革命的对立面，农民“已经成为工人在革命中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16]100}

以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唯一同盟者为基础，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起因、动力、任务、形式、目标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重新诠释，农民革命开始成为俄国彻底民主革命的真正乃至唯一内涵。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因，“决不是业主和工人的对立，而是农民和地主的对立”，^{[17]52}因此，列宁驳斥了资产阶级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完成”的“孟什维克”观点，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解放运动”，其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17]171}由于“土地问题是最使农民群众激动的问题”，^{[16]100}农民的“革命情感”“本能的、原始的民主主义不可能不表现为要取得地主的土地”，^{[9]340}所以“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18]387}与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任务相伴随的，是土地革命的基本形式。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18]392}民主主义斗争又被列宁称为“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15]91}列宁深刻指出，民主革命的基本目标——政治自由，在此与农民的需求合二为一，因此“争取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地消灭地主（农奴主）土地占有制”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当前的主要任务”，^{[17]170}“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成为“完全的民主革命”的标志。^{[5]120}列宁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具体发展为“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政党尽快

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5]224}“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成了“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19]312}至此，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地位完全被农民取代，农民革命、土地革命成为彻底民主革命的唯一形式。

四、民主革命两重意境的重要意义

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列宁民主革命理论呈现由“一般民主革命”向“彻底民主革命”的演进，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而言，还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角度来看，抑或对中国革命来说，其意义均非同寻常。

（一）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民主革命催生资产阶级政权，既是西方革命的实践经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论点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取得了崭新的意义”。^{[20]93}“彻底民主革命”意味着在必要条件下，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然后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和之后建设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原则。“彻底民主革命”所蕴含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特殊关系，是列宁民主革命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也是列宁极为重视的一点，被其视为俄国突破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列宁后来不止一次总结俄国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原因时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21]355-356}这可视为俄国突破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根本上看，无产阶级以农民为同盟者进行民主革命相较于以资产阶级为同盟者具有天然优势：既能推翻地主和大土地占有制，也能避免资产阶级掌握主动性和领导权，在革命前景上能够顺利地由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关于“彻底民主革命”的理论设想，为农业经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道路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革

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列宁的理论建构和俄国革命实践证明，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领导农民进行彻底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然后再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可能走向“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22]38} 以此为基础，共产国际成立后，列宁制定了共产国际指导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理论，即民族殖民地理论。这一理论形成于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在其中规定，共产国际应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并特别援助以反封建、反地主的农民运动为主要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1]167} 尽管列宁使用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说法，但实际上专指农民。列宁起草好《提纲初稿》后，曾寄给斯大林、契切林等人征求意见，并在回应契切林时明确声称，“我的提纲更强调同农民的联盟（而这并不完全=资产阶级）”。^{[23]108} 虽称“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质上指向农民，意味着列宁的真正意图是以共产国际这一国际工人政党与落后国家农民相结合，实行“彻底民主革命”。其实，列宁的《提纲初稿》中便有“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的说法。^{[1]167} 列宁关于依靠工农联盟进行“彻底民主革命”的理论主张，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前途提供了方向，指导了广大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也促进了共产国际对东方的关注。

（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列宁在不同情况下对民主革命具体设想呈现一般和特殊之别，但在何种情况下需要进行策略转变难以具体规定而只能因势而异，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中共造成了很大影响。在实践上，大革命时期中共、联共（布）在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之间的摇摆不定，本质上可视为在“一般民主革命”和“彻底民主革命”，即在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犹豫不决。在理论上，忽视农民革命是彻底民主革命的本质和唯一形式，自然容易产生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观念。忽视中国革命多阶级统一战线非工农同盟的现实，又易形成革命领导权自然归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因为农民不能作为独立

的政治力量）。前者对列宁理论的理解偏误导致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后者对现实的认识不清形成了彭述之的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理论进行重新诠释，其基本理论依据便是列宁有关彻底民主革命的构想。如布哈林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既反封建军阀，又反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革命任务是土地革命，政权形式是“工农专政”等。^{[24]234} 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反复强调革命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且无产阶级领导权能在这一革命阶段建立起来，也只有实现“工农民权独裁”才能完成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才能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点”。^{[25]855} 中共六大对革命理论的重新阐释，可视为列宁民主革命理论两重意境在中共主导理论中完成交替。此外，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反对派、中共彼此及其内部争论最多的问题便是农民问题，更具体的即富农问题，各方纷纷从列宁话语中寻找理论支撑。著名的《六月来信》要求反对富农，根本理论立足点是“列宁从来没有说过联合富农”，“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联合富农是不对的”。^{[26]692} 从列宁革命理论的循序渐进和革命盟友的因时而异来看，这一说法显然过于绝对。^[27] 实际上，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对之进行脱离两国国情、脱离具体时期具体情况而断章取义的解读，正是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针锋相对论战不绝的根源。

参考文献：

- [1]列宁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高放. 第一次社会主义政党特异领导的俄国民主革命败中有成[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4）.
- [3]叶书宗. 研究俄国1905年革命的创新成果——评《第一次社会主义政党特异领导的俄国民主革命败中有成》[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5）.
- [4]列宁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列宁全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列宁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7]列宁全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列宁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列宁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列宁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列宁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列宁全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3]邢广程. 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一分册[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14]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5]列宁全集：第1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6]列宁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7]列宁全集：第1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8]列宁全集：第1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9]列宁全集：第3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0]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21]王学东，主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 [22]李玉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26]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 [27]罗重一，张楠. 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前后的富农政策[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4）.

[责任编辑 孙小帆]

Dual Conception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Lenin's Theory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YANG Tailo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Russian situation, Lenin elaborated and argued repeatedly on the necessity of Russ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 Dur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1905, Lenin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dual conceptions of “norm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complet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former is “nationwide” democratic revolution for all working class and those against autocratic systems; the latter 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peasants led by proletariat in the form of peasant revolution and land rev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Lenin's thought on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revolution theory of Marxism and points out the path to socialis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Lenin; democratic revolution; Russian revolution; political freedom

(续接第 83 页)

Prim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ty's Program Formulation during the Founding of CPC

WANG Xinsheng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The program of CPC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from the first simple program with only several articl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to the stipul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e First Program of CPC*, which finally, represent the formation of relatively complete party program. In simple or relatively complete forms, the Party's programs propose to overturn bourgeois regime by social revolu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dictatorship of labors and peasants, which reflects the nature and subject of proletariat party, guarantees the purified team and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ies in different place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and provides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unified national communist party to grow stronger during struggles. The sti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program in early period is a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he theory of Marxism-Leninism of proletariat party with the practice of setting-up party by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The First Program of CPC* stipulated by the 1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s its first achievement. Although it is simple and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later struggles, it has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unding of the Party; the Program of CPC

科学把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基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研究

王立胜 李新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宁 273165)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党百年来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全面客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这一决议的一个显著特点。决议采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方式,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程中去考察,宏观叙述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深刻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科学论述了毛泽东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典范,全面总结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卓越贡献。认真学习贯彻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对于科学准确把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汲取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而接续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四个阶段的接续奋斗中,有两个阶段近60年的伟大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取得的,这为改革开

放后40多年中国的发展打下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毋庸置疑,毛泽东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重视历史、总结历史、以史为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节点上,要科学认识中华民

收稿日期:2022-01-05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021mgczd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立胜,男,山东莒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李新宇,男,山东临沭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族为什么能够接续开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必须深刻把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其中发挥的历史性、开创性作用,从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

一、六中全会决议的党史观重构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高度

评价历史需要科学的视角和方法。以往“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革命史的叙事方式,另一种是现代化史的叙事方式”。^[2]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革命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作出的巨大贡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充分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党史的基础上,着重从现代化史的角度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将中国共产党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历史背景之中,采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方式,更加凸显出党史研究的整体性、联系性和递进性,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

《决议》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命运相伴而生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1]从“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到“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展现出无比灿烂的光明前

景,这是贯穿《决议》的一个总脉络。

历史地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一以贯之的宏伟目标。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都是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展开的。把握这个主题,是读懂《决议》和百年党史的关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视角来总结百年党史,意义更加非凡:一是彰显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奋斗历程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将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都贯通起来,各阶段既有各自的奋斗目标,同时也遵循一个贯穿始终的奋斗主题,即“将过去一直讲的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中统一起来了”,^[2]突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目标明确、坚守初心、不懈奋斗、一往无前的世界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就体现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不同阶段,始终朝着同一目标奋力前行。”^[2]二是更加凸显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属性和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一以贯之的奋斗主题,既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真理,也彰显出掌握这一真理武器的中国共产党勇立时代潮头、志为人民服务、甘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先进属性。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穿透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3]在洞察时代大势中把握历史主动。三是这种叙事方式实质上是中共党史观的一种时代重构,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统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主题中,从而避免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采取割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用某一个阶段的历史否定另一个阶段的历史的做法,而且也意味着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成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复兴历史主题的一种接续,从而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外在于历史的一种政治存在,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实践逻辑的历史选择。^[2]因此,必须认真系统地研究这种党史观,并以此为方法论,站在新时代

的高度重新学习中共党史,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作出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

二、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

《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更加全面、准确、客观,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决议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进程中去分析把握,不局限于一时一域,不困惑于一篇一章,真正体现出《决议》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刻阐明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决议》坚持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连续性奋斗历程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性奋斗历程相统一,从更长远、更广阔、更宏大的视野来科学把握毛泽东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他始终坚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历史眼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政治魄力以及“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革命豪情,矢志不移、执着追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有近乎一个甲子的奋斗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思想更是几乎贯穿了党的百年历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完成了两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两次“伟大飞跃”。邓小平曾多次讲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4]345}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不会如此光辉夺目,今天我们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就不会如此接近。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1]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侵略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从天朝上国沦为被欺凌被压迫的落后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无数先进的中国人纷纷以救亡图强为目标进行振兴中华的探索,但主客观等多种原因导致他们均以失败而告终。“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毛泽东对近代中国饱受侵略欺压

得出的历史结论。一个民族若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投身革命事业那一刻起,就始终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宏伟事业而不懈奋斗。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5]161} “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6]433}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于失败的教训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系统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牢牢把握住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乘胜出击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1]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 毛泽东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工程,必须接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同对苏联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相联系的。早在“一五”计划期间,毛泽东就已经觉察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苏共二十大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构建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毛泽东致力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44} 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规划,提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

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尊重价值规律, 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进一步具体地描绘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决议》强调:“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 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消灭一切剥削制度, 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 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 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

总体来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 为后来的两大历史性成就和两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和改革开放后的 40 多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程中连续不断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接续奋斗、不断开启历史新篇章的两个历史时期, 前者为后者打下基础, 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必须将这两个历史时期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视角中作整体考察, 而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 更不能对立起来、互相否定。对于“文化大革命”必须否定, 但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要否定其中“左”的错误, 对于那 10 年党和国家的全部历史和艰难取得的历史成绩则要予以充分肯定。这是《决议》为评价党史提供的根本遵循, 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

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地中国化的第一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具体实践的科学完美的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得以确立,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扬帆起航。”^{[8]63}《决议》指出, 毛泽东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1]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决议》科学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 更加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这是《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括和总结。相比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来概括毛泽东思想, 这个决议在表述方面更显科学、全面、准确。以往讲的“第一次飞跃”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飞跃, 这个决议使用“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表述, 并将其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 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的长度、广度和深度。这种“历史性”体现出一种开创性、正确性和必然性, 论证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空前的、被历史检验为正确的理论, 是历史规律与主体意志的统一。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有意识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成为全党共识, 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增强了理论自觉, 掌握了历史主动。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成功经验可循, 曾经试图靠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苏联革命经验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中国革命为此付出了沉痛代价。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 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1]在革命斗争实践中, 毛泽东坚持立足中国实际, 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革命问题, 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革命斗争实际的中国革命道路。《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对经过艰苦探

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

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系统提出了人民战争思想、现代化建设思想、政策和策略思想、建党学说等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1]

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发展的典范。《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1]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古老的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他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与肯定中华民族历史相统一,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9]534}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9]706}就“民族的”文化而言,首先要承认民族的历史及特性,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外来文化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9]707}就“科学的”文化而言,就是要反对一切封建腐朽的糟粕文化,弘扬符合

实践要求、贴近群众需求、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9]708}而是要从历史的发展变迁中认识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作用。就“大众的”文化而言,就是要坚持文化“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0]854}用文化的力量唤醒大众,使之成为大众所掌握,凝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力量。

《决议》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辩证关系。在《决议》中,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中可以看出,三者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而毛泽东思想开创性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将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地进行中国化的第一个科学理论,也是科学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光辉典范,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可见,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而广泛,只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视角来考察,才能充分展现其日生不滞的理论品质、一往无前的真理力量以及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四、毛泽东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光辉典范

高度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之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积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多次在“天欲堕”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以“赖以拄其间”的政治定力和历史担当挽救了中国革命。1945年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开始,而毛泽东是科学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前驱和光辉典范。

毛泽东曾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11]186}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为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很多重要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原则,深入揭示中国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进行划时代的科学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0]801} 他非常重视通过调查研究去总结党史的规律性问题,因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10]789} 他指出,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入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2]825-826} 可见,毛泽东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调查研究为手段,积极从历史发展中研究总结规律性问题,这对于以后科学总结党的历史规律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二是以与时俱进为基本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总结历史经验既要坚持历史的眼光,回到历史中看历史,也要坚持发展的眼光,以现实审视历史,以历史启发现实。发展的眼光本质上就是一种理论的眼光,必须通过理论的发展来适应实践的发展,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指历史的发展,^{[13]400} 强调研究党史必须从历史的具体环境出发,准确把握党史的本质性问题,同时也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新的结论、开拓新的视野、探索新的道路。正是善于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将实践上升为理论,毛泽东才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是以辩证思维为重要方法,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毛泽东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全面、客观、辩证地研究分析党的历史问题。他指出:“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13]399} “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7]101} 从正反两方面看待历史问题,有益于更加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四是以统

一思想为主要目标,继续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进。历史是在总结经验中前进的,未来也需要在总结经验中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通过组织召开中央会议、形成历史决议、开展整风运动等方式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仅统一了全党思想、团结了广大同志,而且起到了推进党的事业的目的。例如,遵义会议对红军长征中的失误进行总结纠正,迎来了红军的大发展;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错误进行系统总结修正,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前提;之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等会议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都迎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新曙光。

《决议》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继承了毛泽东的科学方法。第一,《决议》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承认历史错误,正确分析历史原因,深刻揭示党的历史的规律性问题。决议稿的起草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文件起草组认真学习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充分吸纳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深入研究重大问题,认真开展决议稿起草工作”,从而“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14] 第二,《决议》坚持与时俱进,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现在,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已经过去76年,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也过去了40年。4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大大向前发展了,党的理论和实践也大大向前发展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14] 第三,《决议》坚持辩证思维,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发展纵向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横向多个维度总结历史经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14] 从历史发展纵向来看,将党的百年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总结了理论成就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和实践成就的四次“伟大飞跃”。从社会发展横向来看,重点对党的十八大以来13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进行总

结,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第四,《决议》坚持统一思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进。在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14]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1]《决议》以“十个坚持”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这“十个坚持”,或者是毛泽东明确提出的,或者是对毛泽东重要论述的总结概括,每一个“坚持”都包含着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始终非常重视党的领导权问题,他在革命时期提出著名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6]47}重要论断,在建设时期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2]832}可见他一生都非常重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至上。对毛泽东而言,“人民”二字重千钧。他提出了一系列群众观点、路线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人民比作共产党人的“上帝”,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0]1096}三是坚持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本质内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毛泽东率先提出并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四是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毛泽东认识到,“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4]1470}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才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五是坚持中国道路。毛泽东一生都在追求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道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成功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探索。六是坚持胸怀天下。

毛泽东十分关心“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指出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10]870}人类进步的远景是“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15]1496}“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7]157}七是坚持开拓创新。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时预见形势发展的新趋向,在科学预见中创新。在党的七大上,他强调领导者要开动脑筋分析问题,要看得远,有预见,当新事物“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16]395}他注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倡在调查研究中创新,在学习借鉴中创新,在总结经验中创新。八是坚持敢于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一生,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斗争精神相结合,科学阐述了“统一”与“斗争”的关系,提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9]745}以及“有理、有利、有节”^{[9]754}的斗争原则等,科学把握了中国革命的斗争规律,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艺术。九是坚持统一战线。毛泽东善于研究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及各阶级的力量构成,科学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依靠力量和主要打击对象,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15]1257}必须将统一战线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十是坚持自我革命。毛泽东始终坚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整风运动等方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他指出:“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7]274}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及时纠正了党内错误思想,正确解决了党内矛盾,增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开创了自我革命的成功范例。

五、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党的深刻启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在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先进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决议》指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施和推进党的

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成功完成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先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1]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表明:只要是在能够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时期,党领导的事业就朝气蓬勃,从胜利走向胜利;只要是在动摇或削弱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时期,党领导的事业就停滞不前,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在革命战争年代,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1]中国革命从此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早在1943年5月,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16]22}1943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16]6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把党锻造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为此,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7]303}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1]从而使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

明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关系到党的性质宗旨,“要干什么”关系到党的使命任务。早在1935年12月,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13]42}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0]1004}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干什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0]809}“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17]561}“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0]1096}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作了精辟阐述,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始终牢记自己从哪里来、是什么样、向何处去。

坚持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5]3}“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5]277}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经验。毛泽东非常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他在《实践论》中强调,共产党员要“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5]296}他还形象地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10]1096}“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9]359}为此,毛泽东总结概括出一系列进行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首次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方法。1949年,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号召,为全党开展自我革

命提供了科学方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保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历史不断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是党在挫折和失误面前能够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奥秘所在。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实践的每一次跃进,都呼唤新的思想和理论。而理论的每一次飞跃,又都是以之前理论为前提的。中国越发展越凸显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越凸显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价值。”^[8]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决议》,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总结中科学把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认真汲取毛泽东无私无畏、奋勇争先、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守正求真、为民求实、创新求变的真理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 [2]王立胜.“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理论创新及意义[J].人民论坛,2021(21).
- [3]王立胜.在洞察时代大势中把握历史主动[N].西江日报,2021-09-16.
-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王立胜.7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轨迹与未来展望[J].毛泽东研究,2019(6).
-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J].求是,2021(23).
-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张 华]

Grasp Scientifically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Resolution* Adopted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ANG Lisheng, LI Xinyu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adopted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ummarizes systematically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One of 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s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It adopts historical narration by tak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background, describes Mao Zedo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it, elaborates Mao Zedong Thought as the first historical leap of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ese context, expounds scientifically that Mao Zedong is a brilliant model to sum up scientifically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Party Buil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drawing the strength of truth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onsecutive struggle.

Key Words: Mao Zedong; Mao Zedong Thought;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民族观解读

唐正芒 韦艳雪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毛泽东民族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各项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武器。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如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本文从毛泽东日常谈话的视角解读毛泽东的民族观,借以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毛泽东的民族思想,以服务于今天奋进新征程中的民族工作。

关键词:毛泽东民族观;毛泽东民族思想;日常谈话;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毛泽东的民族观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它从理论和实践上曾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1]299} 学界此前多从毛泽东著作出发研究毛泽东民族观。本文

试从毛泽东日常谈话这一新视角解读和分析毛泽东的民族观。

毛泽东民族观的基本出发点: 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毛泽东民族观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形成各民族平等相待、团结互助,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都十分

收稿日期:2021-05-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毛泽东日常谈话的收集整理与考证、运用研究”(项目编号:19ADJ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正芒,男,湖南衡阳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韦艳雪,女,广西柳州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重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红军长征途经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如何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让少数民族群众了解红军是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的代表人民的军队,支持并帮助红军,关系着红军长征能否取得成功。毛泽东所到少数民族聚居之处,都会告诫红军官兵要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平等团结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冕宁。毛泽东对大家说:“今天找同志们来谈谈大渡河两岸的形势和你们的任务。形势是前后都有敌人,前面是川军阻拦,后面有薛岳追兵,正面是彝族。我们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是不容易的,但还是有办法的。最要紧的是团结好彝族,回旋余地还是很大的。这就要有策略。老红军有经验,新同志要向老红军学习,只要你们能团结,又团结好彝族,就可以把敌人拖住。”^{[2]244}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刘伯承同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就全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一段佳话。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成功抢渡大渡河,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红军过草地期间经过藏族地区。为减少草地行军困难,毛泽东向杨成武问起向导问题。当杨成武回答说已经找到了藏族通司时,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3]272}正因如此,红军取得藏族人民的普遍信任和支持,并且在藏族群众的带领下,巧妙地避开了种种险境,走出人烟稀少、沼泽遍布的草地。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坚持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争取和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斗争,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首先,毛泽东坚持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1953年,针对当时民族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即有些地方因严重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思想而使民族关系很不正常,出现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情况,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4]145}他还曾说:“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产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

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5]117}毛泽东坚持有利于民族平等的主张和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赞扬和支持,为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毛泽东强调加强民族团结,以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新疆的民族团结问题。1950年2月,毛泽东向陶峙岳讲了关于新疆问题的三点指示,其中第二点为:“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6]180}1959年,有一次毛泽东听完王恩茂和赛福鼎关于新疆工作的汇报后再次指示:“在新疆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为此,首先要搞好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7]34}在解决西藏问题时,毛泽东还把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作为最根本的一个原则。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宴会上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8]347}1955年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出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举行的宴会上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9]348}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努力下,达赖和班禅的关系得到改善,西藏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汉藏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了,汉族藏族人民共同为祖国繁荣发展而奋斗。毛泽东的一生可说是为民族团结呕心沥血的一生,他在晚年时还操心着民族团结问题。1974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在北京开会期间,毛泽东约请他到中南海汇报工作。当谈到民族关系的状况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自治地方,民族关系要搞好,要落实好党的民族

政策,加强民族团结。”^{[10]148}正是在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指导下,广西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增强,各族人民积极投入到自治区建设中,为国家的建设发展贡献了力量。

毛泽东民族观的重要内涵: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不管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是毛泽东民族观的重要内涵。

在红军长征经过各民族地区时,毛泽东特别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经过苗族聚居区时,苗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政权欺压,对红军存在怀疑和害怕的心理,毛泽东要求大家严格尊重苗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一次,红军在拂晓时将要走到一个苗族山寨。毛泽东讲述了苗族受白军压迫的情况以及苗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并嘱咐大家:“到了苗区,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不许到处乱跑乱窜,不许随便动人家的东西。”^{[10]21}1934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过湘江后,对身边的警卫人员也讲道:“我们就要进入苗族区,苗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汉族不同,大家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11]437}毛泽东的民族政策在苗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苗族人民开始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们有的帮助红军缝制衣服、鞋子,有的为红军提供粮草,有的当起了向导,还有的踊跃参军,大大坚定了红军革命必胜的信心。1935年6月,红军长征来到了藏族地区,在懋功住下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把警卫员召集在一起说:“藏族同胞和苗族、彝族同胞一样,都是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我们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要和他们团结成兄弟一般,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打倒军阀统治。”^{[12]246}在毛泽东的宣传教育下,红军非常注意尊重藏区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保护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很多藏族群众也由此懂得了红军革命的道理,支援红军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为部队北上抗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同年10月5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来到回族聚居地六盘山下的单家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毛泽东对身旁的警卫人员说:“回民有许多规矩,比如他们

不吃猪肉,不说‘猪’字。我们到了回族地区,买牛羊肉吃可以,对猪肉提都不要提,这叫尊重少数民族习惯。你遵守这些规矩,他们就欢迎你,搞得不好,就会出问题。”^{[13]43}他还教育干部战士,凡是用猪油、猪皮做的饭食、用具,一律不准带,送给当地的汉族老乡。警卫员陈昌奉舍不得丢掉猪油炸的一口袋干粮,毛泽东就对他讲:“凡是用猪油、猪皮做的东西都不能带。”“你从江西带来了多少粮食?”“你这个口袋是个宝贝!”“不是宝贝,怎么吃了一年多还没有吃光?”“依靠人民才能胜利,光凭这两口袋干粮会早饿死的。”“回族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回族的穷人和汉族的穷人一样,也是受地主恶霸的压迫,生活十分贫困,他们也要闹革命,求解放!”^{[14]424-425}毛泽东对回族同胞风俗习惯的尊重,团结了回族人民,并有力促进了西北民族地区人民的觉醒,扩大了革命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也能随时感悟到毛泽东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正确态度。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宪法来保护各少数民族自己的风俗习惯。1955年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全体人员时,就对他们说:“现在的汉人是不会欺侮你们的。宪法上也写着,不能歧视和压迫,要尊重各民族自己的风俗习惯。”^{[9]456}为了让汉族群众认识到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重要性,毛泽东还主张开展民族政策教育。1963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安置汉族群众到少数民族地区时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汉族劳动人民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需要在汉族劳动人民中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劳动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15]242}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少数民族的深切关怀。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方面,毛泽东主张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10月8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接受以柳霞·土登塔巴为团长的西藏致敬团和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代表的献旗、献礼,并同他们进行谈话。毛泽东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

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8]611}1959年5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詹东·计晋美及随行藏族官员并与他们谈话。关于宗教,毛泽东也说道:“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6]43}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各族人民都有信教与不信教的自由,要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给予切实充分的保护和尊重,不能加以强迫或者歧视。

毛泽东民族观的核心思想: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民族观的核心思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就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主张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发展人口。1951年4月下旬,阿沛·阿旺晋美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进京参加和谈时,毛泽东对他说:“历史上,西藏地区的人口曾达到一千多万,现在减少到了一百余万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会灭绝的。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要帮助发展人口,对藏族人民尤其是这样。”^{[17]170}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的代表时 also 说道:“西藏……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8]611}正因为毛泽东推动人民政府提供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迅速发展,我国的民族凝聚力也不断得到增强,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

毛泽东强调,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之必需,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在。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来京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的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省西藏自治区代表团的团长和副团长,同他们谈话说:“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9]182}少数民族需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也离不开少数民族。正因为这样,1957年,毛泽东指示赛福鼎要尽快发展新疆的经济,改善新疆人民的生活。毛泽东对他说:“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7]33}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在毛泽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这一核心思想的指引下,从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极大支持。1955年初,毛泽东接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时说:“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今后西藏要重视发展经济文化,你们这次不能空着手回去。”^{[18]26}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推动下,中央人民政府还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大批农机具,加速了西藏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民族观的制度保障: 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毛泽东从我国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实际出发,要求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政治制度,以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

1949年准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时,毛泽东就提出:要考虑到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19]然而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发现,联邦制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听

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5]129}

新疆和平解放后,毛泽东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提出根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管理新疆。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和张治中谈话说道:“关于民族自治问题,可以按照《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处理。对于原在新疆的官兵,不必让他们进关,可以把他们的家眷送去,并多动员妇女到新疆去,就地成亲,从事生产,永远扎根下去。”^{[20]464}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心。为了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顺利推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决定通过宪法对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内容、权利等加以规定。1954年6月14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他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时说:“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9]251}就这样,我国宪法确立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就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根据宪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毛泽东十分关心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行使。1956年5月30日,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工作。在听完周小舟汇报关于湘西实行民族自治等情况后,毛泽东指出:“湖南少数民族多,起义人员多,要注意做统战工作。……土家族、苗族,要让他们自治,省委对他们要放开一点,不要抓得太严。”^{[21]48}在毛泽东的亲自督促下,很多自治地方也充分享有自治方面的权利,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稳步发展。

毛泽东主张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许多民族地区实现了和谐发展。但由于西藏历史的特殊性,建立西藏自治区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毛泽东为了使西藏也能够顺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做了很多努力。1954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达赖时提出:“现在可以把前藏、后藏、昌都各方面代表人物团结起来,组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9]293}这一提议为最终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良好的条件。1961年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中又说到了关于民族自治问题:“我对西藏的事情非常谨慎。……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由筹委会变成正式的地方自治政府。今年是不行了,我看是明年或后年。主要是个选举问题。现在先搞个选举法,准备在明年,最迟后年,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的任务是决定自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选举自治区政府,通过一个自治区自治条例,也就是那里的基本法。”^{[16]528}正是在毛泽东的带头努力下,1965年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此后,西藏人民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西藏地方社会事务,有效促进了西藏的跨越式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护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保障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正确的和英明的。

毛泽东民族观的关键环节: 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有效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关键。毛泽东重视并亲自指导制定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各项方针、政策,为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少数民族各项事业发展进步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少数民族干部具有汉族干部无可替代的优势。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必须不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依靠少数民族干部。1950年,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会后,毛泽东与王震谈话。在谈到减租减息和土改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在新疆进行社会改革必须采取稳重和谨慎的步骤,今年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试办性的减租,明年秋后进行农业地区的减租。当前最重要的是大量训练各民族的干部,必须有数千名民族干部懂得党的政策,懂得具体地组织

农民和减租的办法,并经过他们去组织各族广大群众,才能实行减租,否则是不可能的。要特别注意,不要有任何疏忽。”^{[22]335-336}1954年10月9日下午,毛泽东接见达赖喇嘛时 also 说道:“汉族要帮助西藏办一些能办的事,使大家觉得有好处。还要帮助藏族训练干部,帮助他们成长起来。”^{[9]293}

毛泽东还指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有一定的标准,即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1955年在中南海讨论到民族工作时,毛泽东说:“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民族干部。做民族工作要注意培养干部,更重要的是按共产主义的标准培养,如果符合标准,这样的民族干部多有几个,这个民族就不会搞民族主义,而是搞共产主义。”^{[2]247}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任务,即要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党员干部。195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发展党组织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时说道:“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县、州、区里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我们说的民族自治,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认真做到少数民族为主,汉人为副。”^{[23]331}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支持和推进党的民族工作的开展和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强调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需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种专业干部。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表达了这一观点。1959年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时说:“我们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后来中国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引者注),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比如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办起来了,各省各地的工业也都搞起来了,只有西藏还没有搞,因为西藏那时没有搞改革。西藏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要有藏族的,因此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文化干部、政治干部。要注意

培养这些干部。”^{[16]220}1961年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说:“西藏人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16]529}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既适应了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事业的需要,又缩小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真正促进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

如今,我国培养和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为解决民族问题和发展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大批的骨干力量,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与毛泽东注重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民族工作的关键环节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24]我们要坚持和发扬毛泽东的民族观,大力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携手奋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廖志高.回忆毛泽东同志二三事[M]//《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3]荆福生,主编.毛泽东与福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 [4]朱宁远,等,编著.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5]徐杰舜,主编.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
- [6]欧阳耀祥.“追随幸有缘”——毛泽东与陶峙岳[M]//邵康,编.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
- [7]赛福鼎·艾则孜.毛主席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M]//《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 2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10] 中共广西区党委宣传部, 中共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室, 编. 毛泽东与广西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上卷 [M]. 修订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12] 吴吉清.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 [13] 孙宝义, 孙靖雯, 邹桂兰, 编著. 毛泽东的幽默智慧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14]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毛泽东与甘肃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15] 杨荆楚, 主编. 毛泽东民族理论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5.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4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17] 殷理田, 主编. 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民主人士篇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18] 阿沛·阿旺普美. 哈达献九天——毛泽东与西藏上层人士 [M] // 邵康, 编. 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3.
- [19] 本刊特约记者. 宪法与国家政治体制 (三) ——王汉斌访谈录 [J]. 百年潮, 2011 (7).
- [20] 余湛邦. 鲜花一束——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侧记 [M] // 《缅怀毛泽东》编辑组, 编. 缅怀毛泽东 (下).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21] 赵志超. 毛泽东十二次南巡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 编. 毛泽东的足迹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 [23] 陈文书, 主编. 毛泽东与四川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 [24]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27日) [N]. 人民日报, 2019-09-28.

[责任编辑 孙小帆]

Interpretation of Mao Zedong's Ethnic Viewpoi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Daily Conversation

TANG Zhengmang, WEI Yanxue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Mao Zedong's ethnic viewpoint, as one key compon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spiritual weapon for CPC to make ethnic policies and to solve ethnic proble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Mao Zedo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thnic problems in China and proposed a series of valuable ethnic theories and policies such as the advocacy of ethnic equality and unity, the respect for local customs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support to their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exercise of the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and the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minority offic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o Zedong's daily conversation,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his ethnic viewpoint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grasp his ethnic thought and to serve the ethnic work on the new journey of today.

Key Words: Mao Zedong's ethnic viewpoint; Mao Zedong's ethnic thought; daily conversation; ethnic theory; ethnic policy

(上接第 23 页)

Self-Refor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a New Era

YANG Genqiao

(Institute of Marxism,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Anhui 230051)

Abstract: Having the courage to reform itself is the most distinct character and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CPC.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adopted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ummarizes its "remaining committed to self-reform" as one of the ten kind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its centenary endeavor, cracks the genetic code of CPC as a great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exhibits fully its great mission,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its strict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for self-reform for a new era. To study the spirit of the Plenary Session and utilize the precious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long-term struggle, we must grasp and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inner logic of its self-reform, implement its practice requirement for a new era, strengthen ideological guidance, take firm stand of the people, make full use of exemplary and leading role, and improve institutional syste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self-reform.

Key Words: new era;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f-reform

陈云在长征及长征史研究中的地位

蒋建农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陈云是长征出发时参加长征的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其作用既表现在在长征途中参与推动党的伟大转折和多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又体现在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和促进全国各路红军取得长征的最终胜利。他是作为亲历者向海内外宣传长征的第一人,也是最早把长征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系起来的宣传者,还是明确地把长征胜利和实现联合抗日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的第一人。他伴随红军长征的步伐,记录、阐述和撰写的相关文献,奠定了长征史研究和宣传的基础。

关键词:陈云;长征;长征史研究

陈云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参与者和核心领导成员,并且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重新建立了与共产国际已经中断一年之久的联系;陈云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关于遵义会议召开情况的现存最早的一份档案性质的历史文献;几乎与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同步,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第一时间向共产国际系统报告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作为长征非同寻常的亲历者,陈云撰写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成为最早全面宣传长征的传世之作。系统梳理和回顾陈云当年的相关历史贡献,对于深化长征史研究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一个侧面再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辉煌,教益良多。

一、陈云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

陈云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参加长征的,是当时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四位常委之一(另外三位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是遵义会议上补选的常委)。^{[1]173-174}他在长征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坚定支持者。以往学界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在遵义会议前后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的态度也是十分关键的。在长征以前的革命生涯中,陈云从未从事过军事斗争,但他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的成员,对第

收稿日期:2021-11-16

作者简介:蒋建农,男,河南信阳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

五次反“围剿”的过程和“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很早就有所了解 and 认识。他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就分析了福建事变后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合作协定，但军事指挥上却没有配合这一政治决策，错失粉碎敌人“围剿”良机的问题。长征开始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教条主义的机械指挥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这个错误很大”。^{[2]6} 长征开始时陈云由于没有随中央纵队行军，而是作为中央代表领导协调红五军团的行动，因此没能出席讨论改变红军前进方向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但是张闻天后来向他介绍了当时所争议的问题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陈云因此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他后来记述了黎平会议后党“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因而出现的转机，即“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2]7} 1934年12月13日陈云兼任军委纵队政委后，出席了1935年元旦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进一步明辨了是非。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一样，是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明确地把陈云和张闻天、王稼祥并列为毛泽东的坚决拥护者。^{[3]128} 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回顾这一时期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1]389} 他在1940年7月10日的自传中写道：“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一个人。”^{[4]166-167} 因此，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后，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并努力将其转化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成果，成为陈云更加自觉的积极行动。

第二，推动长征胜利的“政治局代表”。陈云在长征期间的职责不断变换和加重。在长征开始前，身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央白区工作

部部长的陈云，又被指定为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而红五军团肩负为全军出征殿后的重任。陈云不负众望，协同红五军团首长及全体将士掩护全军连续冲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转兵贵州后，陈云改任军委纵队的政委，遵义会议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正确组织路线的落实，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与此同时，陈云还承担了一项又一项临时指派的艰巨任务。首次占领遵义城后，他奉命担任警备司令部的政委；一渡赤水时他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中央纵队的笨重物资（轻装）；二渡赤水时又负责指挥架桥；抢渡金沙江时，他出任渡河指挥部政委，和司令员刘伯承一起创造了七天七夜指挥全军“巧渡金沙”的传奇；穿越彝族区时，他出色地组织并完成了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后续民族工作；随后，他一度接替拟到雅安冕宁地区开展地方工作的李维汉，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曾撰写《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告诫离开主力部队到沿途开展游击战争的同志，必须反对关门主义，树立独立打造新局面的决心。当时在地方工作部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长征期间中央对陈云没有明确固定的分工，他是个机动干部。他由于能力强，善于指挥协调，深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任，也深受部队指战员的信服，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5]297}

第三，离开长征队伍后的长征“参与者”。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泸定会议，正式决定派陈云到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并尝试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反映了中共中央的高瞻远瞩。早在1935年2月底或3月初，党中央就有要陈云去白区工作的动议，当时派潘汉年先行离队赴沪；4月底，当红军兵临昆明时，中共中央又有让陈云离队从昆明去上海的安排，后因行动受阻，他只得折回红军大队；6月12日，陈云结束了他8个月的万里长征（他当年记述是走了“一万两千里”，实际是近18000里），惜别朝夕相处的战友，由当地的地下党员席懋昭和随红军长征的冕宁地下党党员陈梁护送，由天全、雅州（今雅安）、成都、重庆等地辗转，经过一个多月的危险曲折，在7月中旬抵达上海。陈云出川，未能走完长征全程，对他来说看似一个遗憾，但却对长征

和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远离了长征队伍和战友，但陈云的思绪一刻也没有离开长征，因为他深知长征的胜负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上海领导开展地下斗争之余，他从8月就开始起草记录红军长征经过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的破坏非常严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陈云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的情况，这与陈云到上海的另一使命不谋而合。经宋庆龄安排，由当时在上海开诊所的马海德掩护，陈云一行登上开往海参崴的苏联客船。

9月上旬，陈云抵达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是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陈云第一时间掌握了相关的内容和精神。到莫斯科后，他先是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随后又到列宁学校学习，同时准备给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情况的报告。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系统地汇报了红军长征的经过，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阐述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以及红军能够转危为安并在极其艰险困难的情况下取得长征伟大胜利的主要原因。这是自1934年10月初因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破获（中央苏区与莫斯科的电讯是通过上海中转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整整一年后，共产国际第一次得到来自中共中央的全面汇报。李德曾不无怨意地记述了毛泽东派陈云去莫斯科的情况：“他的使命绝不仅仅限于按毛泽东的旨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据我以后知道，他首先是要说服苏联政府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质上和军事上的援助。”^{[3]142}的确，陈云的汇报不仅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引起斯大林的特别关注。斯大林专门抽出时间于12月3日下午再次接见陈云、王明和康生，详细询问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也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希望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支援中国革命的愿望。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因此进一步设法建立与正在向陕甘地区进军的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先后派张浩、阎红彦、刘长胜等三批次的人员携

带文件、密码或电台，由不同途径回国寻找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同时还通过宋庆龄等渠道，了解中共的最新情况，并设法建立联系。此后，负责与中共中央和长征队伍的联系与协调工作，成为陈云在莫斯科期间的主要职责之一。

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11月中旬，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并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林育英（张浩），抵达瓦窑堡，先后同张闻天和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从前线回来的毛泽东等见面。林育英的到来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表明共产国际对在遵义会议上中共独立自主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认同，对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认同；其次，他对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的口头传达，推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正式确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再次，他作为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站在中共中央的立场协调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大大加重了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行径作斗争的砝码，对于团结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全体将士北上，最终促成全国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些成就的缘起，主要就是基于陈云关于中国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与沟通。1936年3月，从苏联辗转回到陕北的刘长胜带回共产国际七大的书面文件和密码。但是，由于电台功率等技术原因，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从1934年10月中断的电讯联系直到1936年6月16日，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文原稿注有“发报第1号”字样）才得以恢复。^{[5]233}首次进行电讯联络时，共产国际请陈云验证来电是否来自中共中央。陈云离开长征队伍赴上海前，刘伯承为他写了两封信介绍沿途的友人和他弟弟掩护陈云，信件藏在其随身携带的暖水瓶底部的夹层中，此事只有中共中央极个别人知道。因此，陈云复电中央询问：“陈云来我们这里时把信和钱藏到了什么地方了？”对方回答：“放在暖水瓶底部和里面了。”这样，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直接电讯联系才正式恢复。^{[1]216}

电讯联络的恢复，使中共中央在确定向陕甘进

军战略方针时就计划的“打通国际路线”，得以提上议事日程。为迎接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和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制定宁夏战役计划。10月，陈云奉命拟率队并携带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取道外蒙古回国，迎接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后鉴于宁夏战役受挫和国内形势的变化，11月3日，陈云和王明致电中共中央明确：不再执行从外蒙古输入军事物资的安排，正在研究经新疆哈密运输装备的计划，询问有无占领甘肃西部以接收物资的可能。^{[1]225}12月8日，陈云按计划率队乘车离开莫斯科到中苏边境苏联一侧的霍尔果斯，等待接应奉命西进的西路军。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4月18日，陈云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令，筹集食品衣物，经迪化（乌鲁木齐）到星星峡，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接应安置西路军余部李先念等417人。陈云的长征之缘，就此告一段落。

从1935年6月由天全离开长征队伍以来的两年间，陈云虽然人不在长征队伍里，但一直心系长征。他是重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第一人，是推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促进中共中央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战略转变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作为长征的亲历者，他也是中共党内第一个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伟大业绩的传播者。陈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二、陈云与长征宣传

陈云关于红军长征的宣传，有两个重要特点：一者他是红军长征的主要决策人之一，是红军长征诸多决策内幕的知情人和见证人；二者他是海内外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诚然，以《大公报》临时通讯员的名义在西北考察的范长江，自1935年9月至1936年6月陆续在《大公报》发表沿途见闻69篇通讯（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内中有许多关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形，以及刘志丹红军情况的报道。比如他在9月13日《大公报》刊载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认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毛尔盖地区集结一个多月后的动向，必是北出。这篇报道的发表时间就早于陈云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首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但范长江的那些报道尽管难能可贵，可毕竟是局外人的道听途说，

其系统性、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以及传播面和影响力，自不可与陈云的相关著述相提并论。

陈云关于长征的著述中，重要性和权威性要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为最。但这二者都是内部的机密文件，很长时间都是秘不示人的。而在当年就产生轰动效应的则是《英勇的西征》和《随军西行见闻录》。

1936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发表署名“施平”的《英勇的西征》一文。笔者1995年为参加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撰写一篇论文时曾向当时主持编辑《陈云文选》的一位负责同志（20世纪80年代曾任陈云的秘书）询问此文的作者是否就是陈云，他说他曾问过老人家，陈云否认写过此文。但笔者将此文同《随军西行见闻录》对照，二者的起止时间是一致的，内容上也有相近之处。而且，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也将此文归在陈云名下。可是因为有权威人士的否认，只好存疑。1996年第5期《党的文献》重新发表《英勇的西征》，文章注释明确，“施平”就是陈云。2001年第4期《党的文献》发表陈云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对比之下更是明显可见，《英勇的西征》不仅主要内容与陈云对共产国际的报告大致相同，甚至有些段落的行文也相当一致。“施平”应该是“史平”的谐音，《英勇的西征》就是根据陈云对共产国际的报告整理的。报告是在会议上进行汇报的记录，其中有陈云的临场发挥和现场提问及回答问题的记录，而《英勇的西征》是正式公开发表的文本，发表前对文字作过推敲，删节了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因此更为严谨、简洁，或者说是报告的“压缩版”。从一般读者的角度看，更便于阅读和普及。

陈云宣传长征的最主要作品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他在上海蛰居等待赴苏联时就开始起草，1935年秋完成（略晚于《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他假托为一名被俘后随红军行动的国民党军军医，化名“廉臣”，回顾自己在长征途中8个月的不平凡经历，全景式地真实记录了红军长征的一段历程。《见闻录》全文约四万五千字，完全出自作者的亲历亲闻，是

作者在离开长征队伍不久即写出的，加之作者曾经参与长征的领导决策这种特殊身份，因而兼具真实性、思想性、权威性、生动性，既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见闻录》系统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开启长征，到1935年6月陈云从天全离队这8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的这段行程。单就战役而讲，《见闻录》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连破敌人四道封锁、转兵贵州、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的经过，具体描绘了红军将士一路过关斩将、势不可挡的豪迈气概和传奇经历。这虽然不是长征的全部历程，但还原了中央红军整整一年长征史中三分之二的过程，描述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中近一万八千里的行军作战经过。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正面记述红军长征的历史，而且将这些战役行动中红军指战员之迅捷、果敢、勇猛、机智、坚韧、刻苦、耐劳和英勇无畏，刻画得纤毫毕现，其传神和点睛之笔，奠定了后世几乎所有长征作品对相关情景描摹的基调。

第二，《见闻录》不仅系统地记载了长征中红军将士行军打仗的主要过程，而且还用一个真实情节的记录，细致入微地生动再现了红军的官兵一致、群众工作、组织纪律、民族平等、宗教政策、优待俘虏以及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帮助等感人至深的场面。比如，与彝族交往，对于红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见闻录》详细记录了红军由冕宁至安顺场过彝族区，在遭遇不了解红军情况的彝族群众围击时是如何应对的情景：“赤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声明共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当时赤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十余部落。

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7]79}

第三，《见闻录》用第三者的眼光，描绘了红军领袖们的坚毅、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的作风。如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他在为路旁饿以待毙的农妇让衣让粮时所表现的一片爱心；如朱德素有“伙夫头”的称谓和他与士兵水乳相融的关系；如“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如徐特立、林伯渠等的乐观、豁达和和蔼、可敬；等等。在《见闻录》中提到的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还有张闻天、彭德怀、刘伯承、董振堂、林彪、李富春、罗炳辉、贺诚、周昆，以及陈云在长征期间未曾谋面的赵博生、陈毅、徐向前、张国焘等几十人之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对普通战士和英雄群体的记述。比如关于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他写道：“此次战役，赤军在队伍中大施宣传及奖励此十七个抢渡大渡河者，尊之为英雄。的确，我虽非军人，但在军队中服务已有几年，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亦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十七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故共产党常以共产党团员为赤军模范。此辈共产分子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7]82}在国民党方面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大加诋毁的情况下，如此全面真实地歌颂红军及其领袖，宣传红军的政策及红军的英勇无畏与不可战胜，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民心，团结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的作用，而且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素材。

此外，《见闻录》还描述了红军将士肩负拯救民族于危亡的责任，万里跋涉北上抗日的坚定志向和英勇行动，在沿途宣传抗日主张的情况。比如毛泽东在遵义民众大会上表示“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7]60}在述及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陈云写道：“此时赤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赤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之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故赤军至天全

时,部队中有一歌曲,词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务,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7]85} 陈云在分析红军为什么能够冲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克服千难万险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的原因时指出:“赤军兵士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赤军士气大振。”^{[7]86} 针对国民党所谓“赤军甘心内战,不顾外患”的污蔑,陈云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民众共赴国难的政策:“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7]90-91} 已对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了然于胸的陈云,在《见闻录》的末尾,以第三者的口吻感叹:“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袭,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7]91} 把夺取长征胜利和实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这在中共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和全体红军将士的初心与夙愿。这表明,《见闻录》不仅是记录宣传红军长征的作品,而且是把红军北上抗日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联系起来进行宣传的优秀读物。

《见闻录》写成于1935年秋,最早发表于1936年3月中共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7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刊载此文。8月5日出版的《救国时报》还刊载了《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这样就首先在海外宣传和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目前所知,国内最早出版并全文收入此文的是1937

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①一书。需要强调的是,该书收录的文章虽然都是关于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内容,但专门谈红军长征的只有陈云这一篇。《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第一版印行五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此后各地出现过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有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和全国解放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国内较早出版的单行本有两种,即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本(题目改为《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和1937年12月陕甘人民出版社本。此外,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还将斯诺采访毛泽东关于红军长征的那段记述同陈云的这篇文章一同结集出版,题为《长征两面写》(32开本,62页,由国家图书馆收藏)。1985年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曾经全文发表了这篇著作。199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云文选》又根据1936年7月莫斯科出版的此文单行本,重新校订,作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附录全文收入。《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部系统反映红军长征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的著作,陈云是传播红军长征事迹的第一人。

三、陈云与长征史研究

陈云对长征史研究的贡献,集中体现于他当年撰写的四种极其珍贵的文献和著作。前面着重介绍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并提及他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和1935年10月15日他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即《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如何从苏联移交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如何经陈云认定是他的笔迹,以及胡乔木如何考证《提纲》的写作时间是1935年2月至3月上旬并得到陈云本人认可的,这些情况已被学界所熟

①该书是由北平进步青年王福时(张学良的幕僚、东北大学负责人王卓然之子)召集李华春、李放、郭达等人,在美国记者斯诺与夫人尼姆·威尔士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汇集并翻译斯诺等外国记者有关苏区的中英文报道编辑而成。该书系32开本,共8篇300页。前三篇《毛施会见记》《红党与西北》《红旗下的中国》,是斯诺1936年7月至10月在陕甘苏区采访毛泽东等的整理稿(当时斯诺根据译音取中国名字为“施乐”);第四、五、六篇是根据英文刊物《亚洲》刊载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有关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的三篇见闻翻译的,即《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第七篇《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是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是3月10日毛泽东亲自托人捎给斯诺请他“广为宣传”的;第八篇就是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知。^①并且学界公认这篇文献是关于遵义会议现存的三篇最重要的档案文献之一。^②与此相同,陈云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给共产国际汇报的记录稿,也是作为档案留存,很长时间未能公开,2001年第4期《党的文献》才首次发表了此报告俄文记录稿的翻译整理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陈云文集》第一卷,再次全文收入此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6册,发布了该记录的译稿。这篇文献也被学界公认是长征史研究中为数不多的第一手档案文献之一。此外,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关于长征、遵义会议和西路军等问题,还有过多次批示、回函和谈话。这里综合上述材料,从史料价值和观点指导的角度,谈谈陈云对长征史研究的贡献。

第一,关于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也就是长征的实质或直接目的。长征是从红军丧失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的,又是以能否找到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立脚点)作为其胜利与否的标志。根据地的存在壮大与否,关系红军与党的生存,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刚刚抵达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就豪迈地宣布: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无独有偶,几乎与毛泽东同时,陈云也写道:“我们深知牢固的根据地为红军所必需,没有这种根据地,可使国内革命战争之进行感受莫大的困难。从1927年起,我们党就已开始用全力来解决这个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直到今天,这还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他接着叙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为保全红军实力,中共中央“于是决定主力退出中央苏区,以便在中国西部广大领土上建立新的根据地。因此,中国共产党便有这次著名西征之组织”。^{[8]104}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先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目的,遵义会议后又一度以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为目标,在当时红军队伍中,许多人都认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就标志着

西征(长征)的结束。陈云离队时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认为“两军会师以后,建立了新的、更强大、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他断定“西征目的已经达到了”。^{[8]105}可见,陈云把根据地的“得”与“失”作为长征成败标志的观点,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而他关于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把根据地条件等同于有无人民的支持,认为人民的支持,“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9]207}的阐述,都反映出这一观点当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第二,关于长征出发前是否做过精心准备的问题。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认为当时的突围行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10]18}与此相应,后世的学术著述在论及红军被迫离开苏区长征时,也大多一味责难“左”倾领导者不准备不动员,仓促行动。而陈云当年的文稿却给出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读。他在《见闻录》中就明确:“此次赤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赤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7]46}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和公开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中,更是具体列举了当时所做的各项准备。一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前,党已经派遣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进军闽浙皖赣地区,在从东北方向“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的后方击敌;同时派红六军团西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在从西北方向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的后方扰敌。二是对红军基本干部进行加速训练,大部分干部进过红军大学、步兵学校、防空和防毒的专门军校,以及卫生、通信等学校,接受过培训。三是采买60万石粮

①有些学者考证这篇文献形成的时间是在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前后,应该是陈云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书面材料的一部分,而不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参见费侃如:《〈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形成时间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2期。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②另外两篇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食,加紧生产军装、火药,产量提高了6倍到30倍,还吸收了三万志愿者参军。陈云称在这两到三个月的“短促期内,而准备工作还是做得尽美尽善”(他给共产国际的汇报称“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2]2})。^{[8]104-105}

陈云的记述,再现了一段被误读或忽视的历史——长征不是仓促无准备的行动,而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战略行动。事实上,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难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形势早已明朗,中共中央就战略转移问题请示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6月就回电表示原则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了保密,“左”倾领导者将行动神秘化,或是把计划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是可能的,但不进行任何准备,完全不进行动员是不可能的。循着这样的思路回顾长征前的历史,不难发现,当年做了不止陈云所记载的那些准备工作,还进行了组织地方武装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守阵地、和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达成借道协议、安置伤病员、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思想动员、派遣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以第二抗日先遣队名义远征等,都是长征的前期准备。上述情况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尽管“三人团”专断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指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给党和红军、给苏区人民造成严重损害,但是,在危急时刻,党的领导还在,党中央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一般的红军指战员,无不从坚定的党性出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上级的指令。用革命理想凝聚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将士,不仅没有在危急关头如其他军队那样“大难临头各自飞”,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核心意识。

这一事实还表明,尽管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在长征中党中央的领导并不是始终坚强有力的,但是,和过去各路红军在各自的根据地孤军奋战不同,长征不仅是中国南方各路红军的共同行动,而且得到了坚持在南方十多个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留守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大力配合,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一次相互配合的战略行动。血脉相连的阶级基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中国共产党人

的组织原则,使全党和全军上下普遍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广大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信仰没有改变,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没有动摇。他们的忘我牺牲精神和勇往直前的革命斗志,以及坚韧不拔的党性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风骨,是中国共产党在最危难的时刻依然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之原因所在。这也是主力红军能够相对顺利地连续冲破国民党大军的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的原因之所在。而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的安全保存,是后来中共能够实现遵义会议的转折的基本前提。对此,陈云有精确的分析和总结:“如果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在领导工作中,当然也有过个别的错误和失败,但我们的力量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及时地发现并纠正这些缺点。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2]28}

第三,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问题。坊间一度流行一种观点,即遵义会议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在开展延安整风之后。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11]作为那段历史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和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陈云非常清楚,在遵义会议上以及以后的长征中,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也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对于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沙窝会议调整常委们的分工,正式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12]467}陈云由于已经离开中央红军并不知情)。^{[7]43}这里对陈云1935年关于长征的几种著述中与毛泽东相关的记载予以综合分析。

前文已述,在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他后来回忆:“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讲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的那些。”^{[3]168}他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一是讲遵义会议前党内对于错误的军事指挥是有争论的,“毛张王(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引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7]42}其意是指毛泽东等是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立的正确意见的代表;二是具体记录会议讨论的情况,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指李德——引者注）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7]43}这段话表明毛泽东所代表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完全赞同；三是说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常委，并在会后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7]43}表明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核心，参与军事决策；四是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中央各常委，在遵义会议决议下发后到各军团传达决议精神，得到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拥护。这些记载非常客观，也非常明确，表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的主张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拥护，他本人因此重返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层。

在《见闻录》中，囿于叙事者的身份和视角，陈云没有正面提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职务和作用，但毛泽东是被他提及最多的人物。他用第三者旁观的视角，在突出反映毛泽东作为红军最高首领作用的同时，兼及其不平凡的多彩人生和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他把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与徐向前、贺龙、萧克等率领的红军并列，称它们“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7]44}他介绍了朱毛红军的由来及其在八九年间愈战愈强的光荣历史；他描述了毛泽东的文人气质，说他“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7]45}待人谦和；他记述了毛泽东在路遇即将饿毙的老妇和童子时，赠毛线衣、赠被单、赠米的行动和仁爱；他见证了毛泽东手执竹杖步行登山，双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7]63}的吃苦耐劳；他在感叹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二占遵义胜利之出奇制胜时，特地写道：“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7]64}实际点明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人物，对毛泽东的拥护和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说陈云在对下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对外宣传红军长征时，还有所遮掩和保留的话，那么，他在向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隶属的上级组织共产国际汇报时，则是直抒胸臆。他在汇报遵义会议的成就时明确写道：“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

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2]1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云绝不止是为了突出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地位，他强调的是全党的成熟。他在述及红军为什么能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时明确表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2]27}“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完成。”^{[2]26}在这里，陈云指明一种现象，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已经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语），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提出和解决党所面临的任务。正是基于此，陈云不无自豪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2]33-34}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党能够灵活和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培养出了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党的领袖和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我们有真正英勇的，为民众根本利益而不惜牺牲的共产党干部。”^{[8]123-124}在这里，陈云用“党的领袖”专指毛泽东。

众所共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既有其成熟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又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因此，中共一大就作出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13]8}自中共二大确立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和重大的决策都要听取甚至完全秉承共产国际的意见。遵义会议才第一次改变了这种状况。陈云结合长征前后的历史，及时向共产国际阐明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及其力挽狂澜从危机中挽救革命、挽救红军、挽救党并取得长征伟大胜利的历史，这不仅使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崭新的认识，而且为我们今天研究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如何确立的，提供了重要的佐

证。当时听取陈云汇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就表示：“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外国党的这类材料”，“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14]57} 陈云的汇报和沟通，又恰逢共产国际七大决定以后对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不再过多过问的重要时机，这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新的领导集体的巩固，为中国革命在此后的征程中能够继续独立自主地秉承遵义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陈云对于长征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比如，他第一次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的长征史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得失，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的指挥是错误的，而遵义会议后的第三阶段则取得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2]9} 他系统记录了遵义会议召开的细节，包括动因、时间、参加者、过程、内容和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及其成效，至今再无更权威更全面的材料可以替代他的记录（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他精辟概括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种种错误，这不仅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相关内容的丰富，而且还有不尽相同的独到见解；他在充分肯定遵义会议伟大成就的同时，第一个提出这次会议具体决策中的一个失误，即改变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转向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发展，他认为“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7]37} 这反映了陈云对长征前进方向的思索；他细致阐述了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是有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二是“我们的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成长起来了”，^{[8]120} 三是红军长征到处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他总结说直到长征初期“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认为“如果我们在西征时采取新的策

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2]30-31} 希望“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2]34} 陈云亲笔书写的长征历史文献，既是对长征历史真实系统的记录，也是党中央核心层当事人对长征历史的深刻总结，开启了长征研究的先河，奠定了长征史研究与宣传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2]陈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3][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M]．李逵六，等，译．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5]刘英．刘英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M]．修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 [7]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陈云．英勇的西征[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1]蒋建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J]．党的文献，2016（1）．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一九二一年七月）[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孙小帆】

（转至第39页）

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 党纲制定问题初探

王新生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北京 100080)

摘要:中国共产党党纲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第一个简单党纲,到《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再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制定,形成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党纲。中国共产党党纲的几种文本,都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始终把建立工农专政作为其宗旨,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主体,保证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不断纯洁队伍、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此后党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强大。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的党纲制定及其发展过程,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与中国建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共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其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这个纲领虽然还很粗糙,还需要在后来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完善,但其历史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党纲

中国共产党党纲是党的政治主张的集中反映,规定着党的奋斗目标,是指引中国共产党前进方向的一面鲜明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在于其在创建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纲的制定。目前学术界对党的创建时期甚为关注,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党的创建过程中党纲制定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砖。

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 制定的党纲及其作用

(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讨论制定的党纲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就取名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它在成立后通过写信、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其他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

收稿日期:2021-11-17

作者简介:王新生,男,河南郑县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党发起组的作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对党纲的讨论和制定对其他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发展及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首先对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对党纲问题的讨论及其制定的党纲的作用进行探讨。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酝酿成立时,就很重视党纲的制定。李达回忆,当时起草了一个党章^①草案,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由于李达对“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1]7-8}施存统回忆说,当时参与起草党纲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内容共十余条,“大概提到: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等”。关于党纲条文的依据,施存统说:“那时我们没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2]36}包惠僧回忆,党纲草案中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3]438}

三个人关于党纲草案的回忆尽管简单,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但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其一,赞同社会革命;其二,主张劳农专政;其三,反对到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其四,没有参照的蓝本,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按照自己对共产党的理解讨论制定的。

据此,可以这样认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的党纲草案,尽管带有某种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在主体上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思想模糊的投机分子望而却步。如戴季陶,他看到党纲草案中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便借口他不能同国民党断绝关系,没有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这说明,这个最初的党纲保证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朝着健康纯洁的道路发展。

(二)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的党纲推动了其他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的党纲草案,对各地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先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2月李大钊送陈独秀离开北京时,两人就商谈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酝酿成立时,陈独秀对党的名称叫什么拿不准,征求过李大钊的意见。张申府回忆:“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4]220,221}党的名称是党纲的最重要的一条规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定名为“共产党”,是陈独秀与李大钊商定的结果。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的9月中旬,张申府到上海迎接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住在陈独秀处。陈独秀给他讲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经过,希望他回到北京后转告李大钊,在北京赶快建立共产党组织。张申府于9月下旬回到北京后,把陈独秀与他谈的情况转达给李大钊。另据张国焘回忆,他在7月中下旬为躲避军阀段祺瑞的迫害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陈独秀告诉他:“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他们“曾谈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5]133,136}张国焘回到北京后,也把陈独秀同他的谈话汇报给李大钊。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定名为“共产党小组”,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紧密,从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建党战友关系,以及张申府、张国焘回忆在上海陈独秀与他们交谈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采用的应是上海组织制定的党纲。11月发生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内部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意见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张申府应聘到法国中法里昂大学教书。为了发展党员,李大钊做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竞林等六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吸收他们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接着,又发展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五四运动后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同情,也常发表一些与马

^①当时常把党章和党纲混用。

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当李大钊发展他们的时候,他们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虽抱有不同意见,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赞同的,因而他们愿意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然而,随着工作的开展,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日益扩大,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中引起许多不方便。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者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很快退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这一史实印证了施存统在回忆中说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的党纲中“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也印证了这个党纲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政党,保证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纯洁性,并朝着健康的发展方向发展。

再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湖北籍的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商议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包惠僧回忆:“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对党员政治活动规定很严格,如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等,并带来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及有关苏俄革命的小册子。”^{[6]18}1920年10月底或11月初,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内成立,取名为“武汉共产党支部”,成员有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可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纲对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工作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参与起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纲的施存统回忆:“不久,我和陈公培出国。陈公培抄了一份党纲去法国,我抄了一份去日本。”^{[2]35}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到法国后,先后发展刘清扬、周恩来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赵世炎、陈公培也先后到达法国。张申府、

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成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组织,并报告了陈独秀。施存统到日本后,根据陈独秀的要求,与在日本鹿儿岛留学的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旅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可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制定的党纲,对旅法、旅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发生了重要影响。

上述史实说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制定的党纲,尽管还不完善,有许多缺陷,但主体、本质上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特征,因而保证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朝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发展,同时推动了北京、武汉、旅法、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开展。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及其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出版,陈独秀执笔的《短言》鲜明地指出:“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底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7]76-77}

陈独秀的《短言》表示了这样两个意思:一是中国无产阶级要想从奴隶地位解放出来,必须建立俄国式的共产党,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二是用阶级战争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表明了《共产党》月刊的办刊宗旨,是陈独秀对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理解的一大进步。根据这个宗旨,《共产党》月刊登载的文章主要有这些内容:介绍俄国共产党历史和苏维埃俄国的有关情况;列宁的生平及著作;共产党建设知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情况和文献资料；等等。

对俄国共产党、列宁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理解，使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了新的党纲——《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主张废除政权”^①。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8]48-49}

关于共产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具体为：“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方法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8]50}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8]51}

《中国共产党宣言》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的理论，表明中国共产党以俄国共产党为建党样板，以走俄国式革命道路作为自己的宗旨。这就将中国共产党同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根本区别开来，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继续建立，排除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的干扰，发展队伍，起到了保障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宣言》与长沙、广州、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即将其寄送各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8]48}

陈独秀在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将长沙同北京、汉口、广州等地一起，列入建立共产党早期

组织的计划之中。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曾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5]139}

1920年11月，毛泽东接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他们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李达还将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及《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的情况告诉毛泽东，并且寄来了《共产党》月刊等宣传品。11月中下旬，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会议在讨论用何种办法改造中国与世界时，毛泽东把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1. 社会政策；2. 社会民主主义；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 无政府主义。”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9]553-554}

毛泽东、何叔衡的意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赞同，会议表决结果是：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赞成社会民主主义者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弃权者三人。这次会议，为长沙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74名新民学会会员，先后有31名加入共产党组织。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维经斯基把与北大俄文系教授柏烈伟一起帮助北京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党组织的俄共党员米诺尔^②派到广州，帮助建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9月，米诺尔与另

①原文如此。联系全文看，这是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进入没有政权、军队和法庭的共产主义社会。

②K. A. 斯托扬诺维奇在中国的化名。

一个俄国共产主义者别斯林由广东台山籍北大学生黄凌霜陪同前往广州。如前所述,黄凌霜是无政府主义者,在陪同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后,将他们引荐给曾是北大学区的区声白以及梁冰弦、刘石心等无政府主义者。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在广州并没有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只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办了一个《劳动音》杂志。

由于米诺尔和别斯林没有完成建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任务,12月底,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到广州后,陈独秀就找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经过商议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由于米诺尔和别斯林与无政府主义者有合作关系,且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曾有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积极一面,陈独秀曾找他们开过两次会,争取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会议的有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等五位无政府主义者,维经斯基也参加了会议。由于维经斯基对米诺尔和别斯林的工作不满意,没有让他俩参加会议。

关于陈独秀、维经斯基与无政府主义者开的两次会议的情况,主要见诸参加会议的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和刘石心的回忆。谭祖荫说:“第一次谈在广州开展工人、农民运动问题;第二次谈到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问题。陈独秀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不同,手段也不同。我们认为如果合作,我们可以跟你们做,革命成功后再分家。陈独秀说这样不对。我们知道合作不了,就分手了。”^{[10]763}刘石心回忆,当时“陈独秀来提出要组织广东共产党,要合作的人,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退出合作”。^{[11]768}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比较简单,但也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陈独秀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谈合作问题时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宗旨为准则,认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主张,加入共产党,开展工农运动。第二,无政府主义者愿意与共产主义者合作反对封建军阀统治,但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纲领,不愿加入共产党受组织纪律约束,因而,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鉴于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作的严重障碍,此后,陈独秀等同无政府

主义者在报纸上展开激烈的论战,以至于包惠僧后来来到广州后,陈独秀对他说:“无政府党的一群青年,如区声白、朱谦之等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在《群报》上经常同无政府党打笔墨官司。”“区声白是个小鬼,朱谦之是个疯子。”^{[12]433,434}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给济南的王乐平写信,约其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王乐平是老同盟会会员,虽然他办的齐鲁书店销售马克思主义书籍,但他本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向陈独秀推荐了常到齐鲁书店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王尽美和邓恩铭。王尽美、邓恩铭在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得联系后,于1921年春在济南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尽管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现存的资料比较少,但从王尽美、邓恩铭及济南党组织工作开展的情况看,应该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宗旨建立和发展成员的。

长沙、广州、济南按照《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宗旨建立起早期共产党组织并以此为准则发展成员,扩大了全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数量、布局和成员队伍,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了条件。

三、中共一大对党纲的讨论和制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会议制定的临时纲领

1921年春,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提上日程,为成立大会起草党纲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筹备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自然也很重视党纲的起草。李达回忆:“一九二一年二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1]9}李达的回忆说明,在起草党纲时陈独秀与李汉俊在规定党的组织原则——中央与地方组织关系问题上存在分歧。

6月10日,张太雷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曾说,3月间召开过一次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

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也表明了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13]24}

除张太雷这个报告外,目前没有发现3月间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代表会议的其他有关资料。张太雷是受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遣,作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到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并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为中国科书记。他的报告说明两个问题:其一,3月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曾讨论制定过一个临时纲领。如果说从当时的交通条件、通信条件看,不一定所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都参与讨论制定临时党纲,但至少上海、北京、广州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有条件参与的。当时无论是交通条件还是通信条件,三地之间都是比较容易联络的。同时,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已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更为重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发起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最为紧密,许多建党事情都是两地组织商议着进行的;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虽然成立较晚,但是由陈独秀亲自指导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许多事情都要派人到广州向陈独秀请示。因而,张太雷报告中说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3月制定过一个临时纲领是可信的。其二,临时纲领的主要内容是确定了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构和工作计划,以及发挥社会主义青年团作用和在其他社会团体中开展工作,等等。临时纲领为党的一大制定正式纲领提供了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制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讨论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是大会的主要内容。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会议选出一个由张国焘、董必武、李达等人组成的委员会,于25日、26日起草纲领和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7月27、28、29日,大会进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讨论起草委员会提交的党纲和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

由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时制定的党纲及后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已经把走俄国式革命道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宗旨,代表们在

讨论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时,没有产生什么分歧,意见基本一致。但在讨论党当前的斗争目标和手段、党员是否可以在现政府做官问题时,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 关于党在当前的斗争目标和手段的讨论

关于党在当前的斗争目标和手段,李汉俊认为,“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他认为,“无需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的,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首先应真正的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理论给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才能有力组织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主张“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原则的都可入党”,而“参加党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是不必要的”。^{[14]124}刘仁静则反对李汉俊的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用公开的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14]124}他主张党应该立即向产业工人进军,在工人中发展党员。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李汉俊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重视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有合理正确的成分;但轻视工人阶级和开展工人运动,同时不主张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是错误的。他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刘仁静重视到工人阶级中开展工人运动,主张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是正确的;但把知识分子绝对化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一概加以排斥,则是不正确的。其实,在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救国救民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在由新式学校学生、教师和报纸杂志的记者形成的新知识群体中,不少先进分子在救国斗争中经过比较选择马克思主义,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知识分子占了成员的大多数。参加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刘仁静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党内

多数人对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困惑。

在讨论时，上述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但大多数人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于是，大会通过的纲领写道：“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15]3}

2. 关于党员是否可以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当议员和到现政府中做官的问题的讨论

党员是否可以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当议员和到现政府中做官的问题，在会上引起了代表们更为激烈的争论。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到国会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种认为党员不能到国会做议员和到现政府做官。在大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结论。

在大会的第四次会议上，代表们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辩论。反对党员到国会做议员和到政府当官的一方认为：到国会当议员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多数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且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主张党员到国会当议员的一方认为：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就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平时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阔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

迫他们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会后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16]27}

关于这个问题，大会通过的纲领这样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15]4}但这条规定的英文稿又在括号中注明：“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这说明，尽管当时两种相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在纲领中还是同意了反对共产党员到国会做议员和到现政府做官的意见。但同时又说明，这个规定是暂时的，在中共二大上仍可讨论修改。

上述关于党员参加国会的讨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长期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没有民主制度的基础。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国会，到中共一大召开为止，已经先后两次被袁世凯、黎元洪废除或解散；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非常国会”也成为西南军阀手中的工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象征国会在中国实际已经破产。然而，与之相关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到现政府中做官却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而陈独秀担任这个职务的确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作带来很大便利。一部分代表主张党员可以到现政府当官的动因是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但个别投机分子则是动机不纯。陈公博就是坚持党员可以到现政府做官的人。他回忆说：“当时有几件提案竟把我气的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党人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我争辩着，共产党是应该斗争的，为甚么连校长都不可干。”^{[17]420}他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一心想当官，从他在党的一大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以后所走道路的苗头。

3. 关于对待其他政党问题的讨论

由于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最后一天在

浙江嘉兴南湖进行。会议在讨论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时,代表们又产生了争论。一部分代表坚决主张,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因此,在对待孙中山问题上,包惠僧认为,“共党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在中间不应有任何的妥协。因此对孙中山应对北洋军阀一样看待,甚至要更坏一些”。^{[14]125} 另一些代表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16]27}

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在通过的决议中写道:“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8]7-8}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建党?对于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来说,由于他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不同、实践情况不同、个人阅历不同,在讨论党纲时产生争论是必然的,反映了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个别代表,如李汉俊主张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松散的没有战斗力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大多数代表从改变中国命运的迫切需要出发,坚持要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并立即投入到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中去。这种主张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斗争中虽屡遭挫折和惨痛失败而仍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第二,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及斗争空间面临着非常狭窄的局面。因此,党要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条件为其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党员能否到现政府去当官,取决于是否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要看当时革命形势和具体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和肯定。党的

一大关于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一方面反映出他们看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国会出现的问题,注意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反映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非常稚嫩,而且十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党员能否到现政府当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于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难正确解决的。这个问题曾困扰了中国共产党数年,直到大革命后期才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尽管这时代表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应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一些代表已经认识到军阀是中国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应该联合其他政党反对这个共同的敌人,因为这种联合能够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有利于今后的斗争。这个认识和主张尽管没有被会议接受,但反映出一些代表已经敏锐地发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而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像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强大,有必要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这是很有价值和闪光的认识,说明中国共产党自建立时就有一些同志开始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为此后中共二大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奠定了基础。

4.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否以《美国共产党党纲》为“蓝本”

对于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是以1920年12月《共产党》月刊上翻译发表的《美国共产党党纲》为“蓝本”的。^{[19]277} 笔者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美国共产党党纲》对照,发现两者的差别较大:

其一,形式不同。《美国共产党党纲》设有章、条,没有款,共有九章43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没有设章,有条和款,共有15条,其中“纲领”一条之下有四款。

其二,内容不同。《美国共产党党纲》第一章包含了名称、宗旨、党徽三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第一条规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5]3} 将纲领放在第二条中,没有关于党徽的规定。《美国共产党党纲》关于纲领的规定是:“美国共产党是有阶级觉悟的劳工们中间的急进分子组成的。他的宗旨是要教育劳工们组织劳工们去推翻资本家

的国家,建设劳工专断的政治,废除资本制度,发展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0]《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二条规定的纲领有四款:“(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15]将两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共产党党纲》比较简单,只有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内容相对比较多些,实际上既包含了党的性质,在宗旨方面又包含了革命的方式、过程、过渡手段和共产主义目标,同时又规定了在革命过程中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同世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相互关系。因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比《美国共产党党纲》关于纲领的规定更明确、更易于操作。另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三条还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5]这一条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走俄国苏维埃革命道路,是《美国共产党党纲》所没有的。此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入党资格、党的组织、财务等方面,也与《美国共产党党纲》有很大不同,在此不一一列举对比了。

其三,有创新。党的一大在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同时,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以笔者之见,可视为党纲的补充或附件。在《美国共产党党纲》中,关于宣传方面,第五章“文字联合”第五条规定:“各种文字写的出版物或党中公报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刷出版”;关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第九章“国际”中规定:“派赴国际共产党国际大会的代表和代理人应由常年大会时选出,并选出国际秘书一人。”^[20]《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没有关于宣传方面和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的具体规定,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二条为“宣传”,详细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

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8]第六条为“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明确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次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应派代表赴远东各国,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18]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共产党党纲》中虽然有关于宣传工作和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内容,但都非常简单,表述不清晰,不易操作。在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中虽然没有这两项内容,但在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有,而且表述清晰、明确,可操作性比较强,显然对于党成立后开展宣传工作和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有指导意义的。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共产党》月刊登载过《美国共产党党纲》,中国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看过这个党纲,党的一大代表在起草、讨论、通过自己的党纲时会借鉴它的某一点,但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根据当时代表们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结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制定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并非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蓝本”。

四、结 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到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制定党纲一直是党的最重要的问题。党的创建者陈独秀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以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对党纲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中国共产党党纲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第一个只有若干条的简单党纲,到《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再到有15条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制定,形成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党纲。

第三,无论是党纲简单形式还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形式,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专政始终是其宗旨,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主体。正因为如此,保证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不断纯洁队伍、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此后中国共产党在

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强大。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的党纲制定及发展过程，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与中国建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创建党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解、认识，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最初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内容，进而在中共一大制定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与中国建党实际相结合结出的第一个硕果。尽管这个纲领还很粗糙，还需要在此后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完善，但其历史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

参考文献：

- [1]李达.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施复亮.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二月）[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3]包惠僧谈维经斯基[M]//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4]张申府. 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5]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九七一年）[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6]包惠僧. 包惠僧回忆录[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7]陈独秀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8]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M]//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共产主义小组（上）.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9]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节录）[M]//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共产主义小组（下）.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10]谭祖荫的回忆[M]//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共产主义小组（下）.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11]刘石心的回忆[M]//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共产主义小组（下）.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12]包惠僧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3]张太雷.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14]陈潭秋.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1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七月）[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1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17]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九四四年）[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8]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一九二一年七月）[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19][日]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 袁广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20]P. 生，译. 美国共产党党纲[J]. 共产党，1920（2）.

【责任编辑 孙小帆】

（转至第 47 页）

张太雷首次赴俄身份辨疑

张 劲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1921年初,张太雷首次赴俄,到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于5月到达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后,他经过努力抗争,排除了其他冒牌“共产党”组织及其代表,避免了中共在诞生之初就在国内外面对若干个自称中国“共产党”的党派这样的混乱,为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公开亮相和获得承认,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当时中共一大尚未召开,张太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时的身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甚至质疑。而通过梳理分析当时与张太雷相关的一些人物及其活动,应当可以证实张太雷的中共党员身份。

关键词:张太雷;李大钊;中共党员;共产国际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少共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在7月9日开幕。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他经过努力抗争^①,排除其他冒牌“共产党”组织及其代表,避免了中共在诞生之初就在国内外面对若干个自称中国“共产党”的党派这样的混乱。张太雷在中共建立之初的重大贡献,值得深入研究和充分肯定。

一、问题的提出

张太雷于1921年5月到达莫斯科,准备参加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然而,在他办理代表资格证书时,发生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出现了好几个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代表,有的人甚至已经办妥了代表资格证书。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是自称曾有数十万党员的“中国社会党”的代表江亢虎,另一个是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学联的负责人姚作宾。

然而,当时中国共产党一大尚未召开,全国统一的组织和党中央还没有建立。而张太雷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之前,就已经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代表中共在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对此,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出,

收稿日期:2021-07-28

作者简介:张劲,男,浙江东阳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学与研究。

①参见丁言模、李良民:《张太雷研究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206页。

张太雷“到底是以何种资格、如何于1921年初出现在伊尔库茨克的，却几乎完全不得而知”。^[1]²²⁴换句话说，张太雷第一次赴俄时是什么身份、代表谁？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下称“上海小组”）由陈独秀主持成立；同年10月，北京党的组织（以下称“北京小组”）由李大钊负责建立；而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的党的组织，也在筹建之中。

张太雷于1916年到天津就读于北洋大学法科，后来认识了住在天津的俄共党员柏烈伟。五四运动中，他曾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与北京大学的学生联系，结识了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6年的李大钊。1920年春，曾在美国工作的维经斯基，受俄共派遣来到北京。他经每周去北京大学教授俄语的柏烈伟介绍，见到了李大钊，并与之探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而翻译工作由英语流利的张太雷担任。10月北京小组建立之后，张太雷受李大钊之托，在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2月，张太雷接李大钊通知去北京，再次见到了维经斯基，得知自己将被派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3月，张太雷到达伊尔库茨克，在刚组建的远东书记处担任中国科书记，由维经斯基直接领导，具体负责编制中国科的工作计划和起草向共产国际（包括少共国际）提交的有关中国建党情况的报告等。5月初，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伊尔库茨克召开，张太雷在会上用英语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辞。这是张太雷代表中共在俄国的第一次公开亮相。^①

必须说明的是，中共早期组织，无论是上海小组、北京小组还是其他小组，吸收成员时没有申请、

填表、登记、审批、签字、盖章等诸多可以留下纸质资料的环节，试图查找这类证据材料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②因此，对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认定，必须借助当事人的回忆。不过，对于此类材料，还需通过细致的梳理分析来判断其可信度。

二、张太雷是中共北京小组的成员

国内多数论著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肯定张太雷在1920年底之前，已经加入中共北京小组。^③本文拟从当时与张太雷相关的一些人物及其活动出发，证实其中共产党员身份。

首先，是最关键的北京小组的创始者和领导人李大钊。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还有张申府、张国焘二人，这一点并无疑问。不久，各地小组中“发生了分化，无政府主义者相继退出了党”。“这时，党内一面清洗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一面在组织上又吸收了一些新的分子进来。张太雷、邓中夏、刘仁静（在北平加入）、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沈雁冰（在上海）、恽代英（在湖北）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加入了党的。”^④实际上，在此前李大钊与俄共或共产国际方面相关人物的许多活动和谈话中，张太雷都担任翻译。这样的翻译不是仅靠英语流利就能够担任的，其前提条件是必须获得李大钊的充分信任。李大钊与柏烈伟、维经斯基等人秘密联系和探讨建党等相关工作的情况，是无法对这个翻译保密的。由此，北京小组建立后，李大钊必须尽快将张太雷吸收进去。而张太雷赴俄工作，也必然经过了李大钊的推荐，并得到了维经斯基的认可。李大钊叮嘱他先去哈尔滨找创办了东华学校的邓洁民，由邓帮助办理护照、安排交通与食宿等。^⑤而邓洁民与李大钊不仅是河北乐亭老乡，还是一起留学日本的

①参见〔苏〕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208页。

②参见孙伟：《中共早期入党仪式的演变探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③中共北京小组成立后，立即深入工人集中的地方开展工作，邓中夏的《长辛店旅行一日记》（《晨报》1920年12月21日）就记录了张太雷等人去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的相关情况。而谌小岑、李子宽也在回忆文章中提及了当时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等北京小组成员的关系和活动。参见《回忆张太雷》，第53—64页。

④参见张闻天等人于1937年在延安编纂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据此来证明张太雷的入党较为合理，虽然确切时间并不清楚，但此处提及的人员于当时入党都是事实，此书没有必要无中生有地另加一个已经牺牲的张太雷在其中。本文最后提及的写于1922年的《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

⑤此事的具体经办人是东华学校的教师张昭德，他是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张太雷在家信中称他是“我的好朋友”。参见丁言模、黄明彦、张浩典编著：《张太雷年谱新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81页。

同学和多年的朋友。换句话说,正是李大钊决定了张太雷赴俄工作及行程安排。所以,北京小组成立后吸收了张太雷的说法,最为可靠,时间上也能够对应。

其次,是在陈独秀之后任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回忆了自己入党的情况:1921年5月,“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2]724}这虽然是事后回忆,但与张太雷在俄的活动时间、地点,都可以对应,故而应当是可以采信的。瞿秋白和张太雷是常州同乡和中学同学,后来两人分别在北京和天津求学,还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此时他们在异国相遇,正所谓“他乡遇故知”,当然会感到亲切、高兴,记忆也必然深刻、清晰。瞿秋白临牺牲前写下《多余的话》,不存在需要夸张或者回避等因素,这也增加了其入党回忆的可信程度。而张太雷有资格介绍别人入党,这可以作为张太雷党员身份的旁证。此外,张太雷在1927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瞿秋白作为中央领导人致悼词。他在悼词中指出:“张太雷就参加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后来共产党成立时之最初组织。”^{[3]2}这段话可以视为当时党对张太雷的组织鉴定,在表述上也比较恰当。

又次,是熟识张太雷的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张国焘。他曾经与张太雷一起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建立天津青年团组织。按照张国焘的回忆,中共一大前后,两人在上海一起与马林打交道;北伐战争时期张国焘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后由张太雷接任;^{[4]231}南昌起义后张国焘随部队南下,在汕头与来部队了解情况的张太雷“朝夕相聚了一星期”,退出汕头的时候两人又“同行了一段路程”;^{[4]323}广州起义失败后,“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被安置在张国焘的寓所。^{[4]348}总之,两人交往颇多。然而,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并没有完全说实话,这绝不仅仅是记忆问题。其一,张国焘称张太雷在中共一大期间作为马林的翻译,“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5]133}而后又说一大结束后“张太

雷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就遵照马林的指派到日本去了”,“这件事使陈独秀先生大为愤怒”,因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应服从中共中央而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指令。^{[5]156-157}这样,张太雷的身份就有了团员、党员两个说法。其二,张国焘回忆自己跟着李大钊多次见过柏烈伟、维经斯基,却丝毫没有提及任翻译的张太雷。关于去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张国焘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出钱出力,也没有提及张太雷。当时北京小组负责北方各地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建设,张国焘在其中确实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在《我的回忆》中为自己评功摆好,甚至提及天津团组织的谌小岑、于方舟等人,就是不提张太雷。而谌小岑回忆自己正是按照张国焘的通知和提供的地址,去找的张太雷。^①其三,在《我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张国焘对张太雷有不满情绪。他写到自己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缺席审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罪状是‘假传圣旨’”,而“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起草的。^{[4]340,341}其四,张国焘在写回忆录时,比较明显的特点或者说习惯,是对自己隐恶扬善,同时挑别人的缺点或毛病,借以抬高自己。^②由上可见,张国焘的回忆显然不可全信。不过,他在试图贬低张太雷的同时,对其党员身份却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张太雷是北京小组的成员。

还有,是与张太雷一起在莫斯科争取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俞秀松。1921年春,各地的中共早期组织先后派人赴俄,除了张太雷之外,还有稍早赴俄的陈为人和稍后的俞秀松、何孟雄以及再晚一点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对上海小组和北京小组来说,派人赴俄参加会议或学习、工作,都是组织安排。1921年4月6日,俞秀松在哈尔滨致信父母,解释了自己立即赴俄的原因:“我被上海的同志们推选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会议;“上海我们的团体有派送学生留俄的事,我又被同志们推为留俄学生代表”,因此不得不先赴俄接洽。^{[6]66,67}另外,俞秀松在这封家信中还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共派两

①谌小岑提到,1920年10月,“李大钊先生派张国焘通知我,要我先去天津找张太雷成立S.Y.(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我十月下旬到天津,按照张国焘告诉我的地址见到张太雷”。参见《回忆张太雷》,第57页。

②据张国焘回忆,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个代表，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北京的代表也是我从前在工读互助团的朋友，他已先我出发。”^{[6]66} 俞秀松是上海小组派出的代表，他在3月底赶到北京，停留了三天。这期间他肯定见过北京小组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李大钊。理由如下：其一，北京小组推派赴俄的代表是何孟雄，而李大钊当时正忙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的相关工作。其二，何孟雄与俞秀松都是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成员，而李大钊是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和捐款者之一，至少认识二人。其三，俞秀松到了北京之后才可能知道何孟雄是北京小组的代表且已离开北京，而这样的机密只有作为北京小组领导人的李大钊才可能掌握并告知他。可惜的是李大钊和俞秀松在北京见面时，都不知道何孟雄会在满洲里被捕入狱，最终没能赴俄。其四，李大钊将何孟雄的行踪告知了俞秀松，同样极有可能把已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北京小组成员张太雷向俞秀松作了介绍。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俞秀松在莫斯科与张太雷合作，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包括青年团）进行抗争，将江亢虎、姚作宾之流排除出去。否则，俞秀松到莫斯科后，面对混乱局面，其正常反应应该是怀疑张太雷的身份，正如他质疑其他冒牌“共产党”代表那样。可见，俞秀松肯定事先知道张太雷的身份。除了李大钊，目前找不到俞秀松获知张太雷身份的其他渠道。总之，俞秀松认可张太雷是北京小组成员的身份，是二人合作的前提。

需要说明的是，张太雷接受中共北京小组尤其是其领导人李大钊的指示，在天津开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工作。而早期党和团的组织及成员并没有严格区分，通常有党小组的地方，就有青年团组织。^①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当时许多有关党和团的文字材料之中。比如，张太雷、俞秀松在莫斯科向少共国际二大报告中国建团的情况时说：“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举行成立典礼，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7]139-140} 这里明确说了团员均为党员。而远东书记处的达林于

1921年7月致信少共国际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请授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代表秀松同志以表决权，张太雷、陈为人同志以发言权，原因如下：……上海组织是中国的中心，派遣秀松同志来参加会议的，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其大多数成员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青年组均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成员，一行14人，来自上海。他们还推选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也是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7]136} 上述材料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即张太雷、俞秀松以党的代表名义向团的组织（少共国际）报告工作，14位团组织成员推选张太雷作为党的代表参加党的会议（共产国际三大）。可见，早期党和团的组织及成员本来就很难明确区分。党员代表参加团的组织和会议，团员代表参加党的组织和活动，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也是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都接受的事实。材料中还提到张太雷作为中共的代表，也是团组织的成员。实际上俞秀松也是如此，他既是中共上海小组的最早成员，也是上海团组织的领导。^②由此再看张国焘关于张太雷先是团员、后是党员的说法，也不算是胡言乱语。

中共早期党和团的组织及成员没有严格区分，导致了如下情况。其一，当时在俄国有许多来自中国的青年团成员，在莫斯科的14个团员^③开会“推选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其二，共产国际三大代表名单显示，“中国共产党代表1人，中国青年团代表1人”，^{[8]59} 即张太雷和俞秀松。名单虽然标明二人分别代表党和团，但在共产国际看来，他们都有参会的资格。其三，基于同样的道理，两人又一起参加了少共国际二大，张太雷还当选为执委会委员。更有意思的是，少共二大专门讨论通过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的决议》，提出“在那些还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和组织的地方，共青团组织应当由自己的小组中挑选一些年长的同志去协助建立支部和组织”。所有的青年共产党员“仍然应当兼当共青团员并积极参加团内工作”。

①参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②俞秀松填写履历时回忆：“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加入联共（布）”，“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1年我受党的委派作为党的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见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俞秀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222页。

③14人详细名单，参见《张太雷年谱新编》，第94页。

“共青团组织应当参加共产党的全部工作。”^{[9]200} 诸如此类的规定,显然并没有明确区分党员、团员之间的界限。1922年陈独秀带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及少共国际会议时,这种情况也未见有多少改变。

三、张太雷还有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

张太雷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自然要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舒米亚茨基和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受俄共派遣第一次来华推动建党时,就与张太雷有接触。回到伊尔库茨克后,他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对来此工作的张太雷评价也很好。远东书记处作为共产国际在远东开展工作的最高机构,自居是中、日、朝等国已有的共产党组织的上级。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惯例,上级机构和领导对某一同志的身份认可及任用,通常比下级机构的正常组织程序更有效。张太雷作为中共北京小组的成员具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在共产国际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

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后,中共各地小组派出的部分党员、团员代表和一些冒牌“共产党”的人都在俄国,舒米亚茨基为何推荐张太雷参会?^①其一,张太雷在远东书记处的工作卓有成效;其二,舒米亚茨基作为远东书记处的最高领导,他对张太雷身份的认可及工作的好评,十分重要;其三,实际主持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清楚张太雷的身份,认定他能够代表中共。

如前所述,李大钊通过维经斯基,推荐张太雷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实际上,李大钊还推荐了其他一些党员、团员到各个地方任职,为党工作。^②张太雷待人真诚、热情,英语熟练,为柏烈伟、维经斯基及后来的马林、鲍罗廷等俄共或共产国际

派到中国的人,提供了重要帮助,也获得了他们异口同声的肯定。达林在致少共国际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信中,称“张太雷同志是最认真的工作人员”。^{[7]136} 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拉狄克的中国问题通报中,称张太雷是“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10]80} 一向傲视和苛责中国同志的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对张太雷大加赞扬,当然,这也许与他考虑到了张太雷在远东书记处的工作经历和人际关系有关。中共一大结束后由俄国回到上海的张太雷,其身份不仅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换句话说,张太雷比马林更熟悉也更能够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尼柯尔斯基的情况也是如此。^③

根据张太雷的经历,是否还可以设想,他在中共北京小组建立之前,就已经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开始为共产国际工作?虽然目前缺乏这方面的明确证据,但也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1920年12月21日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住在天津的柏烈伟是“北京革命局”的领导,“现在有10多名俄国负责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10]53} 其中或许就有张太雷。

第二,张太雷刚到伊尔库茨克,1921年3月23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就发布第41号命令:“张太雷同志编入书记处工作,任中国科临时中方书记,给予三级政治工作人员薪金,每月6160卢布,由红军第五军政治部提供。”^④而舒米亚茨基当时正是苏俄红军第五军的政治委员。张太雷一到伊尔库茨克,就即刻顺利担任书记处职务并领取报酬,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严格纪律,这是难以想象的,除非他获得了某些人(如维经斯基)的强力支持,或者他此前就已经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登记在册。^⑤也就是说,张太雷可能早就是共产国际的

①舒米亚茨基推荐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签名文件,见天津大学张太雷研究中心编:《张太雷画传》,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

②详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张太雷赴俄后,李大钊还介绍谌小岑接着去华俄通讯社工作,参见《张太雷年谱新编》,第80页。

③有研究者认为,在帮助中共建党的过程中,尼柯尔斯基比马林的作用更大,更能代表共产国际。参见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张太雷的任命书原件照片,见《张太雷画传》,第39页。

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提到,他要在天津“组织党的工作人员登记”。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工作人员，只是外界包括中国同志（李大钊除外）不知道而已。

其三，达林在致少共国际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张太雷“在参加大会后将立即回国。毫无疑问，这将减轻我们在中国的工作”。^{[7]136-137}会后张太雷确实很快回到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工作，这明显是共产国际对所属人员的工作安排。这说明张太雷离开伊尔库茨克后，仍然肩负有共产国际的任务，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召集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朝、日等国代表。顺便说一句，司马璐在香港等地讲党史，总是挑共产党人的缺点和错误，但对张太雷的党员身份倒没有提出疑问，可不知他为何说“瞿秋白、张太雷等是先参加苏共的”，并认为“中共正式成立以前”张太雷是上海小组的成员。^①其说法混乱且不知依据何在，不可轻信。即便有其理由，张太雷、瞿秋白先参加的也应该是共产国际，而非“苏共”。“苏共”称谓的出现，是30年以后的事了。

其四，张太雷回国之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和翻译。当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张太雷总是努力劝说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保持一致。张太雷是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和少共国际执委会委员，而中共当时即将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故而张太雷进行劝说以弥合双方分歧是职责所在，但党内同志难免会对他产生非议。如中共一大结束后张太雷代表共产国际去日本活动，陈独秀得知后大怒，认为张太雷作为中共党员“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而“马林不征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5]157}被认为比较接近马林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发牢骚：“熟悉共产国际行

情的张太雷，不待说是拥护共产国际的。”^{[4]340}

以外籍身份参加俄共或为共产国际工作，并非个案。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拉狄克就是波兰人，他参加俄共后被派往柏林，后来回到俄国负责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再如俞秀松，他是中共上海小组最早的成员，20世纪30年代在新疆为中共与军阀盛世才的合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实，他还有另一重身份——联共（布）党员，接受联共（布）的指派。综上所述，如果张太雷早就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共产国际或俄共在北京和天津的工作，在北京小组成立后又加入了中共，那么针对张太雷身份的所有疑问，就更容易解释了。^②

当时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工作，其实也混同难分。1921年1月5日、7日，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分别通过决议，决定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以统一俄共和共产国际在远东地区的组织和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舒米亚茨基为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书记处人员则来自之前的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等机构。3月，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茨克正式成立，作为共产国际领导远东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建党、筹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等。^③而张太雷第一次赴俄的首要任务，就是参加远东书记处的工作，并参与筹办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以他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去日本召集参会代表，与其说是受马林的指派，还不如说是张太雷自己在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直接延续。

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和舒米亚茨基等人的支持，显然有利于张太雷代表中共参加共产国际

①参见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三部，杭州大学1980年印，第6—7页。

②据陈翰笙回忆，1926年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经李大钊介绍秘密为共产国际工作，1935年才在莫斯科将组织关系转入中共（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由此可见，张太雷首次赴俄之前，即由李大钊介绍参与了柏烈伟、维经斯基等人在华的工作，后来才加入中共北京小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近来有一些新提法，如“1921年5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白光迪：《瞿秋白：“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人民日报》2021年5月11日第4版），以及张太雷“从1921年春开始……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白光迪：《张太雷：“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人民日报》2021年5月9日第4版），不知依据何在。

③1922年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为已经完成了在东方国家建立共产党和筹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任务的辅助机构被撤销。东方工作的领导中心从伊尔库茨克回到了莫斯科。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正式成立。

三大,并把江亢虎、姚作宾等人排除出去。会议期间,俞秀松和张太雷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同志!我们曾两次就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代表资格一事提出抗议,但都没有结果。我们的第三次抗议(用英文写的)已由张同志亲自寄给您了,不过我们担心您忘记了看看它。由于这件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至关重要,我们再一次提醒您。在前一次的声明(签名的还有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舒米亚茨基和日本代表太郎)中,我们提出了下面三点理由……”^{[6]81} 1921年9月,当时张太雷已经回国,而俞秀松继续向共产国际作出说明:“不久前来到莫斯科并自称中共党员的中国公民姚作宾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他没有任何权力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不管共产国际同他讨论什么问题,做出什么决定,据姚作宾建议给予什么拨款,中国共产党都予以承认……我们担心共产国际因不了解实情而被姚作宾欺骗,认为有责任提请共产国际注意,希勿与之发生任何正式接触。”^{[6]81} 总之,张太雷与俞秀松为排除冒牌“共产党”代表,付出了许多努力,功不可没。

四、结 论

张太雷和俞秀松在莫斯科争取到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资格,成功将其他冒牌“共产党”组织及人员排除出去,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共产国际的唯一承认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张太雷以何种身份出现在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都必须承认他与北京小组尤其是其负责人李大钊的关系。再加上共产国际的认可,他当然能够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最终,江亢虎的代表资格证被收走^①;已经登记参会的姚作宾,则因为迟到,没能赶上共产国际三大的召开。

通过对张太雷与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俞秀松等人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证实其北京小组成员的身份。张太雷为何有争当中共代表的动机和

底气? 如果他不代表中共,又代表哪个团体? 他为何能得到舒米亚茨基和维经斯基的支持? 如果张太雷不是中共党员,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张太雷确定无疑是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俞秀松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并在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之后,得到了党内同志的一致认可。^②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张太雷首次赴俄时是否能够代表中共,而是他在天津对早期中共团组织建设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如果理清这一问题,张太雷的北京小组成员的身份就不言自明了。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三大的书面报告中提到,到192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其中,他对“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的介绍最为细致,这显然符合他了解天津情况的实际。^{[9]176} 而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写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天津党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打算,而且将其与上海、北京相提并论。^{[10]31-35} 9月1日维连斯基在莫斯科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说天津有党组织。^{[10]40,41} 10月5日刘江(费奥多罗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写给俄共阿穆尔州委的报告中,提到了天津的组织情况,还具体说到“以回民马骏^③为首,此人是著名的共产主义信仰者”。^{[10]46} 这些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出自不同系统和人员的报告,居然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中共在天津的早期组织。这其中可能存在某些人邀功请赏、夸大成绩的情况,但他们不可能约定都以天津为例。不同文件中的相关内容,并非无中生有,有的报告还提到“马骏”这样的具体人名,这可是编不出来的。根据目前已有的材料和研究,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些报告的作者可能把张太雷、马骏等人来自天津视为天津存在党组织的依据,或将天津的团组织混同于党组织;而他们也都不清楚张太雷实际上是北京小组的成员,受李大钊之命在天津开展工作。对于这一情况,最

①石川祯浩引用江亢虎的回忆,详细描述了此事。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②国内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派张太雷和刚从中国起程的杨厚德”为中共参会代表。参见黄修荣、黄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310页。

③马骏,回族,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学生领袖,与周恩来等人同为觉悟社成员,后加入中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北京市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不久因叛徒出卖遇害。

了解内情并有机会作出说明的人是张国焘，可是他在《我的回忆》中表达混乱或故意回避，且力图贬低张太雷。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写道：“1921年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或更确切地说，根据舒米亚茨基同志的安排，我被派往广州”；^{[10]82}“在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和广州存在着与上海中央局有联系的小组。这些地方也有青年团。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青年团根据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做工作”；^{[10]88}“在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组成人员中，有许多同志，如李守常、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李启汉等，不仅是忠诚的革命者，而且也是颇有影响的工作者”。^{[10]94}这里同样讲到了天津小组和张太雷，但没有提及具体情况。此外，陈公博曾回忆说有来自天津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①也许在他的记忆中，天津有党的小组。再说，张太雷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即在上海出现，由此被误认为是天津的参会代表，也未可知。张国焘甚至回忆说，自己在中共一大期间起草了党纲，并由张太雷翻译成英文给马林看过，^{[5]137}这也是记忆不准确所致。因为张太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时间，最早也是1921年8月上旬了。

总之，张太雷以及天津早期党团建设的情况，值得深入研究。虽然不能指望找到中共成立之初某人某时在天津入党的原始材料，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即研究结论将指向和证实：张太雷是北京小组的早期成员，能够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参考文献：

- [1][日] 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 袁广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2]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 瞿秋白. 悼张太雷同志[M]// 回忆张太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4] 张国焘. 我的回忆: 第2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1.
- [5] 张国焘. 我的回忆: 第1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1.
- [6] 李璫, 主编. 俞秀松画传[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7]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研究会, 张太雷纪念馆, 编. 张太雷研究史料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编译.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 第1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7—1925[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黄云龙]

Analysis of Zhang Taili's Identity during His First Visit to Russia

ZHANG Jin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In early 1921, Zhang Taili paid his first visit to Russia, worked at the Far-East Secretariat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Irkutsk, and arrived in Moscow in May. Around the opening of the 3rd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he worked hard to prevent the attendance of fak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voided the chaos of CPC in its early period to appear with several self-claim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i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PC’s debut and recogni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Since the 1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did not conven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e identity of Zhang Taili when participating the 3rd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rouses attention and doubt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his paper proves Zhang Taili’s identity as a CPC member by the analysis of some people and their activities related to him.

Key Words: Zhang Taili; Li Dazhao; CPC member;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①陈公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写道：“大会代表十二人，代表七个地区——广州、北京、湖南、上海、山东、天津、汉口，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同志。”参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 11—1923. 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4页。

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立法过程的历史考察

章舜粤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最高国务会议制度,与新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有密切关系。最高国务会议制度最早出现在由毛泽东主持的宪法起草小组1954年1月起草的宪法草案第一次修正稿中,在3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中初步成型,在6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基本成型。经过向苏联方面征求意见和全民大讨论后,最高国务会议制度伴随着1954年宪法的通过而最终确立。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创设,经过了党内外、国内外、从上到下的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展现出鲜明的开放性,体现了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最高国务会议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它的创设源自当时的政治需要。立法者对最高国务会议条文作了一定程度的模糊化处理,使其在实践中具有相当的弹性。

关键词:最高国务会议; 国家主席; 1954年宪法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意义深远,它基本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确立了国家体制的基本格局。根据1954年宪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我国创设了最高国务会议制度。

1954—1964年间,最高国务会议共召开了21次。《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形成与发表和1957年整风运动的发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均与最高国务会议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然而关于最高国务会议的产生、功能、作用及流变等一系列问题,尚无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①这一方面是因为最高国务会议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

收稿日期:2021-03-01

作者简介:章舜粤,男,福建龙海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①目前关于最高国务会议的专门研究主要有四篇论文,探讨了最高国务会议的组织结构、功能、地位和贡献等。参见李林:《最高国务会议组织结构及其功能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杨建党:《最高国务会议制度探略》,《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翟志勇:《最高国务会议与“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章舜粤:《最高国务会议运行机制探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此外,还有部分相关研究散见于一些研究宪法、国家主席制度的论文和专著中。

糊性，另一方面与相关档案尚未公开也有关系。^①本文则试图依据现有材料，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立法过程作一历史考察。

一、1954年宪法的由来

如前所述，设立最高国务会议的宪法依据是1954年宪法第四十三条。那么，1954年宪法第四十三条是怎么来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明确1954年宪法的由来。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共同纲领》毕竟不是宪法，^②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制定一部宪法很快被列入了议程。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刘少奇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访苏。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借此机会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问题向斯大林征求意见。当时中国国内各党派的基本意见是暂不需要制定一部宪法，而以《共同纲领》代替，三年后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③斯大林在10月24日和28日两次会见刘少奇等人

时，均建议中国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准备制定宪法。^④斯大林的意见，对中共作出在1954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的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⑤

1952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次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20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针对一部分民主人士的疑虑作了解释。他指出，“三年来，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因此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他还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凡是爱国者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1]^⑥但由于作为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依据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尚未确立等原

①从1954年开始，童小鹏被李维汉指定为最高国务会议的记录人，他记录了毛泽东主持的16次最高国务会议和刘少奇主持的3次最高国务会议。根据李维汉的指示，最高国务会议不许录音，只有1957年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破了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800余人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不但录了音，而且允许与会人员记笔记。不久之后该讲话全文发表。童小鹏所作最高国务会议的记录，由其与中央秘书局一起，整理后存档。因此，最高国务会议的有关会议记录是存在的，有待将来公开。参见童小鹏：《少小离家老大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359页；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260页。此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领导人的年谱、文集中透露了最高国务会议的一些情况，《人民日报》等报刊对最高国务会议作过一些报道，黄炎培、竺可桢等最高国务会议的参会者在其日记中也留下了零星记录。

②关于《共同纲领》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是一份宪法性文件，也有人认为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在当时人的眼中，《共同纲领》的性质也显得模糊不清。如董必武曾说“它是我国的临时宪法”，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则认为“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参见《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62页。

③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530页。

④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533—538页。

⑤关于斯大林的意见对中国1954年宪法的影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斯大林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如张鸣的《1954年宪法是怎么来的——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一文即持此说。也有学者指出，斯大林在四个多月后就去世了，他“对中共提出的制宪建议实际上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特别是1954年制宪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个人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并且1954年宪法确立的体制也与苏联体制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不应夸大斯大林在此问题上的影响。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笔者认为，刘少奇等人面见斯大林之前，中共内部比较统一的观点是“暂时不制订宪法”（《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530页），在斯大林数次强调宪法的重要性后，中共的态度即发生了改变，因此不应忽视斯大林意见的重要性。而斯大林去世之后，中共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领导制定了一部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宪法。

因,宪法起草委员会没有马上开展具体活动。直到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才召开了第一次会议。^①而在这之前,中共中央指定了一个由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并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宪法起草办公室,收集相关资料。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的几名成员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宪法起草工作。^{[1]211}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中最高国务会议条款的形成过程

在宪法起草小组正式开始工作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曾于1953年5月3日下发过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第一部分)》,该草案初稿只草拟了序言和总纲部分,^②并没有涉及国家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等内容。此外,1953年11—12月间,陈伯达也负责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但经过毛泽东、田家英、罗瑞卿等人讨论,这份草案最终没有被采用。^③

1954年1月9日,毛泽东正式开始主持宪法起草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至1月中旬,宪法起草小组已经草拟出了宪法草案初稿、二稿和第一次修正稿,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些稿件。^{[1]217,218}由于文献保存等问题,我们暂时无法知道这些稿件的具体内容。目前可见的是毛泽东对宪法草案稿件的十六条批语。毛泽东在第一次修正稿的“国务院”一节上方批注:“主席有交议权,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2]454,458}由此可以推测,在宪法草案的早期版本中,已经有了最高国务会议(当时可能称为“最高会议”)的雏形,但相关规定较为模糊,对国家主席在其中的作用及会议决议的性质等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界定。

2月17日,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草案初稿。24日,经过修改,形成“二读稿”。25日,形成“三读稿”。2月28日、3月1日,刘少奇在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三读稿”。3月12日、13日、15日,刘少奇在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

论“四读稿”。3月18日、19日,又形成了一份“讨论修改稿”。^{[1]221-223,226}关于由国家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条款,该“讨论修改稿”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在必要时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二是“在必要时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相较之下,前一方案对参会人员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这样最高国务会议制度就显得较为明晰。毛泽东在前一方案旁批注了“较妥”二字。2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而毛泽东作上述批注的日期可能是20日或21日。^{[1]227}因此,我们暂不能确定此意见的产生与21日晚的会议是否有关。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本人无疑是支持将最高国务会议制度进一步明晰化的。

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其中第四十一条主要是对国家主席职权的规定,第六款为:“在必要的时候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对此,毛泽东指出,“第六款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议什么事没有讲,总之不能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说很少开,有紧急的大事情才开会商量一下。大家看这样规定妥当不妥当?……这两条是说,主席也有些事做,不是专门吃饭。这是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3]

毛泽东先是批注要明确“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之后又在“讨论修改稿”提出的两个方案中选择了与会身份相对明确的方案。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在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规定。但对于什么是“必要的时候”、“议什么事”,他还是没有明确,而是留有空间,供大家进一步讨论。同时,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知道,创设最高国务会议制度,是为了赋予国家主席一定的

①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79—82页。

②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86—88页。

③参见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权力。对于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毛泽东评论道，“可以提出建议，建议不起决定作用，人家愿理就理，不理拉倒，毫无办法”。^[3]而最高国务会议则“给予了主席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只要不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什么，什么时候开会，除了法定的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之外还有什么人与会，这些都由国家主席决定。^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还是没有解决毛泽东提出的“交议权”和“决议的性质”问题。国家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否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交由何部门执行？在之后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中，这些问题也备受关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最高国务会议条文形成过程

从3月23日中共中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到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了7次正式会议和多次非正式会议，对其进行了反复研究、讨论和修改，最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②从3月25日开始，全国政协划分了17个小组，组织召开宪草座谈会，共提出了3900多条建议，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重要基础。^③

在4月10日到19日举行的第九次宪草座谈会上，委员们集中讨论了“国家主席”一节，并提出了如下问题：“最高国务会议是不是协商的性质？”“主席与总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是怎样的一种关系？”^④有的小组建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主席团，主席即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可以不设立，这样既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

统一”相协调。^⑤

此外，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和部队领导机关也开展了讨论。关于国家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主席究竟是最高权力机关还是最高管理机关的成员？”“最高国务会议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什么关系？”^⑥

可以看出，大家对最高国务会议的性质搞不清楚。对于国家元首到底是国家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采用单一元首制还是集体元首制，大家还有争议。作为宪法起草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田家英对宪法草案的起草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曾经在一次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作过一个解答报告，解释了这个问题：“最高国务会议因有总理参加，讨论结果，由总理带回国务会议作出决定，因此这个会议是可以有结果的，有决定的，但不要国务院的硬性规定。”^⑦根据这个解释，最高国务会议和国务会议、国务院的关系看似是比较明确的。最高国务会议可以作出相关决定，但该决定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而是仍然需要由总理带回国务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同时不对国务院是否接受最高国务会议的决定作“硬性规定”。这就意味着国务院的国务会议在理论上可以修改甚至推翻最高国务会议的决定。这样一来，最高国务会议似乎反倒在于行政系统的国务会议之下了。可见，问题的实质仍然在于国家主席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的关系问题。

经过宪草座谈会的多次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正式修改意见。关于最高国务会议，该文件建议将相关内容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和其他

①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②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267页。

③参见萧心力主编：《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④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编》（六），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141页。

⑤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编》（十三），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142页。

⑥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编》（十八），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181页。

⑦《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宣（54）字第112号》，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102页。

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按照问题的性质，分别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和决定。”^①

这份文件中的最高国务会议，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中的最高国务会议有了比较大的区别。第一，它明确了国家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中的地位，即负责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第二，在法定参与人员中，增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就在原本属于行政系统的国务院总理之外，增加了代表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使得最高国务会议的性质由偏向行政体系转向“议行合一”。第三，最高国务会议的意见，由国家主席提交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等部门讨论和决定，这就明确了毛泽东提出的“交议权”。第四，国家主席根据问题的性质，将最高国务会议的意见分别提交不同部门，这和田家英的解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国家主席有更高的权力去影响更多的事务，而不是仅仅将最高国务会议的决定交由国务院去讨论和决定。第五，除了国务院外，国家主席还能将最高国务会议的意见交由“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和决定。这个“其他有关部门”是比较含糊的，是否包括了国防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部门？如果“其他有关部门”包括了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这似乎暗示着最高国务会议可以绕过国务院，直接对其下属部委和地方政府行使一定的权力。此外，在参会人员排序上，国家副主席排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前，这就使原本就不清晰的国家主席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显得更加模糊。

1954年6月11日，毛泽东出席并主持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通过。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草案的决议。^{[1]247-249,25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关于最高国务会议的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正式修改意见基本相同，只是在规定由国家主席将最高国务会议的意见提交有关部门讨论这一句中，删去了“按照问题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后，交由全国人民讨论。

四、苏联方面对宪法草案中最高国务会议条文的意见和建议

1954年宪法的创制与斯大林的建议有一定关系，在宪法制定的过程中，苏联1936年宪法也是重要的参考。^②在以往对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的研究中，学者们较少提及苏联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随着新史料的披露，我们发现苏联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其中自然也涉及最高国务会议。

1954年3月19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苏共中央转交了一份宪法草案，^③并希望苏共中央对宪法草案“提出全面的意见”。^④3月20日，卢涅夫向彭真回函，提出了修改意见。^⑤同一天，还有柯妮娜和卢涅夫共同出具的一份修改意见，但没有转交给中国同志。^⑥这两份意见没有具体谈到最高国务会议，只是泛泛地对国家主席等相关条款提出了建议。例如，柯妮娜和卢涅夫建议把包含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的一些条款独立出来，编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

①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260页。

②毛泽东曾要求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中央委员抽暇阅读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1918年苏俄宪法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也深受苏联宪法影响。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438页。

③从时间上看，该文本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④参见《尤金致马林科夫等函：中共要求帮助修改宪法草案（1954年3月19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5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9页。

⑤参见《卢涅夫致彭真函：苏联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1954年3月2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31—34页。

⑥参见《柯妮娜和卢涅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意见（1954年3月2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34—38页。

构”一章。也就是说，他们将国家主席理解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一部分。^①

4月7日，高尔基等人提出了一份修改意见，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但是宪法草案中没有指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它的权限是什么，它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国家机构具有什么样的效力”。^②同日，戈尔舍宁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根据这部宪法草案，国家最高政府机构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主席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他同时指出，“最高国务会议是个什么机构，宪法草案中没有确定它拥有哪些权力和权限”；“非常必要的是，诸如最高国务会议这样的权威机构的成员组成，其法律地位应该在宪法中规定下来”。^③

4月13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向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运的苏斯洛夫提出了一份苏联外交部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这份修改意见认为，国家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是“中国政府机构新的组成部分”，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一起构成国家权力机构；根据宪法草案赋予国家主席的权力和权限的性质，“这一制度的确立意味着等同于在中国实行主席（总统）制”，国家主席“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之上”；同时，“最高国务会议的功能和权限在宪法草案中没有确定”，应该“作出更加严格的界定”。^④次日，库兹涅佐夫又提交了一份结论，内容与前一日提交的“修改意见”基本相同，也提到了国家主席的职权过大，“这需要仔细考虑考虑，需要更加准确地界定其同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和职权”。^⑤

不难发现，苏联方面对最高国务会议的判断基本有两条。第一，最高国务会议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一；第二，包括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内的

职权使得国家主席的权力很大，甚至凌驾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上。此外，苏联方面建议在宪法中具体规定最高国务会议的法律基础、性质、权限以及它与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等。

五、全国人民讨论宪草时对最高国务会议条文的意见和建议

1954年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了宪法草案，全国人民对宪草的讨论由此开始，到9月11日结束。这是一次大范围的、深度的讨论，最高国务会议的相关条款是讨论焦点之一。概而言之，全民讨论中针对最高国务会议的意见和建议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最高国务会议的性质

有人提出，最高国务会议可以改为“国事会议”，^{[4]93}或者“最高谘政会议”。^{[5]58}也有人提出，最高国务会议可以改为“最高国务委员会”，“并使这个机构成为常设机构”。^{[6]138}有人则建议，在紧急状态下，应当由最高国务会议成立“最高国务委员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便于召开的特殊严重与紧急的情况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成立最高国务委员会。最高国务委员会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切职权，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担任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在情况恢复正常并由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负责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向大会报告工作后，最高国务委员会即行解散。”^{[6]139}

还有人提出去掉最高国务会议相关条款，“因为依照本条规定，最高国务会议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一个联系机构，其决定作用不大”。^{[5]59}

2. 最高国务会议的责任人

有人提出，最高国务会议的主席，“可否改为由

①参见《柯妮娜和卢涅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意见（1954年3月2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35页。

②参见《高尔基等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43—44页。

③参见《戈尔舍宁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47、49页。

④参见《苏联外交部对中国宪法草案修改意见（1954年4月1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50—55页。

⑤参见《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关于中国宪法草案的结论（1954年4月14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61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担任”。^{[7]71}还有人虽然认可由国家主席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但认为应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认为有必要时,申请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4]93}

3. 最高国务会议的组成人员

有人提出,最高国务会议参加人员中可以增加“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总检察长。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7]72}此外,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和“副总理”也被要求列入参会人员。^{[4]92-93,57}有人提出,国家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位置应该对调。^{[7]72, [8]93}还有人认为,应补充规定“‘其他有关人员’为列席国务会议,无表决权”。^{[5]8}

4. 最高国务会议与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关系

最高国务会议与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问题,与最高国务会议的性质问题有密切联系。正是由于最高国务会议乃至国家主席在宪草文本中的地位、性质模糊不清,导致人们对最高国务会议与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关系有颇多疑惑。有人认为,“国务院是执行机关,在最高国务会议中只能参加讨论,作决定则不妥”。^{[7]73}这实际上就点出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国务院的关系问题,即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最高国务会议决议事项,应该“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交国务院执行”,^{[7]73}或者是由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再交国务院执行”。^{[4]94}也有人认为,应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9]56}这类意见实际上也是希望明确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和国务院作为国家政务最高执行机关的性质。还有人提出,“应加强主席对总理的领导关系”。^{[5]57}

5. 最高国务会议的职权

有人提出“明确最高国务会议的性质和职权”,^{[5]57}有人要求“规定最高国务会议的组织、职权与对各部门的关系”。^{[4]92}还有人具体提出了最高国务会议的职权,要求增写“最高国务会议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后始得改组国家

机构的组织形式”一款。^{[4]93}

考察对最高国务会议的以上种种意见和建议,可以发现其主要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四十三条对最高国务会议的性质、参加者、功能、权限等的规定模糊不清。

六、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对宪法草案中最高国务会议条文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3个月的热议讨论,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一共提出了52万多条意见。^①但关于最高国务会议的修改和补充意见,没有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吸纳。^②不过,针对大家最感困惑的国家主席与最高权力机关的关系等问题,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作了一定的回应。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在报告中,刘少奇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地行使最高的国家权力”,明确“国家元首是集体的国家元首”,国家元首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结合起来行使。并且,“不论常务委员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都没有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10]379-380}

1954年9月16日起,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分组形式对宪法草案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关于最高国务会议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对国家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交议权写得更明确些:“现在的写法,好像对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要同时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三方面;把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作出决定的和提交其他有关部门讨论的分别来写;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作决定,交给国务院或有关部门执行。”^{[11]369}这实际上是要求对最高国务会议的权力作明确规定。

通过对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最高国务会议相关条文之形成和变迁的分析和梳理,可以发现从始至终、从上到下、从国内到国外,对最高国务会议

①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②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第394—401页。

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希望明确最高国务会议的性质、权力、地位和具体组织架构等。总而言之，问题主要源于宪法草案中最高国务会议条文的模糊性。然而，经过多层次、全方位、大范围讨论后最终通过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最高国务会议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相比，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变化。其具体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七、结 语

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想，最早出现在由毛泽东主持的宪法起草小组所起草的宪法草案第一次修正稿中。在通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等高层会议的讨论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被提交至宪法起草委员会。它初步描绘了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轮廓。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苏联专家也给出了专业的意见，最高国务会议制度逐渐成型。中央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宪法草案后，全国人民对其进行了大讨论。最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1954年宪法，宣告了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诞生。可以说，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创设，经过了党内外、国内外、从上到下的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展现出鲜明的开放性，体现了民主和法治精神。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立法过程中的相关讨论详细而充分，但很多根本性的问题被回避了，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回应。例如，最高国务会议的性质是什么？其地位如何？它是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还是政治协商机关？它与其他权力机关的关系是什么？它拥有什么样的权限？它的法定参与人员有哪些？这些在立法过程中提出来的问题，体现了法治精神，说明人们普遍认识到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这些问题没有在法律上得到进一步明确的事实，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宪法的权威，不

利于理顺党的领导和宪法治理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明知这样的写法模糊不清、争议颇大却仍不加以修正？或许，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宪法学问题，我们需要以更开阔的视角去寻找答案。笔者认为，1954年制定宪法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仍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建国初期所建立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体制。创设最高国务会议，可以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著名人士等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联合政府的政治体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这也意味着，最高国务会议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因此，尽管受到了诸多质疑，立法者仍然坚持对最高国务会议条文作模糊化处理，从而使其在实践中具有相当的弹性。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3]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节录）[J]。党的文献，1997（1）。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全国人民讨论宪草意见汇编：第8辑[G]。1954。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全国人民讨论宪草意见汇编：第12辑[G]。1954。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全国人民讨论宪草意见汇编：第13辑[G]。1954。
-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全国人民讨论宪草意见汇编：第3辑[G]。1954。
-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全国人民讨论宪草意见汇编：第10辑[G]。1954。
-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全国人民讨论宪草意见汇编：第6辑[G]。1954。
- [10]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1]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黄云龙]

（下转至第115页）

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创立： 问题思考与前景展望

郑金洲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上海 201204)

摘要:干部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创立,是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需要、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需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力开展新文科建设的需要。干部教育学具有政治要求高、学科交叉性强、社会需求旺盛、发展空间大等显著特点。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至少涉及学科知识的系统化、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学科组织的建构、学科制度的形成等方面。干部教育学学科走向独立和稳健发展,可以在系统总结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制定干部教育学学科发展规划的基础上,采用边培养边研究边总结边建设的方式加以推进,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利用自身资源、吸纳外部力量形成建设合力,聚力研究影响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争取尽快形成一批研究成果。

关键词:干部教育学;干部教育培训;学科建设

干部教育学,是一门目前尚未自立的学科,在我国学科体系中还没有独立地位。《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明确提出:“推动设立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尽早创立这门学科,对于推进我国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意义重大。

一、创立干部教育学的重要性

自主性和社会性是学科两种重要属性。^[1]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学科知识作为

人类认识社会活动的理论形态有其独特的存在与发展机制,它总是随着现实问题内在矛盾的展开与解决而不断深化和拓展,从而表现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深入的发展演化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深受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社会需要,并借助于形成的学科知识深刻影响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干部教育学的创立也是如此,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收稿日期:2022-03-03

作者简介:郑金洲,男,河北泊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

究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干部教育培训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形成了关于干部教育培训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地位作用、性质定位、目标任务、机构建设、内容方法、师资队伍建设和考核评估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对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建设发展规律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创立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汇集各方力量,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无论对于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还是对于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都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需要。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即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 贯彻落实这一组织路线,需要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的深入研究,需要干部教育学学科的创立发展。比如,如何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培训,真正让干部入脑入心,真正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干部头脑;如何把培养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的要求落到实处,教育培训的改革创新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一挑战;如何在教育培训中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和导向,把干部的政治大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培养落实落细落小等。

推进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继“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之后,干部教育培训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3] 干部教育培训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干部教育培训由外延式扩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化,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对于如何提高干部教育培

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如何建构适合高质量发展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如何切实提高干部教育培训师资队伍水平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没有高水平的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就没有高质量的干部教育培训建设发展。着眼于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组织研究队伍,搭建研究平台,确立研究课题,形成重大成果,这些都有赖于干部教育学学科的创立。

大力开展新文科建设的需要。2019年4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决定大力推进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建设,提出要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为2035年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其中提及的“新文科”就是在传统文科基础上进行学科或学科中专业课程重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从学科、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干部教育学这一学科,具有“新文科”的典型属性,可以说是“新文科”的具体体现,它所具有的多学科、专业重组、课程重构、问题导向等特质,与“新文科”建设的要求高度契合,在中国特色学科门类中占居独特地位。

二、干部教育学的学科特点

干部教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这门学科的定位,也关涉到这门学科的发展前途。总体来讲,干部教育学是以干部教育培训活动、管理体制机制以及相关领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从研究对象来看,干部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对象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干部教育培训活动,举凡为培养培训干部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及其实践形式都是干部教育学研究的范围。二是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体制机制,干部教育培训在我国是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这一系统表现为各组织形式的结合,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等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管理权限等,研究这方面内容是干部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三是干部教育培训的相关领域,干部教育培训与干部队伍建设紧密相关,与教育系统的建设发展也有着密切关系,研究这些相关领域及其与干

部教育培训的关系至关重要。从学科属性来看,干部教育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某一具体现象的学科,从属于社会科学,具有社会科学的一般特征。具体来说,干部教育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政治要求高。干部教育学是以干部培养培训为研究对象的,干部素质首要的就是政治过硬。“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是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总体要求,其中“政治过硬”是核心要素,居统领地位。干部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毒品,有德有才才是正品。干部的“德”,首先就是政治大德,这方面不过关,其他都无从谈起。干部教育学又是教育事业的一个方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对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要求,“让有信仰的人教信仰”,有信仰是所有教师的必备条件,脱离政治的干部教育是不存在的,这些都要求从讲政治出发,把干部教育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校姓党,是党校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做好党校工作的根本遵循。党校在一切教学、科研和办学活动中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鲜明指出了党校作为党教育培训党员领导干部主渠道的政治特征,同时也对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

第二,学科交叉性强。干部教育学的跨学科特征非常鲜明,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含党史党建)为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干部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建理论是干部教育学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和立场。以管理学、领导学和教育学的交叉为基本框架,管理学对管理者的研究、领导学对领导的透视,无论是观点、学派、概念、命题还是方式方法都对干部教育学起着引导和支撑作用。同时,干部教育学毕竟属于教育学,要遵循一般教育规律,沿用教育学一般的原理和原则,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对其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干部教育学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也有密切关联,这些学科为干部

教育学提供了丰富滋养,支持干部教育学在相关研究领域深入发展。跨学科性强的特点,使得干部教育学具有多方面资源来源,具有多种培育养料,但也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其学科边界可能会由于涉及学科的多样性而难以厘清,在问题严重的时候,也存在这一学科失去自身独立性的危险。

第三,社会需求旺盛。干部教育培训是历史悠久的一项事业,中国古代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人,引导其成为王朝统治的骨干,所谓的“帝王师”更是以培养未来统治者为己任,唐代诗人李白就曾有“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的诗句。进入近代以后,干部教育培训逐渐从普通教育中分离出来,有了半体系化的管理队伍培训,专门的培训机构和人员也日益增多。在现代化社会中,干部教育培训有了体系化的设置和布局,专门机构、从业人员也向体制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我国现有干部教育培训专门机构5000余家,从中央到地方有着完备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体系,其数量规模已非常巨大,干部参加教育培训有着法律法规保障,对各级干部都有明确年度脱产培训要求,而且线上培训日益勃兴,可以说,干部教育培训已经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占据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领域,专门性学科的创立,从历史、现在、未来的角度进行审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视角进行分析,无疑对于深化研究、指导实践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发展空间大。干部教育学学科创立虽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社会需求也很旺盛,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门学科一直处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状态,迟迟未得自立。严格意义上说,现在在全国没有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没有一本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甚至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以干部教育学为毕生研究旨趣。在教育领域,教育学科由于从诞生起就是以现代意义上的中小学为研究对象,以普通教育为指向,以至于在发展过程中很少涉足干部教育研究,能够查询到的专门的干部教育研究文献也凤毛麟角。在管理学领域,管理学由于主要研究领域在企业管理、公共管理,且主要关注关心的是管理行为、流程、组织、评估等,以至于对管理者的教育培训相对研究较少,对党政干部的教育培训研究得更少。就

此而言,干部教育学这门学科发展空间大、创新性强,一旦自立,就会在实践中产生巨大影响。

三、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

关于学科自立的条件,有着形形色色不同的认识,但一般说来,一门学科之所以成立,大致有这样一些基本要求:特殊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范式,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专门化的研究队伍。从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来看,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应该以这些基本要求或要素为着眼点,经由播种施肥、培育浇灌,进而破土而出。其基本任务至少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 学科知识的系统化

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指代被人为分割开来的各个知识领域,同时,这些知识领域也是研究和学习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个领域有许多研究者,这些研究者能够意识到自己领域的界限以及与相邻领域的关系,而且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学术性被人们所承认,那么,大致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学科了。^[5] 学科之为学科,关键在于其“学”,这里的“学”是指学术、学问、学理,具体表现为规范化的术语、科学界定的概念、相对稳定的范畴、学科专属的基本命题、公认的原理常识、构成结构性关系的基本框架等。据此而言,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建构系统化的学科知识。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学科基本概念是学科的起始点,是学科赖以出发和前行的基础。澄清这些概念的逻辑前提,划定这些概念的边界,是为学科自立清障的一个基本步骤。比如,干部教育与干部教育培训抑或干部培训,哪个术语更贴近干部教育学研究的逻辑? 干部教育学与领导教育学有何区别和联系? 如何科学界定下述概念,以及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干部、领导、管理; 干部教育目的、干部教育方针、干部教育目标; 干部教育机构、党校(干部学院)、培训机构; 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专业能力培训。对这些概念的辨析以及相互关系的探讨,是干部教育学学科大厦的基石。这项工作做得扎实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科的自立程度以及能够走多远。

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构成为学科中的命题,也即形成学科中的一些基本判断。比如,干部

教育培训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居于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就是一个基本命题。这些命题表明了干部教育培训活动的一些基本立场,也为干部教育学提供了基本主张。对这些命题进行学理性说明,给出合理科学的论证解释,对于干部教育学的自立来说也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它使得干部教育学有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视角,对所属研究对象给出了不同于其他学科の説明。

命题与命题之间的联结,或者说命题中经过验证得到认可的论断,常构成为学科的基本原理或原则。这些原理或原则,建立在命题的基础之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对干部教育学研究对象具有更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干部教育学学科的骨干。比如,干部教育学必须与党和国家对干部教育培训的要求、干部岗位职责的需要以及干部个人的需求相应,在三者中找到恰当的结合点。类似的原理或原则带有一定规律性,是干部教育培训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干部教育培训从学理上得到证明的基本原理。原理解释说明干部教育培训主要活动的基本内容,不同原理负责解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不同方面,原理与原理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干部教育学的基本框架,形成干部教育学的基本逻辑。

由概念(范畴)到命题(判断),由命题(判断)到原理(原则或规律),由原理(原则或规律)到学科结构,这些方面都有待于干部教育学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当然,对干部教育学的研究,并不见得要先从概念(范畴)入手,再逐步演化到学科结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切入点。但从总体来看,以上提到的这些方面是研究中必须予以考虑的,其中一些基本要求是无法回避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就是推进干部教育学学科知识系统化的过程。没有学科知识的结构化、规范化,就难以有学科的成型和发展。

(二) 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

范式(paradigm)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2年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提出的概念。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某一学科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一个公认的模式或模型。“范式”这一概念迄

今也充满争议,对它很难有一致的看法和认识。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她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列举了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使用过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学科的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学科的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三是作为学科的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6]73-115}大致说来,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式是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的,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自立也是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

首先,干部教育学需要明确自己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我国干部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从哲学意义或者元研究范式的角度来讲,干部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为指导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立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是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是观察和透视干部教育问题的显微镜、望远镜、放大镜。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它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干部成长规律、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建设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成为我国干部教育培训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深入认识干部教育学的哲学基础,搞清楚干部教育培训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等问题,探寻干部教育培训秉承的理念、信念等,是干部教育学学科自立的基本前提。

其次,干部教育学要有扎实的学术成就作为学理支撑。从目前来看,干部教育学还很难说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其创立还在起步阶段,学术积累还比较薄弱,尚未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特质。但着眼于研究范式的形成,在研究中形成一些标志性成果尤为重要。学科独立在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衡量标准,一般说来,一部标志性著作或教材、一个专业化的研究机构、一本有影响力的专门期刊、一位或一个所属专业的教授或教职、一次典型性的专题

学术会议、一个重大的学科研究项目等,常常与一门学科的独立联系在一起,甚至意味着一门学科的自立。干部教育学无论是研究课题的设立、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专门教职教席的设立、学术会议的召开等,都有待于开设开发。这些研究活动的开展以及成果的推广,可为干部教育学未来发展奠基,同时也为干部教育学研究传统的形成打下基础。

再次,干部教育学要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学科的分门别类方式是和现代社会和建制直接相关的,它把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以条理化,并用合理化知识的方式把它们转化为学科的对象。控制稳定的对象及其对客观化方法的信赖(调查、证明、规范性判断、监控等)是学科规训机制和社会控制系统的共同特征。”^{[7]243}干部教育培训是特殊的社会活动,干部教育学是以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差异化,决定了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手段、工具也要相应地具有自身特色。毕竟,方法、工具是为目的、对象服务的。现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工具为干部教育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如问卷调查、叙事研究、行动研究、大数据分析、文献综述、历史比较等都会为研究分析干部教育培训问题提供不同视角和方法,为干部教育学收集、整理、分析信息提供借鉴。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由于干部教育培训与其他社会活动相较目的不同、场景不同、要求不同,一味沿用、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等往往难以有效深度解读研究对象自身面临的问题,因而,结合学科自身实际对这些方法、工具进行优化、转化等就變得非常重要。从国内外有关领导学、教育学研究成果来看,已经有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工具,如各式各样的量表等。对这些工具进行再加工、再创造,逐渐形成具有学科自身特点的研究手段,是干部教育学学科自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三) 学科组织的建构

学科不是囿于一所大学的社会形式,甚至也不是囿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教育和研究制度的社会形式。“学科首先是一个以具有正当资格的研究者为中心的社群。各个体为了利于相互交流和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设立一定程度的权威标准,组成了这个社群。”^{[8]29}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形成一定的组织形态,以一定的规范化的组织形式来支

撑。确立学科带头人及以其为核心组成研究团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学科带头人很大程度上具有“自然属性”，即其研究成果、学术影响力在业界有较高的公认度，大家对其在干部教育学领域至少是相关领域的学术造诣予以认可。当然，由于干部教育学学科目前还处在“襁褓”之中，假如一时难以“自然”形成这样的学科领军人物，在学术机构管理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下，经由院校或学术机构有意识地进行“孵化”，促成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也是必要之举。在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下，形成研究团队，并进而组成专门化研究机构，是研究组织构成的基本内容。与此相关联，出版专门研究期刊（迄今为止，干部教育培训领域尚没有专门的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组建专门研究学会（迄今为止，尚未组建干部教育培训专业一级或二级学会），举行以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或核心问题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迄今为止，这样的会议也很少举办），定期进行学术交流，以及按照干部教育学学科及所属专业为类目进行书籍收集、整理、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数量的藏书规模等，都属于学科组织的建设范畴。

（四）学科制度的形成

围绕学科形成制度体系，既是学科独立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干部教育学学科制度以及制度体系建设存在许多空白点，发展空间巨大。比如说，对干部教育学研究生的培养，以前曾有过探索，但很不成熟。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在教育学一级学科点下，自设二级学科——领导教育学，培养了两届博士研究生、两届硕士研究生。当前，结合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在一些院校依托管理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党史党建学科培养干部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很有必要。就培养博士研究生而言，干部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可考虑设定为：培养政治素质过硬，具有扎实干部教育培训理论基础，富有创新精神，能独立担负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其他学术部门干部教育培训教学科研或管理方面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学术骨干。课程设置可考虑：基础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著作选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史等；专业基础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史、组织工作概论、管理学（领导学）；专业必修课——教育学原理、成人教育学、国外干部教育培训概论、干部教育培训专题研究、干部队伍建设专题研究、干部素质测评研究；专业选修课若干。以上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只是初步框架和设想，根据实际情况可进一步删减、增加。学科制度除涉及研究生培养外，对于干部教育学专门教职的确立、职称系列的形成，以及研究生就业问题的解决等也需要作相应的制度安排。

一门学科的创建，涉及多方面要素，除上述“硬因素”外，还涉及学科文化等“软条件”。有学者就此谈到，学科文化是学科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学科特有的语言、理念、价值标准、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等，是学科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精神，是统摄学科组织和制度的灵魂。^{[9]249-250} 干部教育学学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从今天来看，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形态，但自建设之初，就应该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研究问题，注重学科建设的伦理规范，把学科的建设发展牢牢掌控在正确理念指导之下。文化是累积而成的，学科建立的初始状态对学科文化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科文化意识，才会有对学科文化的正确意识和积极行动，对这一点在学科发展之初就应该有高度思想自觉。

四、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路向

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已提到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无论是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还是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已经意识到这门学科的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已经着手推动建设。总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是学科建设中应予重点考虑的。

系统总结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干部教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前我们没有开展相关的建设活动。前文谈到，原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在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都有领导学或领导教育研究生培养经历，也从事过一些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活动。对这些行为进行系统回顾，梳理相关材料，分析取得的经验以及研究生培养没有能够继续下去的原

因等,对今天的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参考意义。出版专门性学术期刊,是一门学科自立的基础条件之一。国内有关单位编印了有关干部教育培训的内部资料,如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编印《干部教育研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也曾编印十年《干部教育培训研究》;国外也有相关杂志,如美国的《领导教育杂志》(*Journal of Leadership Education*)。对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或内部资料进行对比研究,也会为编辑发行干部教育学公开期刊提供镜鉴。类似的工作可以着手开展。

制定干部教育学学科发展规划。良好的顶层设计,是一门学科自立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干部教育学是一门刚刚起步的学科,对这门学科未来发展作出科学规划并付诸实施,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保证。干部教育学现在以及未来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学科发展的外部形势如何,学科建设确立什么样的战略目标,近期、中期、远期有哪些发展要求,选择哪些方面作为主攻方向、重点研究领域,如何处理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如何把握好干部成长发展研究与干部教育培训研究、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研究等的关系,具备哪些支撑条件干部教育学才能获得长足发展,这些内容都可以在学科发展规划中予以明确。当然,干部教育学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也是深化对这个学科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凝聚研究力量、搭建研究平台、建设研究团队的过程,其本身对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就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采用边培养边研究边总结边建设的方式推进干部教育学学科发展。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过,而随着干部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这一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从实际情况来看,干部教育学的自立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政策有保障、实践有需求、院校有基础,关键还是要先着手建设起来,由“坐而论道”转变为“做而论道”。一些拥有管理学或教育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点的高等院校,有自主设置专业的权限,可在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整合汇集院校内各方面力量,设立干部教育学硕士点、博士点。可以将干部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切入点,这也是干部教育学学科自立的最直接表现形式。有了研

究生的招生培养,也就有了相应的对干部教育学的研究生培养的整体设计、课程安排、师资配备、教材编写,也就有了研究团队的建立、研究项目的设立、研究资料的积累等,学科建设也就会逐渐发展起来。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也就是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理清思路,把握方向,破解难题,也就进一步推进了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向纵深发展。

充分挖掘利用自身资源、吸纳外部力量形成建设合力。一般来说,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总是依托高校或科研机构进行的,在起步阶段,可以选择几所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展研究生培养等活动。各高校或科研机构在进行干部教育学研究生培养或其他学科建设活动时,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本单位资源,将所属院、系、所相关专业力量有机整合起来,真正形成干部教育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将本单位之外干部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资源吸纳进来,构成内外互补、协同攻关的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格局。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掌握着大量干部教育培训的政策文献以及制定政策时开展调查研究等产生的资料,图书情报部门掌握着干部教育培训的大量史料以及国内外干部教育培训的动态信息资料,其他院校或科研机构拥有干部教育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干部教育培训一线工作者也有着丰富的实践素材,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作为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文献信息资源。

聚力研究影响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学科建设的逻辑归根结底要服从于实践发展的逻辑,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根植于实践需要、围绕对实践中产生的疑难问题的回答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干部教育培训在新时代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实践问题,比如,如何进一步推动干部教育培训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与干部成长发展需求相契合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如何把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专业化能力培训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三育”融合,如何把智能技术与干部教育培训相结合以有效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质量水平,如何认识把握干部成长发展与干部教育培训的双向互动、相互促进关系,如何进一步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的系统

性、针对性、适用性、有效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组织力量下大力气加以研究。由重大项目牵引，组织整合多方面力量开展研究，并产生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这本身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学科建设活动，同时也会对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马来平. 科学的社会性、自主性及二者的契合[J]. 哲学分析, 2011 (6) .
[2]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 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全党努力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 [N]. 人民日报, 2018-07-05.
[3] 刘鹤. 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1-11-24.
[4]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16(9).
[5] 马凤岐. 教育政治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6] [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 艾兰·马斯格雷夫, 编. 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 周寄中,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7] 汪晖. 死火重温[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8] Geiger L. Roger. To Advance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1900-1940[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9] 庞青山. 大学学科论[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张 华]

The Set-Up of Leadership Pedagogy: Thought on Questions and Prospects

ZHENG Jinzhou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Shanghai 201204)

Abstract: The set-up of leadership pedagogy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s the demand of further research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line for a new era, the advan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new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disciplines, leadership pedagogy has the features of high political requirement, strong inter-discipline, huge social demand, and large development area, etc. Its building involves at least the elements of the systematization of its knowledge, the set-up of research paradigm,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organ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With the basis of systematic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building leadership pedagogy and the plan for its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pedagogy can be advanced, for the aim of independence, by the integration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summing-up, and building. During the building process, a series of research output focusing on key questions that influe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education must be produc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y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Key Words: leadership pedagogy; leadership educa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续接第 135 页)

Relative Poverty Standard of China after Moderat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 fro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YANG Zhengwei¹, MA Hailong², MENG Lingxiu¹

(1.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Ministry of Commerce, Beijing 100731; 2. Research Offic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Poverty standard of the world and that of each country are dynamically adjusted. The World Bank has adjusted it four times, and China, three times. After the succes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focus of anti-poverty in China is transited from absolute poverty governance to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The relative poverty standard of 3.2-5.5 US dollars, equal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general poverty line in middle and high income countries, is suitable to China's specific conditions. Gini coefficient should also be adopted by the index of relative poverty of China, which must be lowered to about 0.38 in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for the growth of middle-income popul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strong domestic market. China can als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o calculate and release world Gini coefficient for lowering it from the current 0.7 to about 0.6 in 20-30 years, which can serve as a means of jointly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occupy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international morality.

Key Words: relative poverty standard; anti-poverty; Gini coefficient; world Gini coefficien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推进 “三育”融合的思考

——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为目标案例

于秋兰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培训部, 上海 201204)

摘要: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教育三者内涵上已经被赋予新的要求,在关系上亟待实现有机融合。以党性教育为“串联元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主线”,是促进干部教育培训“三育”融合的有效路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可挖掘独特教学资源、遵循办班规律、发挥教学优势、完善整体支撑,力争在当前促进“三育”融合的教学创新中更有作为。

关键词: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专业化能力教育;干部教育培训“三育”融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自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后,干部教育培训进入了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充满不确定性。随着国内脱贫攻坚任务胜利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已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新的发展阶段对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

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干部教育培训也要及时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和事业发展需要,以促进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教育有机融合为目标,推动教学创新。

一、干部教育“三育”的内涵与开展现状

新时代、新阶段,党对干部的要求是全面提升理论、党性和专业素养。在干部教育培训视域下,首先需要将党对干部“全面提升”的要求具象化,明确“三育”内涵。

收稿日期:2022-02-22

作者简介:于秋兰,女,山东青岛人,政治学博士,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部副处长。

（一）理论教育

党的理论教育是指党的教育培训机构和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广大党员群众为教育对象,以党的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共产主义信仰为根本目标的教育实践活动。^[1]通过理论教育,干部能够掌握认识外部世界的“钥匙”,做到在理论上坚定;而只有在理论上坚定,才能保证在政治上坚定、在党性上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2]14}干部在理论上坚定是树立理想信念的前提,而这只有通过坚持理论学习才能做到。“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3]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就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能深刻把握历史规律,从而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2015年版《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明确了理论教育的基本内涵,对接受培训的干部来说,可以概括为:一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掌握辩证法和方法论;三是增强思维能力。

（二）党性教育

党性是政党阶级性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党员入党后都要按照党章的要求,通过参加组织生活,将党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属性内化为自身的价值选择,树立政党所主张的世界观。所以,党性教育是将党的本质属性、价值目标内化为党员价值选择和行动自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党员自身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也需要党组织不断对其进行党性教育,还需要干部教育机构持续对其开展集中培训。

党性教育之所以是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就在于通过集中教育和培训,党员干部能够不断强化对党忠诚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

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并明确其内涵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深入开展党史国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深入开展道德品行教育、法治思维教育、反腐倡廉教育,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2]17-18}此外,他还强调要注重“发挥先进典型作用”和“加强警示教育,把一些反面典型跌入违纪违法泥坑的教训给大家说说透”。^{[2]18,19}

（三）专业化能力教育

知识培训和能力教育可以统称为专业化能力教育。专业化能力教育一直是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前“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提高领导干部的专业化水平,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行家里手,必须具备领导者应具备的专业思维、专业素养和专业方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5]64}的目标要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第二十二条则明确要求“帮助干部提高专业素养和实际工作能力”。^{[6]10}

专业化能力教育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增强八项本领、提高七种能力。增强八项本领,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干部要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5]68-69}提高七种能力,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0月10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班“开学第一课”上提出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需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7]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提出干部要“增强斗争本领”。例如,2019年9月3日,他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班开班式上提出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8]的要求;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总结运用好党积累的伟大斗争经验,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掌握斗争策略,练就斗争本领,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

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9]

(四)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开展“三育”情况

党校姓党,是新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总的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姓党,决定了党校工作的重心必须是抓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2][13]}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党的干部教育机构的“主业主课”。一段时期以来,为改变过去干部教育中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不断弱化的突出问题,按照党中央要求,干部教育机构积极探索,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分量不断加大,基本达到了占总课时 70% 以上的比重,教学培训质量不断提高。

但是,在强化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培训内容的理论色彩较浓而应用不足,理论教育偏“空”、党性教育偏“板”、专业教育偏“碎”、成效落实偏“软”,教育培训内容与高标准的干部提升目标相比有落差。^[10]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存在形式主义较为严重、问题导向不够鲜明、与专业化能力培训相互割裂、教学方式尚显单一、教育方式僵化和模式化等问题。^[11]在另一项调查中,在被问及当前干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时,43% 的受访学员选择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内容与现实脱节,存在就理论谈理论、就党性谈党性问题,理论与实践结合度不高”的选项。^[12]

可见,近年来干部教育机构在开展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的“主业主课”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卓有成效。但总体来说,“三育”课程从课程占比和内在逻辑关系上看,还缺乏科学的布局,尤其是专业化能力教育,相比新时代对干部“增强八项本领、提高七种能力”的明确要求,各培训单位反映在教学体系和课程的开发上还很不够,一方面还未及时分层、分类、分岗位,将新要求反映到培训内容上,另一方面距离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有机融合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二、推进干部教育“三育”融合的路径

党校因党而建,党的事业发展到哪里,干部教育培训就应推进到哪里;组织壮大需要什么,干部教育培训就应提供什么。2020 年暴发并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

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13]我国在疫情防控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干部治理能力上一些突出的“短板”和“弱项”,包括决策立场游移、领导行为“空洞化”、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不足、理性思维匮乏等,这就亟须加强干部治理能力培训,提高干部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14]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而系统观念的培养同样需要依靠干部教育培训。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教育,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强调某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都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干部教育工作的自身逻辑。

(一) 干部教育“三育”关系的分析

如果将干部教育内容看作一个系统性体系,分析“三育”在其中的关系,可以界定为理论教育是根本,党性教育是关键,能力教育是目标。习近平早在 2008 年党校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党校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知识教育,其中理论教育是根本,党性教育是关键。”^[15]三者虽然各有侧重,但相互之间有相容相洽之处,是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只有与专业化能力教育相联系、相渗透,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区分而不割裂、融合而不孤立,才能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整体效果。^[16]

当然,“三育”融合不是为了“融合”而融合,相互融合的目的是为了相互促进。事实上,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理论修养、党性修养和专业化能力在干部身上也从来不是相互割裂的。在相关课题调研中,对于“您认为,党员干部治理能力与其党性修养的相关性如何?”这一问题,98.4% 的被调研者回答是“非常强”和“比较强”。^[11]可以说,树立整体教育观念,系统推进“三育”融合,已经成为干部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二) 以党性教育为“串联元件”,推进“三育”融合

如果说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教育这三者原本相对独立,是“并联”的关系,那么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当下都相关的党性教育,则既是内容体系中单独的一个“元件”,又可以作为连接“元件”,促进理论教育与专业化能力教育“串联”起来并融合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在内涵上，理论教育与党性教育、专业化能力教育具有内在融通性。前两者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是相互统一的：理论教育为党性教育筑牢思想基础、提供方法论依据，^[1]党性教育也促进理论教育在实践中深化，使干部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和提高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同时，党性教育所要求的政治定力、政治能力本身就可以看作专业化能力的内容之一，党性教育注重的实事求是的品格更是与专业化能力的科学求真要求内在相通。第二，在教育目标上，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都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为重要目标。从教育方法来看，包括能力教育在内，三者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化问题导向，强调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第三，党性教育是一个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知再到现实触动的过程，与理论教育的理性认知和能力教育的现实实践均有重合互动的部分，三者可以在以感性体验为基础（能力教育+党性教育）、以理性认知为关键（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以现实触动为目的（能力教育+党性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达到互相促进、共同提升的效果。

（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主线”贯穿“三育”始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是在认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不仅为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对干部提高理论素养和辩证思维能力，增强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干部教育理论教学最重要的内容，同时还要进一步将其融入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教育中。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曾指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

出对党忠诚、坚定信念、自觉自信、责任担当、能力水平。”^[3]

党的干部教育机构要结合培训班次和教学主题，发挥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主线”作用，分专题、分层次地与课程深入结合。在理论讲授时，多结合这一思想涵括的各个方面的“实际”——这个“实际”首先是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给学员讲清“为什么”。在开展专业化能力教育时，多结合这一思想的理论内涵，点明“怎么做”背后的思维方法，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解决干部在落实党的决策部署中碰到的实践难题和存在的“思想疙瘩”。在理论教学和专业化能力培训中充分融入这一思想的内容，本身也是党性教育的一部分，更是“三育”融合的充分体现。

三、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推进“三育”融合的途径

在新时代，干部教育必须不断创新才能满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推进“三育”融合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充分结合各个干部教育机构的具体情况和办学特色。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是干部教育改革创新的产品，从成立起其定位和发展目标就是努力成为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的新型干部教育基地和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学院办学特色是忠诚教育、行为训练和能力培养，即以经济和管理为主要内容，侧重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教育、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教育以及能力培养和行为训练。不难发现，这种办学定位已经体现了教学内容“融合”的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院坚持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积极探索，突出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将新理论、新知识、新实践转化为教学内容，在每个班开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课程，重视“基础能力+专业能力”培训，不断强化专业化能力培训的“四大专题班次”，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初步实现了理论教育与专业化能力培训的融合。同时探索党性教育新路，把学习贯彻中央会议

精神作为各类班次的必修课，自 2019 年始连续举办 5 期省部级、6 期厅局级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专题培训班，承接 5 期中央党校中青班来院衔接教学。^[17] 可见，学院从以专业化能力培训为主向“三育”融合逐步转变迈出了新的步伐。下一步，应当从下述四个方面着力推进“三育”融合，努力使学院在全国干部教育大格局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彰显办学特色。

（一）深入挖掘独特资源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建在浦东、上海、长三角，这使学院从一开始就拥有了促进“三育”融合的天然资源。习近平 2010 年视察学院时曾说：“党中央之所以选择在浦东、井冈山、延安这三个地方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基本考虑就是上海、井冈山、延安都是中国革命圣地，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都在我们党历史进程中具有历史标志性的闪光点，都蕴藏着我们党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浦东还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试先行区。这些都是得天独厚的干部教育培训资源。”浦东、上海、长三角，这三个“地标”，对学院来说，在教学内容上可供“三育”融合挖掘的“点”可以列举如下表：

学院位置	部分教学内容	理论教育	党性教育	专业化能力教育
浦东	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善于创新		★	★
	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国家战略	★	★	★
	发展成就彰显制度优势	★	★	
上海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		★
	党的诞生地		★	
	人民城市人民建	★	★	★
长三角	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		★
	区域协调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		★
	众多地域的发展个案	★	★	★

注：标示★的表示可开展该类内容的教学。

例如，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党中央领导机关曾在上海坚守 12 年。可以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党史资源，开展现场教学或引进情景教学，将党史教育贯穿于各专题教学中，为理论教育、党性教育提供史料支撑，从而引导学员重温党的光荣历史，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再以挖掘浦东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国家战略实施这方面内容为例。讲清楚新发展理念是理论教育，引导如何用创新思维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是专业化能力教育，推动在工作中坚定信心、敢闯敢试则是党性教育，一个内容“点”上就能够实现“三育”的融合。同样，要讲清讲透这个“点”上的内容，也需要打通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教育，使三者互相渗透和融合。

（二）严格遵循办班规律

学院自开办以来，已经走出了一条可以概括为“三为主一结合”的特色办学之路，即以专题培训、短期培训、兼职教师为主，将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这种特点的班次，一方面，由于培训时间短对深入开展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尤其是对达到课时比重要求限制较大，腾挪的余地有限；但另一方面，专题研讨班又往往具有主题内容集中、学用结合紧密等特点，很多专题培训还是国家部委与学院合作举办的。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等十多个部委与学院合作举办班次近百期，占到学院中央调训班次总期数的近三分之一。^[17] 举办这类班次时可以发挥部委的政策优势。特邀授课的相关部门领导和国内一流专家对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把握更加精准，能够在短时间内帮助提升学员的理论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在专题班中推进“三育”融合，如上文所说，要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线”作用，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增强八项本领、提高七种能力的指示要求，开发涵盖“基础能力+专业能力”的系列课程，发挥与部委合作办班优势，深入研究形成每类专题班的特色理论课程，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该类专题的思想理论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时聚焦相关工作对干部能力的要求开设能力提升课程，并结合上文所提到的学院应开设的优势特色课程，形成“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方创新与发展升华相衔接”的课程体系，积累各专题类教学必讲课程清单，实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专业化能力教育的深度融合并柔性满足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比重不低于总课时的 70% 的要求。

（三）充分发挥教学优势

过去十多年来，学院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特别是在现场教学、情景模拟教学、案例教学以及利用主题教室教学等方面，率先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学院守正创新的宝贵资源和优势。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学院在推进“三育”融合方面依然能够保持和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和强化这些资源和优势。

第一，重视和拓展以媒体沟通和危机处理为重点的情景模拟教学，增强精准性，开发思维能力类课程，在专业化能力模拟教学中巧妙融入党性教育和理论教育的元素，培养干部较高的心理素质和敢于担当的作风，提高干部应对复杂局面的冷静决断力，增强干部的应急处突能力。

第二，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拓展现场教学，实现现场教学与案例教学有机结合。更多开发和挖掘有关党的创新理论和党史教育的现场教学点，同时加大对浦东、上海和长三角改革实践最新案例的开发。比如，过去两年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和一些国家对我国遏制打压全面升级的严重“三重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顽强拼搏，上海等地在奋力迎战“三重冲击”时有什么样的应对思路和举措等。新的教学案例的开发往往伴随着新的现场教学点的开发，或通过进一步挖掘已有的现场教学点来开发新的教学案例，两者联动发展，在专题班次教学设计时统筹考虑排课，先讲案例再去现场或先去现场再回来剖析案例，发挥两种教学方式1+1>2的教学效果，既避免了现场教学浮于表面、走马观花，也为以案例讲思想、用发展讲改革、用实践讲真知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践依据。

第三，有效发挥各类主题教室和教学实验室在促进“三育”融合中的载体作用。学院当前已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室、党性修养主题教室、浦东开发开放主题教室、智慧城市演示中心等主题教室和教学实验室，以之为载体，既能在一定空间内深入挖掘所关联专题的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教学资源，又能通过教师的讲授从理论和源头上帮助学员把握思想真谛和优化思维方式，从而区别于一般的讲座式讲授和现场教学实

践，在促进“三育”融合中具有成本低、效果佳的优势。主题教室和教学实验室及其功能应当在下一步教学布局中予以继续完善和提升。

（四）健全完善整体支撑

“三育”融合既是干部教育创新发展的要求，也是学院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学院要以促进“三育”融合、优化教学布局、加强课程体系建设为抓手，开展教学、科研、技术、管理等全面创新，以此带动学院办学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的逐步解决。

1. 推进教研咨一体化发展，提升用学术讲政治水平

教学内容是学院向学员提供的“终端”成果，决定其质量的实际上是教师的学术积累、研究深度以及学院对专题的组织设计等因素。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教研咨一体化水平，推动教学出题目、科研出成果、成果进课堂，所有环节始终围绕提高学员理论水平、党性修养和专业化能力展开。要坚持需求调研，积累以往专题培训中学员关注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关注教学中有哪些讲题是薄弱点，将它们作为科研课题加以深入研究，力求作出有针对性的解答。要发挥教师学术研究专长，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找准学术接口，建立学理框架，努力用学术讲政治，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强大的思想武器，用彻底的理论说服人。教师必须走研究式教学的路子，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党和国家重大现实问题，立足自己的专长对一些重点专题或地方特色课题开展跟踪研究。学院要切实为教师打通知情渠道，帮助他们与上海和长三角“接通地气”，方便他们了解地方发展思路和决策过程，鼓励教师主动结合上海和长三角改革开放生动实践开展教学研究。同时，要完善主体班次教学单元设计机制，可以尝试以近年班次专题为依据，以相关教研分部为主体，坚持集体备课，打造若干针对性强的学习团队与研究团队，为教学、科研、决策咨询一体化良性互动扫清体制机制障碍。

2. 加强对兼职师资的引进和队伍管理

资源丰富的兼职师资来院授课是学院的办学特色之一。能登上学院讲台的兼职教师，有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先进典型人物、知名专家学者等，他们本身就具有政治素质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高超、善于课堂讲授等特点，在

推进“三育”融合教学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当前，对于如何加强这支队伍的管理，使之与学院专职教师、课堂教学相融合，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3. 坚持以党性教育统领学员管理，加强学风建设

学院在举办专题研讨班的过程中，往往是多个部门共同配合来组织实施相关教学活动。如教务部门主要负责班次设置、主题研究、沟通协调等，教研部门主要负责需求调研、方案设计、教学组织、成果转化等，培训部门主要负责学员管理。必须将党校姓党原则贯穿于学院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的全领域和学员学习培训的全过程。各部门形成合力，切实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以良好的学风、教风、校风，促进“三育”融合。一方面，要继续将从严治校原则具体化为学院制度和措施，提升管理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在学员管理中要坚持以党性教育为统领，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学习管理、组织管理、生活管理始终。具体地说，应重视和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健全学员临时党支部的建立和管理机制。学员临时党支部在院务委员会领导下，在学员管理部门指导下，主要负责学员的学习研究、党性锻炼和集体生活的组织领导工作，是学员完成学习任务的组织保证。要明确临时支委会的产生流程和作用发挥机制。临时党支部要切实有效指导学员在理论学习、党性锻炼、严格守纪等方面完成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第二，发挥仪式建设的融合作用。研究通过“仪式感”教育，比如重温入党誓词、参加国家公祭日活动、组织宪法宣誓、开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诞辰纪念活动等，运用不同载体和途径，丰富党性教育内容，提升党性教育实效。

第三，细化研讨式教学的组织实施，在部分培训时间较长的班次中结合培训专题开展党性分析活动。专题研讨班的研讨往往由教师和学员共同参与，师生互相交流、共同探讨、互相促进，学员从被教育转为主动学习，教师也能真正了解学员的思想和需求。要进一步重视和细化研讨活动的组织，明确要求和流程。此外，鼓励培训时间较充裕班次的学员撰写调研报告，这样可以促使学员梳理所学

内容并有所思考，有助于将学习成果转化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同时学员还可以将调研报告提供给相关部门作为决策依据。对训期一个月及以上的班次，按照有关规定，应结合培训专题，开展全过程党性分析，结业时要检验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成效。

4. 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结合网络干部学院资源，实现在线选学与专题培训相结合、线上学习与线下研讨相结合、导学服务与督学管理相结合，助力“三育”有机融合

例如，梳理符合培训规律、可以在线上开展的教学环节和内容。包括：训前的学员需求调研、“两带来”材料提交、理论书籍推荐；训中的在线选学、在线答疑、在线研讨，为配合线下讲授开展的辅学材料推送、视频课程推荐等，还有一些教学模块如权威解读和专家答疑解惑，党性教育案例和理论教学视频课等，都可以在线上开展，同时，在线选学的相关内容可以计入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时比重；训后利用网络追踪培训对实际工作的促进作用与成效，进行学习成果转化评估。通过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有效整合及教学一体化设计，形成促进“三育”融合、不断提升培训效果的良好局面。更重要的是，学院“三育”融合的成功经验可以在干部教育系统内广泛推开，这种线上线下互动能够积累丰富的干部教育培训数据，为培训需求与计划生成、培训执行与干部素质及专业能力提升等提供数据支持和研判依据，从而切实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整体效果。

参考文献：

- [1]孙兵，李东东. 准确把握理论教育与党性教育的内在关系[N]. 学习时报，2021-11-12.
- [2]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N]. 人民日报，2019-03-02.
- [4]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N]. 人民日报，2021-09-02.
- [5]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 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7]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N]. 人民日报，2020-10-11.
- [8]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N]. 人民日报，2019-09-04.
-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N]. 人民日报，2021-12-29.
- [10] 郭文奇. 以高质量培训助推高质量发展——关于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的几点思考[N]. 学习时报，2018-07-27.
- [11] 何丽君. 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成效、问题及优化路径[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2）.
- [12] 林永煌，林丽芳. 政治训练：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与反思[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9（2）.
- [13] 习近平. 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2020年3月10日）[J]. 求是，2020（7）.
- [14] 赵刚印，曾峻.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干部治理能力的“短板”及其提升路径[J]. 理论探讨，2020（6）.
- [15]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10月26日）[EB/OL]. <https://news.12371.cn/2015/12/15/ARTI1450153301377752.shtml>.
- [16] 梅黎明，夏贤明. 中央苏区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化研究[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1（2）.
- [17] 课题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分析[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6）.

[责任编辑 张 华]

Thought on the Promotion of “Three-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Leadership Education: Case Study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YU Qiulan

(Department of Participant Affairs,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Shanghai 201204)

Abstract: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of the new era, theory education, Party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and specialized expertise education, as three key components of leadership education, hav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ir connotations and the demand of organic integration. The effective path to “three-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leadership education is to take Party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as “element in series”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theoretical main thread”.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can make more achievements in current training innovation of “three-education” integration by using unique training resource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training program organization, promoting the training advantages, and improving overall support.

Key Words: theory education; Party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specialized expertise education; “three-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leadership education;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上接第 99 页）

Historical Study of Law-Making Process of the Supreme State Conference System

ZHANG Shunyu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The system of Supreme State Conference was stipulat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1954* and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first appeared in the first re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drafted by the Constitution Drafting Team chaired by Mao Zedong in January, 1954, took the early form in *The First Draft of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arch, and took the basic form in *The Draft of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une. After consultancy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national discussion, it was finally establishe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Constitution of 1954*. Its adoption is the result of hot and thorough discussion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Party,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and from top to bottom, which reflects distinct openness and the pursuit for democracy and rule by law. As a transitional system, it was stipulated according to political dema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law makers made some fuzzy treatment of its article which allowed of some flexibility in practice.

Key Words: Supreme State Conferenc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stitution of 1954*

墨子的义治市场经济思想 及其现代意义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企业研究所, 北京 100010)

摘要:墨子思想中含有明确的市场逻辑和亲市场内容,梁启超对墨子思想有着巨大误读。墨子还特别强调义,认为“万事莫贵于义”。综合来看,墨子有一种义治市场经济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照亮法治市场经济的盲区。法治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避免许多不义的交易行为;在历史上,法治市场经济曾经伴随着性别歧视、奴役劳动甚至奴隶买卖,以及暴力性经济活动;即使在现代,法治的正义也需要自然法思想的引入。因此,墨子义治市场经济思想也具有现代意义。未来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义法市场经济。

关键词:墨子;市场经济;义法市场经济;正义;法治

墨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在两千余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墨学的社会知名度和政策影响力远大于儒学,现代学者常以《孟子·滕文公上》篇中的“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来说明当时墨学之盛况。一提到墨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其“兼相爱,交相利”和“非攻”思想,但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长期以来对墨子思想的认识也仅仅停留于此。本文试图挖掘墨子思想体系内在的市场经济思想,并进一步抒发以孟子的“义”来节制市场机制的政策思考。本文绝非为刻意求得学术上的标新立异而附会,也非为刻意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而牵强。本文希望,通过将一些古典思想与现代制度放在一起进行审视,从而能发现各自的盲区,以为市场经济制度在未来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墨子是市场经济拥护者

(一) 梁启超对墨子的误读

墨子思想自秦汉以来几近湮灭,偶尔有唐代韩愈、明代李贽等人对墨学有所涉猎,到了清代《墨子》才受毕沅等人完整注释,而至20世纪,才由一些知识分子重新阐发和宣扬,其中贡献最大者当数

梁启超。但是奇怪的是，梁启超把墨子说成是一个倡导公有制、反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墨子学案》一书中说：“墨子最要紧的一句话，是‘兼以易别’，兼和别的不同在哪里呢？老实说一句，承认私有权的叫‘别’，不承认私有权的叫‘兼’；把一切含有‘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成为一个‘共有共享’的团体，就是墨子的兼爱社会。”他还说：“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确是实行墨子‘兼以易别’理想之一部分。”梁启超在这本书中，多次表示墨子的思想与苏俄的实践比较接近。^{[1]1-27}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同为史学名家的郭沫若，其社会主义思想比梁启超更加明确，但对墨子思想的认识却与梁启超截然相反。郭沫若于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墨子的思想》一文认为，墨子倡导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其“非攻”就是反对侵犯私有财产，本质就是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权，所以墨子“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墨子借“天志”“明鬼”等方式实行“尚同”，便是要建立绝对君主专制统治，是要维护王公大人的统治地位和权力，因此墨子思想是宗教色彩很强的“反革命”思想。^[2]

墨家思想到底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反社会主义的，梁郭观点截然相反。不过只要通读《墨子》原著，无论如何都无法像梁启超那样得出墨家提倡公有制的结论。墨子尖锐抨击“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墨子·兼爱上》），明确反对“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杀不辜人，拖其衣裘”（《墨子·非攻上》）等行为，严厉斥责“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等现象（《墨子·明鬼下》）。很显然，墨子提倡的“兼”，不但承认私有财产，更反对侵占他人私有财产。在这一点上，郭沫若的看法是正确的。从梁启超的思想演变轨迹来看，在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对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表现出较大兴趣，很显然，在推介墨子思想时，梁启超把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墨子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极不严肃。由于梁启超在学术界影响极大，同时也被视为推介和研究墨家思想的第一号人物，他给墨子贴上的这一思想“标

签”，此后竟然没有遭遇强大质疑，即使郭沫若唱了“反调”，也因郭有着过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很少得到附和，所以梁启超关于墨学的社会主义色彩论点俨然成了定论。

（二）墨子的市场思想

在承认和尊重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墨子有着明显的市场思想，尽管由于处在那个时代，他的市场思想并不可能达到现代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的程度。

如何得出墨子具有市场思想这一结论呢？即使不去通读《墨子》原文，只要对他的思想有初步了解，就知道“交相利”是其思想的主线。试问，还有其他机制比市场机制更能实现“交相利”吗？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有一句名言，你能够享用盘中的牛肉，并不是因为屠夫对你报恩，而是因为他要对己自利，说的正是“交相利”。而且，墨子一直都不回避“利”，连在那个混乱年代需要一点“避嫌式”批判“利”的言论都没有。他明确指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辞过》）；“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墨子·贵义》）。他对利的看法比较客观，知道“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墨子·经说上》），等于承认利益能给人带来愉悦和快乐，这与现代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与孔学的虚伪和忸怩作态泾渭分明。他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利的可能性。在阐述“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时，他就说过“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正因为墨子不但能客观看待利，而且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互利的可能性，所以他就能将利与爱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形成兼爱和交利相融合的思想。

墨子对市场和市场活动参与者有着明了和由衷的赞叹。《墨子》明白无误地表示，“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不敢继苟而讎焉，必择良者”，“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徙，不可胜计，然而不为，然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墨子·贵义》）。尽管市场中的不少商人的确有正面和负面的两面性，但对商人的正面性有这样客观的认识和不带身份蔑视的评价，在那个时代的文人中十分罕见，要知道，文人通常对商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居高临下

态度。更进一步，墨子还专门阐述了市场机制。他说：“买无贵，说在佞其贾”，“贾宜则售，说在尽”（《墨子·经下》），“贾宜，贵贱也”（《墨子·经说上》），“买，刀余相为贾，刀轻则余不贵，刀重则余不易；正贾也宜不宜，正欲不正”（《墨子·经说下》），等等，都是讲市场机制的规律和作用。

墨子推崇市场，也不完全就是提倡经商流通。墨子还非常注重发展生产，并且提倡专业化分工，以及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新产品。他强调：“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七患》），“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并且提出，“姑尝数天下分事”，“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緼布絺，此其分事也”（《墨子·非乐上》）。显然，他鼓励人们从事生产，实行分工。他甚至看到了分工细化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个人能力的提高。譬如他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鞮、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就是这个意思。

拥护私有产权，肯定市场机制，鼓励劳动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毫无疑问使得墨子成为那个时代杰出思想家中稀有甚至仅有的市场论者。虽然墨子的上述叙述和阐发，现在来看并不属于什么高深的知识和理论，但那时能客观分析市场机制和专业化分工，并作梳理和总结的思想家，实在鲜见。无论是《论语》《商君书》，还是《管子》《晏子》，都缺乏《墨子》那样的市场思想。《论语》只是在比较颜回和子贡时说道：“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篇》）孔子虽然并不明确反对市场活动，但他的口吻是看不起子贡的，尽管也有一点对自己学生能赚大钱的得意之情。商鞅等法家人物对市场的负面性看得过重，因而更加重视对市场的管控和压制。《商君书》明确声言，“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所以要“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内外》）。而管子、晏子等人作为实干家，虽然不排斥市场，但却是从政府理财聚财的角度来看待市场，与墨子有着根本区别。墨子毫不掩饰其对其他学派，特别是对儒学的批评。墨子说，儒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古

者羿作弓，伾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伾、奚仲、巧垂皆小人也？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墨子·非儒下》）就是批评儒家鄙视生产，看不到创新的力量。

（三）“兼相爱，交相利”和“非攻”的市场经济逻辑

总而言之，在中国那时及以后所有的思想家中，墨子最为尊重私有产权，承认个人利益，认同市场机制，强调专业化分工，鼓励发展生产和从事创新。20 世纪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为》中，恰恰把市场经济定义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为自己谋利，同时也满足他者的需要。^{[3]253-304}以米塞斯的定义来衡量，墨子是一位典型的市场经济思想家。

墨子的市场经济思想当然不是破空而来，而是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实际中，因为在那时，市场经济在中国可能相当普遍了。英国制度经济学家霍奇森论述道，虽然学者们对市场经济在一些古代文明中是否占有支配地位还存在争论，但两千多年前，中国的确存在市场经济了，尽管那还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4]116}可以认为，墨子在人类较早时期的市场经济中，构建了其具时代穿透力的思想体系。

墨子的市场经济思想，内嵌于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兼相爱，交相利”和“非攻”本身就蕴含着市场经济的逻辑。在社会活动中，除了极少数不把自己生命当回事的人之外，每个人都有最起码的维持和延续生命的自爱自利动机，以及进一步延伸的其他自爱自利动机。如何实现自爱自利动机？最原始的方式就是抢掠他人，这就是墨子一直都在猛烈抨击并身体力行设法消除的“攻”。墨子清晰地表示，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危害，就是“攻”，就是“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墨子·兼爱下》）。但是，仅仅讲“非攻”，并不能解决如何自爱自利的问题。在自爱自利无法避免和根除的情况下，“非攻”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交相利”的市场经济活动，也就是说，“非攻”和“交相利”相辅相成，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墨子的兼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爱自己只爱别人是两

码事，兼爱也包含对自己的爱，但是反对不爱别人只爱自己，反对不考虑公共空间的自私自利。墨子把兼相爱和交相利连在一起，从而与市场原理达到内在一致，他所引用的大雅诗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墨子·兼爱下》），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墨子的解决方案。把墨子的解决方案与孔子、商君、管子等人的解决方案相比较，完全可以看出，在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交互活动中，没有任何其他交互性行为比市场经济更有可能持久和公平地实现“兼相爱，交相利”了。

二、市场缺陷和法治市场经济的盲区

（一）自发型市场的负面现象

但是，市场经济是否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持久和公平地实现“兼相爱，交相利”以及“非攻”呢？

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说市场经济与“兼相爱，交相利”和“非攻”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所以有利于缓解和避免暴力、欺凌、劫掠、欺诈等行为，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市场经济活动都是自主、平等、竞争和有效的，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会秉持和自觉遵循互利、合作、和平、公道的理念和规范来开展经济社会活动。在墨子前后那个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学者那么地不喜欢贸易和市场？难道是因为他们智商不够？当然不是。孔儒不屑于市场活动，很大程度上与其根深蒂固的身份观有关，也可能还与其天命观有关。但商鞅不一样，他实际上非常敏锐，认为“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商君书·外内》），“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应该说在当时“救亡图存”背景下，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他要兴农战，当然要抑商抑市。韩非子则非常具体地抨击了“奸财货贾得用于市”“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商工之民，修治盐廛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牟农夫之利”“今世近习之请行”（《韩非子·五蠹》）等行为，就是说，商工之民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粗制滥造、牟取暴利、贿赂权臣，所以必须禁止。即使韩非子可能对这些现象有所夸大，但应该不是杜撰。《盐铁论》也提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

或不厌糟糠也”（《盐铁论·错币》），说的就是商家垄断市场、囤积物资，富者可食百年、贫者只食糟糠的现象。《管子》尽管不排斥市场，但也列举了很多乱象：“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赙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岁适美，则市赧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余釜十糲，而道有饿民。”（《管子·国蓄》）上述现象，即使到了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已经比较现代化了的现在，也难以完全禁绝。

当代经济学家也分析了市场失灵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这里无需多言。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专门问题进行了分析。譬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就论述了自发型市场存在的问题，包括垄断、欺诈、胁迫、盘剥、腐败，以及暴力行为。^{[5]185-196}实际上，上述的《韩非子》《盐铁论》和《管子》所激烈抨击的问题，正是自发型市场容易出现典型问题。有些市场行为，譬如利用商品一时短缺之机，大幅提价牟取暴利，尽管从学术角度来看未必不合适，但会引起民众心理上的巨大不适感和极大厌恶感，所以反市场的普通民众比反市场的学者要多得多，因为学者对市场还可以进行一分为二的客观冷静分析，而普通民众面对这些问题则往往愤慨不已。

（二）法治市场经济的致命盲区

市场经济尽管其本身存在难以避免的缺陷，但自从20世纪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实验失败之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更能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体制。不过正如奥尔森指出的，虽然繁荣国家普遍利用市场机制，但在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也无处不在，而那里的经济却非常糟糕；所以他将市场分为自我实施型市场和社会规划型市场，并认为后者的形成需要法律体系和政治程序作支撑，这样的市场经济才会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繁荣。^{[5]183-185, 196-198}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倡导者吴敬琏就说，在改革开放早期，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开放了市场，就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的幸福，而过了

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而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有法律并不等于有法治,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法之良善、司法公正等等都是法治的要素。^{[6]104-105,140-158}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对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经济学界的认知变迁以及我国的治国理念变迁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实行法治市场经济,几乎成为一个终极方案。

但是,经济学界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法治市场经济仍然存在致命的盲区。审视一下历史事实,对于认识这个盲区很有帮助。根据耶鲁大学金融学家戈兹曼的研究,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巴比伦地区的乌尔城,当时市场经济比较普遍,而且有了大致的法治框架,《汉穆拉比法典》详细规定了从商业规范到财产权利的具体内容,明确了法官、陪审团、证人、原告、被告的各自责任和权利。这部法典明确规定,个人可以将自己的自由作为贷款的抵押,债务人无力还债时,债权人有权把他卖为奴隶。显然,这样的法律没有“义”,这样的法治不是正义的法治。后来乌尔城的统治者里尔-辛颁布了一道敕令:所有贷款均予作废。这个敕令颁布之后,许多债权人纷纷向法庭起诉,以图获取贷款抵押品的财产权,但大多没有成功。不过,尽管这项敕令获得了许多贫困人口的支持,但是后果是乌尔城的金融和贸易迅速萎缩,此后繁荣不再。^{[7]25-35}乌尔城的历史告诉人们,将人的自由进行抵押,一些人因此而合法地变成奴隶,这样的法治市场经济,纵使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完全背弃了“义”;而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在义愤之下,或借义愤之名,一股脑禁止交易、废除契约,又会严重伤害市场经济。因此完全可以说,市场经济的法治与义治,缺一不可,相互不能替代。仅有法治而无义治的市场经济,很有可能激发义愤,并且这种义愤被一些人利用,使市场经济被禁止;当然,仅有义治而无法治的市场经济,并不能使义治保持长久。

缺乏“义”的法治市场经济,绝不仅仅存在于两千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进行阐述时就尖锐地指出: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国家就通过立法帮助了一

些人进行土地掠夺;在18世纪,法律本身成为掠夺土地的工具,最典型的就是“公有地圈围法”;而更早的时候,如16世纪爱德华六世时期颁布的法律就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被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有权用鞭子和镣铐来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三次,就要当作叛国犯被处死。^{[8]229-240}马克思的阐述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对英国法治史的研究表明,英国在17世纪中叶,就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到19世纪初则更建立了系统发达的法律体系。美国在建国后也一步一步地移植并发展了这个法律体系。^{[9]141-220}如果说英国、美国在19世纪,甚至更早时候的18世纪,就已经是法治国家,就已经是法治市场经济国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英国制度经济学家霍奇森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国的妇女和儿童仍然被主导家庭的男性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在1870年以前,丈夫可以合法地控制妻子的收入,在1882年之前,妇女不能拥有个人的合法财产。霍奇森还不无挖苦地说,经济学把人当成人力资本,历史上有一些重要学者就认为奴隶可以作为资本,而自由人则不应该被纳入资本当中。^{[4]159-165}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等人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奴隶制经济高度发达,而且奴隶制保证了强制分工协作及严格的劳动纪律,所以生产效率较高,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竞争力。^{[10]130-180}试问,英国、美国十八九世纪的这些法治,纵然是“亲市场”的,但在这样的法治市场经济中,如此合法地进行人身控制和财产控制,如此合法地进行奴隶买卖和强迫奴隶劳动,如此合法地欺凌弱者,即使在效率上具有竞争力,也保证了社会秩序,但这些做法有“义”吗?好在陪审团制度,以及衡平法理念,给那时的法治市场经济增加了“义”的成分,同时由于各种进步力量的推动,法治市场经济总体而言朝着增加“义”的成分的方向不断发展。

法治市场经济的盲区远不止上述情形。经济史学家彭慕兰和托皮克的研究显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大航海和远航贸易时期,暴力在市场中层出不穷,一些暴力劫掠和暴力强迫交易甚至得到了欧洲国家政府的许可和支持;而且,欧洲白人将美洲大陆从未有过的新病毒带入,造成90%

以上印第安人因病死亡。^{[11]268-329}显然,欧洲贸易商没有对这些“负的外部性”进行必要的管理和补偿,这就是当时西方法治市场经济对非西方地区 and 人民的“不义”成分。还有一些研究显示,即使在英国和美国本土,19 世纪的市场经济大发展,也助推了许多问题的涌现。例如,历史学家迪纳的研究显示,在 19 世纪大多数时间里,严重的官商勾结和腐败、垄断和操纵市场等问题,劳工权益、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得不到应有保护等问题,在美国都非常严重,虽然类似问题在非法治国家更是大量存在,但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总量急剧增加,使得问题总量也急剧增加,而且人们对法治疏漏的不满远甚于对没有法治的不满。直到 19 世纪末,社会上掀起的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运动,有力推动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并通过加强公民自治力量和政府力量,才显著扭转了局面。^{[12]11-68}

(三) 如何走出法治市场经济盲区

即使到了现在,法治市场经济的盲区仍然存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研究了市场经济中的身份与暴力等议题。他看到,在一个貌似平等竞争的世界里,个人之间的竞争往往与群体之间的竞争联系在一起,而身份认同会成为一种不由自主的必须选择或必然标签;分野和仇恨会强化身份认同和竞争区分,从而容易导致暴力行为,这本身又会极大地伤害市场运行和经济发展。^{[13]1-32} 美国哲学家桑德尔还就市场机制的广泛渗透发出了这样的质问:难道父母可以出售自己的孩子,选民可以出售自己的选票吗?如果任由市场机制渗透了人们的身体、器官、健康、人伦关系、家庭生活、公民权利、人与自然关系等各个方面,那么这与人类的良善生活是否背道而驰?^{[14]235-240} 尽管桑德尔将许多古已有之的问题一股脑归咎于现代市场经济并不妥当,但这样的质问对于促进我们思考如何发展更加有“义”的市场经济不无裨益。

之所以把上述种种问题归之为法治市场经济的盲区,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即使实行法治,也无法根本解开这些困局。从可预见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探索来看,人类在未来一个时期还将沿着市场经济和法治道路走下去。但遗憾的是,许多人把法治当成了一个“尤里卡”式的弥补市场经济不完美的完美方案。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必须认真

思考,怎样才能找到一条走出法治市场经济盲区的可行路线。这条可行路线,不管具体途径是哪一条,都必须增加“义”的成分,符合“义”的原则。当然,“义”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墨子对此有明确而深刻的阐述。墨子之义,与他的市场经济思想出于一辙、融为一体,即使在现代经济学家群体中,也少有如此明达而深邃的智者。

三、墨子义治思想照亮法治市场经济盲区

(一) 墨子之义

墨子有着明确而强烈的义治思维。《墨子》专门有一章叫“贵义”,开篇就说:“万事莫贵于义。”他明确提出:“且夫义者,政也。”(《墨子·天志上》)显然,墨子将义置于他思想体系中至高无上的位置。

那么墨子的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兼相爱,交相利”视为其义的最高标准;但也应该注意,墨子之义还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非攻”,或者说,“攻”触犯了义的红线。对于这条红线,他有具体论述。他认为,如果不能区分攻与非攻之间的非义与义,就好像“不知黑白之辨”(《墨子·非攻上》)。他严厉抨击“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墨子·兼爱下》)等行为,认为这些行为不是爱人利人,而是恶人贼人,不是兼,而是别,“此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下》),所以必须“兼以易别”(《墨子·兼爱下》)。做兼士,实行“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就是行义。他强烈谴责攻伐行为,“夫取天之民,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墨子·非攻下》),所以不利于天;“夫杀天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墨子·非攻下》),所以不利于鬼;“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也”(《墨子·非攻下》),当然也不利于人。不利于天、鬼、人的行径,是不义的行径。

墨子将义与天、鬼、人牢牢联系在一起。他将人视为天民,而“天欲义而恶不义”(《墨子·天志上》),也就是说,义是天志。他又将人视为鬼神之主、先王之后,而鬼不但存在,而且能够对活着的人赏贤罚暴、赏义罚不义,所以他强调“明鬼”,以此促进人间的义。墨子独特的明鬼思想,曾受到郭沫若的严厉抨击。为什么要明鬼?墨子认为,人们从事很多不义之事,是因为他们“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

而罚暴也”（《墨子·明鬼上》），如果告诉人们，鬼神的确会赏贤罚暴，他们就不会从事不义之事。他举了一些例子，说明“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墨子·明鬼下》）。现代人也许会批判墨子的鬼神迷信，但事实上，即使在当今，我国农村地区甚至城市里仍然有许多人相信鬼的存在，并因为怕鬼的报复和摄魂而对干伤天害理的事情有所顾忌。墨子把义与人牢牢联系在一起，当然顺理成章，这也反映了墨子有着最朴素、最基本的人本思想。

（二）墨子之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

由于墨子之义有攻和非攻这样的客观标准来衡量，所以说墨子之义具有客观性，这就有利于把握某个人是在行义，还是在行不义。墨子之义的客观标准，对每个人而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也不管你是哪个邦国的人，都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墨子思想中存在一个普世之公义，而不是每个人自以为是、自行其道、缺乏共同标准的私义，所以他呼吁“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墨子很担心“一人则一义，十人则十义，百人则百义”（《墨子·尚同中》），因为“义不同”（《墨子·尚同下》），就会造成“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中》），结局就是“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中》）。因此，必须“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上》），“尚同一义为政”（《墨子·尚同下》）。墨子的普世之义，就是前面两段所论述的内容。

既然墨子之义具有客观性和普世性，他就特别指出，对亲戚、兄弟不能偏袒，即“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兄弟之所阿”（《墨子·兼爱下》）。显然，墨子之义，与亲戚朋友之间的“义气”及江湖“义气”截然不同，前者是公义，后者是私义。墨学提倡不分身份的普世公义，是其与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古典学派——儒学的一个重大但又被许多学者所忽视的区别。孔子也倡义，例如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但是孔子一方面，对义没有作出清晰界定，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定义的客观标准。有孔学专家认为，孔子的“义”是“宜”的意思，指的是行为尺度，而非行为规范。^{[15]50} 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即使其义包

含一些行为规范的内容，那也是礼之下的义，与墨子的公义有着本质不同。孔子在《论语》中明确反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论语·子路》），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这就是典型的“亲亲尊尊”的礼治思维，在这种思维下，义是分身份的，而墨子的义则不分身份。孔子见到不同身份的人，仪态和脸色也有区分，或者蹀躞如也，或者闾闾如也，或者侃侃如也，或者恂恂如也。而墨子则没有这一套讲究，他不假辞色地抨击儒家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墨子·非儒下》）的身份区别。墨子认为，“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墨子·天志上》），就是说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应该不分身份，都应该受到天志赋予之普世公义的对待。墨子虽然也讲过“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智者出”（《墨子·天志上》），但从前后文来理解，这里的“愚且贱”“贵且智”主要不是指人的身份，而是指人的思维导向和行为规范。墨子的关于客观和普世之义的思想，也远非对中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另一古典学派——法家所可及。法家对义的论述很少，但总的来看，法家认为社会上所谓的义，皆为私义，所以对义基本持否定态度。《商君书》就有一个著名论断：“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商君书·画策》）。他进一步解释：“今世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商君书·开塞》），包括君主也“废法作私”（《商君书·画策》），而且“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商君书·画策》）。法家对当时的人性民风也有自己的判断，就是“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商君书·开塞》）。所以，法家要以法来抑制民间的私义、私勇以及巧伪，故曰“民本，法也”（《商君书·画策》），“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商君书·画策》），“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商君书·开塞》）。法家文献中的确也有并不否认定义的些微词句，但其根本思维还是，只要治法明，真正的公义就会得到贯彻和提倡，因此，真正的“所谓义者”，不过是“此乃有法之常也”（《商君书·画策》）。从墨与儒、法的比较来看，完全可以说，墨子之义，及其义的普世性，在我国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无与伦比的。

（三）墨义比儒礼和執法更亲市场

总体而言，可以认为墨子思想的核心是义，兼

爱交利及非攻思想是其表，义是其里。而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仁义道德、圣贤君子是其表，礼是其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法，农战、去强和弱民是其表，法是其里，当然其“错法”并不等于现代法治。

墨子的公义思维，以及兼爱交利和非攻思维，是真正的亲市场的思想。正如前文所述，“兼相爱，交相利”和“非攻”本身就蕴含着市场经济的逻辑，而客观和普世的公义及其所包含的非身份化平等思维，与市场经济平等化互利交换、不分身份的分工协作及和平互惠，是完全契合的。在我国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没有其他任何有影响的思想，比墨家的思想更加亲市场。

首先是儒礼思想，它不比墨义更亲市场，甚至可以说，儒礼不是亲市场的思想。孔子重仁，就字面而言，似乎也蕴含爱及平等的思想。其实不然，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克己复礼为仁。有些所谓的新儒家学者认为，儒礼就是习惯法体系及自发秩序，尊重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内含企业家精神和公平竞争思想，所以儒家支持自由市场。^{[16]133-156}这样的说法也未免过于牵强。从先秦所有儒学思想家那里，完全看不到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表述，恰恰相反，他们对市场活动的蔑视倒是往往溢于言表，后世重要儒家人物也一脉相承地对市场经济极为不屑。墨子曾讽刺儒士“繁登降之礼，务趋翔之节”和“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墨子·非儒下》）的繁琐虚伪，斥责他们“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菽丧，足以至矣”（《墨子·非儒下》）的丑陋行为，并揭示他们背后“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墨子·非儒下》）的陈腐思维。儒家的天命观也使他们失去进取心和积极性。在孔儒思维中，不管贫富，都是天命，都应接受。而墨学的天志观则完全不同，其天志思维与非命行动总是联系在一起。墨家呼吁人们不要相信命运的安排，而要积极从事生产、力行义事，并对农夫和农妇不信命中安排的夙兴夜寐、勤劳致富行为称赞不已。其次是商鞅的法家思想，它虽然倡导人们积极进取，但其恶商恶市思维是明白无误的。例如，商鞅要实行“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并解释道：“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商君书·农战》）商鞅并不绝对反对商业活动和市场经济，因为他在《错法》中也说过，“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苟有道，里足以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财货可聚也”。可以理解为，商鞅容许的市井活动和财货聚集，只能局限于不伤害农战的范围之内。再次，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学派——道家。这一学派主张无为，人们也可能误以为它有亲自由性的一面，但《老子》明确说：“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老子·第八十章》）绝然看不出它对市场有什么偏好。总之，在这些主要思想流派中，只有墨义是亲市场的思想。

（四）墨子的义治市场经济

墨子倡导义，更要实行义。墨子本人四处奔走，亲力行义，他不但四处宣传他的兼爱交利和非攻思想，面见并劝说君王放弃攻伐别国的行为，而且率领弟子，为受攻国家强化防守工事。墨子的众多弟子也积极从事分工化的手工业活动。可以想象，这必然会有市场交易行为。

墨子还为天下实行普世和同一之义设计了实施方案。其方案当然不是现代社会的民主协商、大众投票的方式，而是尚贤、选贤的方式，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然后天子再选择天下贤可者立为三公，以此类推，一直到诸侯、正长、里长、乡长。他并没有说出由谁及如何选出“贤可者”，这显然是其理论的巨大漏洞。但那个时代所创立的理论，也只有这样了。

创立思想，亲力实行，倡导实施，设计方案，从而使墨子之义成为一个完整的义治思想。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思潮并起，有思想的何止墨子一人、墨学一派。但是，墨家的义治思想，比孔儒的礼治思想，比商鞅思维中的法治思想，更加符合人性，更加具有进步性，也更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把墨子的义治思想与其市场经济思想联系起来，概括为墨子义治市场经济思想，不但逻辑上完全相通，而且事实上也完全成立，尽管墨子及其弟子并没有使用义治市场经济这样的关联性表述，那个时代也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表述。墨子的义治市场经济思想是一个逻辑自洽、言行相符的思想体系。如

果这样的思想体系在现实当中得以实行,在那个时代必定可以比其他思想体系更能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和平发展。但世间的残酷事实就是,美好的东西并不一定行得通。只有到了近现代,市场经济才借助科技和法治两个轮子,飞速地推动着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和平发展。因此,我们还要重新回到法治这一议题。

四、中国的墨子义治与西方的衡平法治

(一) 墨子义治思想就是中国的自然法思想

市场经济的存在,肯定早于古代思想家对市场经济的赞颂和提倡。但是市场经济需要持续焕发边际递增的正面效应,市场活动需要得到必要的节制,才会使市场经济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其自身也更加安全。美国政治学家温加斯特认为,繁荣的市场不仅需要合适的产权体系、自由的价格机制和合同方面的法律,也需要一个安全的政治基础,这就是市场维持型政治体制和宪法法治,以及稳固并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17]92-110}显而易见,法治对市场经济持久发挥正面作用至关重要,尽管本文已经指出法治市场经济也存在盲区。

就法治本身而言,它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体系。恰恰相反,在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中,法治经历了很多演变,其中一个重要演变就是英美法当中衡平法的确立和发挥作用。衡平法在14世纪的英格兰问世,并被置于极具权力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的保护之下,因此大法官法院或衡平法院应运而生,专门处理那些涉及口头承诺、信用,以及妇女、儿童、穷人等弱势群体之权利的案件。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法兰所言,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衡平法与普通法一起共同构建了英国法律体系,并弥补了历史上普通法的僵化、冷硬之缺陷,催生了现代世界的形成。^{[18]214}

衡平法是从古老的西方自然法思想中孕育出来的。自然法理论的先驱,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学派就认为,自然秩序、自然正义,源于神的意志,永久关注社会公正和个人平等,它的存在不证自明。自然法思想及其所孕育的衡平法体系,对于纠正法律中的不义,对于增进法治的正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直到现代,自然法思想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一直在引领人类走出市场经济的盲区,

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正义性节制。现代法学家吴经熊感叹,尽管有了推进衡平法发展的几个世纪的努力,但到了19世纪,在产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广泛蔓延下,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横行,导致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来应对讹诈和狡诈,英国和美国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在正义思维和进步思想的推动下,开始给予妇女以正当和正常的财产权利,开始保护劳工的正当和正常的人身权利。^{[19]9, 16}法学家史丹彪的研究显示,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是一个基于自然法体系而形成的法典,体现了进步思想;他还引述帕尔卡斯之语:尽管随着实在法的不断完善,自然法已经隐退到实在法的幕后,但只要实在法变得客观的不正义,自然法就会再现。^{[20]9, 171-175, 239}

而我国墨子的义治思想,不但是亲市场的思想,也可以视为中国的自然法思想。墨子的义治思想,最基本的主张,就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墨子·天志上》)。这样的基本主张,是以平等作基调的。荀子曾非难墨子的学说“尚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荀子·非十二子》),真是一语中的,这样的批判现在看来简直就是表扬。显然,这样的义,可以赋予法更多的正义、平等、博爱,可以引导法走向更少的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者欺愚。在市场经济当中,人们常常强调尊重产权,遵守契约,遵循分工,可是在历史上,乃至在现今,又有多少财产不是来自强者劫弱,有多少合同在履行中不是多诈者欺愚,有多少分工不是贵者傲贱?将义治精神注入到法治当中,当然可以节制市场经济中的这些现象。因此,墨学的义治思想,正是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和衡平思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义治思想与自然法思想在“非攻”方面也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正是自然法思想,引导了国际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尽管至今为止,义和自然法还无法从根本上遏止“非攻”。有意思的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和墨子义治思想,都被赋予神的意志和宗教色彩。吴经熊就认为,自然法就是一个理性的造物主对永恒法则的参与;永恒法是神意之筹划,绝对完美,但是,如果没有超验与神作为基础,法律就会成为坏政府所掌

控和滥用的工具。^{[19]85}而墨子的天志思维和明鬼思想,不正与斯多葛学派不谋而合吗?完全可以说,墨子的义就是中国的自然法,墨子就是中国的芝诺;或者说,芝诺是西方的墨子。他们生在差不多同一时代,巧合的是,它们不但都崇尚自然正义,而且都崇尚逻辑学,也许这不是偶然。

我们相信,尽管人类已经进入现代,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但是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可以预言,依靠天志和神灵的意志来为人类伸张正义的进程远远没有完结,也永远不会完结。因此,西方自然法思想没有过时,我国墨子的义治思想也远没有过时。在法治的未来进程中,永远需要义治灵魂的统摄。墨子的义治思想,非常有助于引领人类社会走出法治市场经济的盲区。

(二) 义治缺陷必须由法治来弥补

但是也要看到,义治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实施方面的缺陷。正如前文所言,墨子义治的实施,要挑选出贤明的天子,并依次选出贤明的三公、诸侯及基层首长,但他并不可能设计出挑选“贤可者”的可行方案,他要实行“天志”之义治,所能诉诸的最现实手段,就是“明鬼”那一套东西,以及他和众弟子马不停蹄地四处制止攻、帮助保持非攻。

墨子也知道,治国要有法,没有法,义也不可能得以实现。墨子专门论述了法仪。他说:“天下从事者不可无法仪”,“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墨子·法仪》)。如何确定法仪呢?他认为,天下为父母者众,为学者众,为君者众,但他们中的仁者寡,“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而必须“法天”(《墨子·法仪》),就是要根据天志天意,置法立仪,“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墨子·天志中》)。墨子特别强调,要“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墨子·尚贤中》)。从“法明”的角度而言,墨子的法仪,与商鞅的错法,并无根本不同。法家也主张确立没有私义私德的治法。《商君书》说得很清楚,“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商君书·开塞》)。当然,商鞅虽然反对亲亲和爱私,但并不是绝对地不要亲情和私利,而是要以治法之明来遏制其泛滥。在那个时代,墨家和法家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毕竟,墨家和法家的法仪、错法,并不是现

在的法治,并不能回答如何挑选贤明的天子、国君,如何制约和惩治不贤明的天子、国君及他们的家族成员和党羽,如何使法不受这些人物和其他强势人物的干预和操纵,如何使法能够不断顺应普通民众的意愿而具有进步性,等等问题。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义治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历史也已经证明,无论法家如何推行错法,无论墨家如何实施法仪,都不可能有持续和稳定的义。儒家理念同样不能解决上述问题。一些所谓的新儒家学者认为,儒家的礼治相当于英国的习惯法体系,儒士集团相当于实施礼治的相对独立的专业团体,具有现代宪政主义的内核,与现代法治相通。^{[16]208-240}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厢情愿的曲解。即使礼来自尧舜和文王时代的普遍习俗,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言,如果认为习俗和法律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正义的,那是非常愚蠢的想法。^{[21]170-189}吴经熊就说过,中国女人裹脚从前也是普遍习俗,但这种习俗不但扼杀人性,而且也会扭曲人们的判断力,他自己在小时候看到女人小脚觉得美妙绝伦,但长大了就觉得恶心不堪,因此很多习俗即使长期存在于现实,也并不一定符合正义。^{[19]186-205,312}可以肯定地说,儒家与法家、墨家一样,它们的法与现代宪法和法治存在根本区别。反而是法家和墨家,都主张适时改进法律,以及适时改良习俗。《商君书》强调:“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商君书·壹言》),“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墨子》认为,“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也。……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墨子·非儒下》),大概都是这个意思。而对王权的趋附,法、墨、儒都一样,只不过儒士集团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墨子的义治,连同他所强调的法仪,毕竟与现代法治截然不同。他的义治市场经济思想,也不是现代法治市场经济思想。而现代社会,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当然需要以法治为基础和保障,这是毫无疑问的。墨子的法仪、商鞅的错法与现代法治之根本区别,不仅仅在于法律的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以及法之良善,在于权力的制衡性和司法的独立性,也在于法律规则可以覆盖到包括“贤可者”在内的所有人,天子、三公、诸侯概莫能外,以及还在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行为的增强。作为古典思想的墨子义治的缺陷,需要现代思想的法治来弥补,

这没有什么好赧颜和羞于承认的。墨子如果能活到现在,他应该是举双手赞成法治的顶尖思想家。

(三) 未来的义法市场经济道路

市场行为应该是自发生成的,朴素的市场经济应该是自然诞生的。思想家的出现,政府的存在,到底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会使市场体制更加健康和更加安全呢,还是相反?思想家会对市场机制作思考,政府会对市场活动作调节,如果思考和调节得当,就可以使市场经济更加健康也更加安全,如果不得当,则效果相反。18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家对市场机制进行了前人不可企及的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但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即使到了20世纪,与兰格针锋相对,米瑟斯与同一阵营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最后也只能从知识的分散利用和个人的自由权利等角度,而不是以严密数学论证的方法,来强调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2]97-136, [23]}但是,哈耶克等人也没有从法治市场经济的盲区这个角度,来研究如何弥补市场机制的缺失。倒是亚当·斯密写了一部《道德情操论》,强调个人的正直、同情心所具有的意义,但是他也没有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讨论如何克服市场的缺失。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虽然从竞争不完全、外部性、公共物品等视角,以更加技术化的手段,分析了市场经济的不足,但并不涉及义的问题,开出的药方则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些思想和分析,虽然各有贡献,但都有所缺失,即缺失了义治这个灵魂。而将墨子的义治市场经济思想,与现代法治市场经济理念结合起来,对于市场经济在未来如何更好地发展下去,更大程度地增进人类福祉,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未来的市场经济,是义法市场经济。义法市场经济,必定是正义程度更高的市场经济。义法市场经济,不但可以使市场经济更加健康,而且也因为更加健康,从而使市场经济得到更多拥护和欢迎,并变得更加安全。

毋庸讳言,“义”是一个边界并不非常清晰的复杂概念,墨子之义作为概念不但过于简约而且也有一些含混性。但即使现代的正义概念,也存在类似问题。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界定,不但不能覆盖现实中的复杂情境,而且他的正义理论在其晚年与中年存在不少差异。而印度经济学家森对正义的理解与罗尔斯又有所不同。墨子之义,在他

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当中,应该是最接近现代的正义理念的思想了。罗尔斯阐述了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24]54-117}显然,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基于一种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思维。是墨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其他中国古代重要思想,与罗尔斯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墨子更加关注在形式公平之下,如何使弱者免受强者的伤害,如何使智商低的人免受智商高的人的伤害。因此,墨子思想的现代性显而易见。墨子思想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典时代出现,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不合时宜地早熟。如果硬要说是思想早熟,那不过是为当时的恶劣社会惯性压制人们的基本权利、基本自由和基本思考作开脱,为太多的人缺乏反抗精神和改革意识找借口。

五、结 语

很有可能的是,大多数人对于市场经济既抱有天然的接受感,也抱有本能的反感。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天然接受感压倒了对本能反感,从而拥护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在顶尖思想家当中,颂扬并倡导市场经济的人物,应该是凤毛麟角,因为思想家要使其思想传世,不但要依靠思想的深邃,还要依靠思想的貌似高尚,而与私利和贪欲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无论如何都算不上高尚,尤其在古典时代更不可能被人视为高尚。更何况,现实当中的确有一些人很容易以不义手段,从市场上获取私利、挥洒贪欲。但是墨子却在尚贤、修身、贵义的同时,提倡市场经济,这在先秦时代算是一个思想奇观。说墨子是一个义治市场经济思想家,毫不为过。当然,在墨子思想中确实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所以《庄子》感叹:“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但是“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庄子·天下》)。而墨子自己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明确强调,符合天志的事情,如果能得到国君的大力倡导和人们的身体力行,则会“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墨子·兼爱下》),而兼爱交利的义治市场经

济,既然“有利且易为也”(《墨子·兼爱下》),就没有道理不能实行。这无疑反映了他对义治市场经济的信心和执着。即使在法治市场经济理念得到许多人认同的今天,墨子义治市场经济思想之光仍然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 墨子学案 [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8.
- [2]郭沫若. 墨子的思想 [M]//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3][奥地利] 路德维希·米塞斯. 人的行为 [M]. 夏道平,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 [4][英] 杰弗里·霍奇森. 资本主义的本质: 制度、演化和未来 [M]. 张林,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5][美] 曼瑟·奥尔森. 权力与繁荣 [M]. 苏长和, 嵇飞,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6]吴敬琏.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7][美] 威廉·戈兹曼. 千年金融史 [M]. 张亚光, 熊金武,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9]何勤华, 主编. 外国法制史 [M]. 6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 [10][美]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 [美] 斯坦利·L. 恩格尔曼. 苦难的时代: 美国奴隶制经济学 [M]. 颜色,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 [11][美] 彭慕兰, [美] 史蒂文·托皮克. 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 [M]. 黄中宪, 吴莉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12][美] 史蒂文·迪纳. 非常时代: 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 [M]. 萧易,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3][印] 阿玛蒂亚·森.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M]. 李风华, 陈昌升, 袁德良,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 [14][美] 迈克尔·桑德尔. 金钱不能买什么: 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 [M]. 邓正来,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2.
- [15]李零. 丧家狗——我读《论语》(附录)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16]秋风. 儒家式现代秩序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17][美] 巴里·温加斯特. 作为治理结构的宪政: 安全市场的政治基础 [M]// 道格拉斯·诺斯, 等. 交易费用政治学. 刘亚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18][英] 艾伦·麦克法兰. 现代世界的诞生 [M]. 管可秣,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19]吴经熊. 正义之源泉: 自然法研究 [M]. 张薇薇,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5.
- [20]史丹彪. 自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律文明的影响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21][古罗马] 西塞罗. 国家篇 法律篇 [M]. 沈叔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2][英] 冯·米瑟斯.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M]. 韩光明,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23]Hayek, F.,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pp519-530, 1945.
- [24][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郭彦英]

Mozi's Market Economy Thought of Governance by Justice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ZHANG Wenkui

(Enterprise Research Institut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Abstract: Mozi's thought has clear market logic and pro-market contents. Liang Qichao has misunderstood Mozi's thought. Mozi emphasizes justice very much and believes that "Justice is above all issues". In general, Mozi has market economy thought of governance by justice which can enlighten the blind zone of market economy thought of governance by law. The latter itself cannot avoid many unjust market behaviors, and, historically, it is accompanied by sexism, slave labor and even slave trade, and violent economic activities. Even today,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thought of natural law to the justice of governance by law. Accordingly, Mozi's market economy thought of governance by law has modern significance. The future market economy must be one governed by both justice and law.

Key Words: Mozi; market economy; market economy governed by both justice and law; justice; governance by law

从国际视角看全面小康后我国的相对贫困标准

杨正位¹ 马海龙² 孟灵修¹

(1.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 北京 100731;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 北京 100091)

摘要:世界及各国贫困标准都是动态调整的,世界银行已调整了4次,我国已调整了3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反贫工作重心将从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可采用3.2美元—5.5美元的相对贫困标准,这既符合我国国情,也符合中高收入国家一般贫困线的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也应及早纳入我国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并争取到21世纪中叶降至0.38左右,以促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国还可加强国际减贫合作,与联合国机构共同测算并发布世界基尼系数,争取使后者从现在的0.7降至二三十年后的0.6左右,以此作为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

关键词:相对贫困标准;反贫困;基尼系数;世界基尼系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在迎来建党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1]20}“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2]12}“十四五”

时期,我国减贫工作面临战略转型,一个重点任务是界定和治理相对贫困。本文拟从国内外贫困标准比较的视角,对我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和建议。

一、世界各国贫困标准不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标准互为补充

国际贫困标准既有世界银行的建议标准,也有各国的自定标准,而且是动态调整、不断提高的。

收稿日期:2022-01-28

作者简介:杨正位,男,四川大英人,经济学博士,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海龙,男,山西隰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二级调研员、副教授;孟灵修,女,辽宁本溪人,商务部政策研究室贸易处主任科员。

发展中国家多数采取绝对贫困标准,绝对贫困率可高达 30%;发达国家则采取相对贫困标准,贫困率在 10%—20% 不等。

(一) 国际贫困线不断提高

世界银行发布的贫困线是公认的国际标准,分为绝对贫困线和一般贫困线,前者公布了 4 次,后者公布了 2 次。1990 年,世界银行根据 12 个最穷国家的情况,采用购买力平价法,制定了绝对贫困线,即每人每天生活费 1.01 美元;1994 年、2008 年、2015 年又先后调整为 1.08 美元、1.25 美元、1.9 美元。2008 年,世界银行根据 75 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标准中位数,首次制定了 2 美元的一般贫困线,2015 年针对中低和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分别制定了 3.2 美元和 5.5 美元的一般贫困线。

表 1. 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

发布年份 (基期)	绝对贫困标准		一般贫困标准	
	数值 (美元 / 天·人)	测算方法	数值 (美元 / 天·人)	收入水平
1990 (1985)	1.01	12 个最穷国的 最高标准		
1994 (1993)	1.08	10 个最穷国的 平均标准		
2008 (2005)	1.25	15 个最穷国的 平均标准	2.0	中低收入 国家
2015 (2011)	1.90	15 个最穷国的 平均标准	3.2	中低收入 国家
			5.5	中高收入 国家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按照 1.9 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世界贫困人口从 1981 年的 20 亿减少到 2015 年的 7.4 亿左右,贫困率从 44% 降至 10%;其中,高收入国家贫困率为零,中高收入国家从 63% 降至 2%,中低收入国家从 51% 降至 14%,低收入国家从 70% 降至 42%。如果按照 3.2 美元的一般贫困标准,全球贫困人口数量更大,超过了全球总人口的 1/4。世界银行 2015 年最新一次统计显示,按此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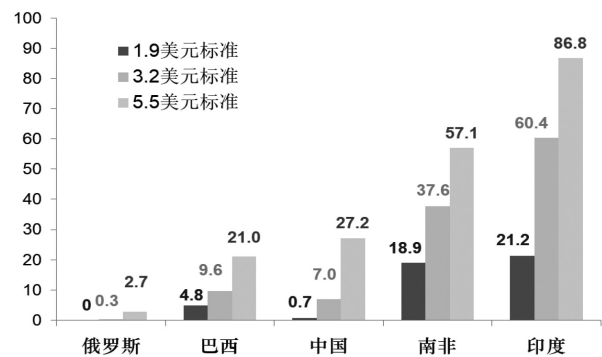


图 1. 按国际标准衡量的主要国家贫困率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各国最新数据。

9550 万,印度为 6.6 亿。1978—2018 年,中国减贫约 8.5 亿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

(二)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标准多数都高于国际贫困线标准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绝对贫困指标,主要根据每人每天须摄入的热量,换算成食品及相应的货币收入。例如,印度针对城市和农村制定了不同的贫困线,最新标准为农村每人每天 32 卢比,城市 47 卢比;按此标准,全国贫困人口为 3.6 亿,贫困率为 29.5%。巴西有两条贫困线,即贫困线和绝对贫困线,前者是当前最低工资的 1/2,后者是当前最低工资的 1/4。埃及根据家庭调查确定贫困线,低于全国人均支出 1/3 的为绝对贫困,低于 2/3 的为相对贫困。由于世界银行 2015 年制定的 1.9 美元绝对贫困标准是按照最穷 15 国的平均数计算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贫困标准都明显要高于国际标准,如南非、俄罗斯、巴西国内标准下的贫困率与国际标准相比,分别高出约 30 个、10 个、4 个百分点。印度和我国的贫困标准则与国际标准接近。

(三) 发达国家采用相对贫困标准

虽然高收入国家已经没有世界银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但各国立足自身国情,制定了相对贫困标准。

美国制定了贫困线和贫困指导线两个标准。贫困线由人口普查局发布,依据家庭人数、18 岁以下成员数、家庭收入来确定,共分九个层级。按照美国当前贫困标准,1—9 人的家庭,贫困线为年收入 12784 美元到 51393 美元,每人每天大约为 15 美元—35 美元。例如,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年收入在 25926 美元以下则为贫困家庭。按此标准,

2018年美国贫困率为11.8%,贫困人口为3815万。贫困指导线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布,是贫困线的简版,根据家庭人数制定,主要用于管理,以此来决定是否给予联邦项目援助。2020年美国贫困指导线为1人家庭12760美元,8人家庭44120美元,8人以上家庭每增加1人,提高4480美元,相当于每人每天12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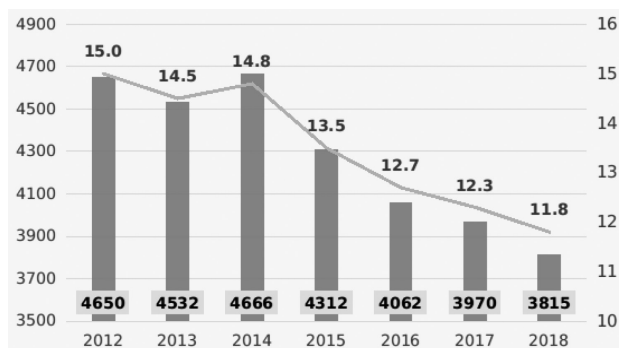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的贫困人口(万人)和贫困率(%)

数据来源: 美国人口普查局。

欧盟各国将全国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的60%作为贫困线。欧盟采用相对贫困指标,各国贫困线因发展水平高低而不同。例如,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2018年贫困线最高的是瑞士,为54196欧元;最低的是罗马尼亚,为4138欧元。按照各国标准,2018年欧盟28国共有8620万贫困人口,贫困率为17.1%。分国别看,欧洲各国中东欧国家贫困较为严重,贫困率最高的是塞尔维亚,高达24.3%;债务缠身的南欧国家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贫困率分别为21.5%、18.5%和20.3%;西欧和北欧国家贫困率相对较低,冰岛为14.9%,法国为13.4%,英国为18.9%,德国为16.0%。

日本将全国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贫困线。最新相对贫困线为家庭年收入122万日元左右(约7.8万元人民币),相对贫困率达15.6%,每6人当中就有1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比较全球各类贫困标准,可以看出:

第一,贫困既有绝对贫困,又有相对贫困。前者指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后者指无法过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绝对贫困可以消除,相对贫困长期存在。如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已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率仍高达15%左右。

第二,贫困标准是立足国情的。各国贫困标准的制定,综合考虑财力、收入水平、生存需要等因

素,因国情不同而标准各异。穷国多以基本生存需要为线,而富国还要考虑过上“体面生活”。如欧盟将每隔一天才能吃到鱼、肉等,不能每年外出休假一周也视为贫困。此外,穷国对城乡、区域分设贫困标准,富国则多为统一标准。

第三,贫困标准是动态调整、逐步提高的。各国贫困标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调整,考虑因素越来越多。多数国家定期调查,适时调整贫困标准。贫困测度也从单维转向多维,开始以食品需要为主,后来增加了住房、教育和交通等需求,现在将一些非收入和消费支出也纳入考量。例如,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补助项目包括学校补助、食品补助、燃气补助和食品券等;欧盟把“社会排斥”也作为贫困统计需考虑的因素,使实际贫困率从17%提高到24%。

二、我国贫困标准日趋科学, 脱贫成就举世瞩目

我国贫困标准不断提高,自1986年以来共制定了3次贫困标准;我国减贫成效十分显著,精准扶贫成为我国在全球引以为傲的“最佳实践”。联合国报告认为,“中国在全球减贫中发挥了核心作用”。^[3]

(一) 第一阶段(1986—2000年),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基本温饱

1986年,我国首次制定贫困标准。该标准采用恩格尔系数法,以每人每天2100大卡路里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折成收入,测算出1985年我国农村贫困标准为人均纯收入206元,按此标准,当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1.25亿。此后,贫困标准依据物价变动逐年调整,1994年为440元,以此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力争用7年左右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0年,按农民人均纯收入625元的贫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3209万,贫困发生率降至3.5%,该计划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二) 第二阶段(2001—2010年),进一步兼顾非食品需求

2001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要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

温饱问题,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为此,国家调整了扶贫标准,在保留1986年贫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低收入标准,计算了部分非食品需求,将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65元定为低收入标准,对应的贫困人口为9423万。2008年底,国家将低收入标准明确为扶贫标准,该标准在当年为人均纯收入1196元,2010年提高到1274元,对应的贫困人口为2688万,比2000年减少了6735万,贫困发生率降至2.8%。《纲要》确定的目标基本实现。

(三) 第三阶段(2011—2020年),向“两不愁、三保障”稳步推进

2011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贫困人口解决温饱并适度发展的要求以及政府财力的基础上,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扶贫标准,比2008年提高了92.3%。按此标准,2012年底我国贫困人口扩大到9899万,贫困发生率升至10.2%。至2019年底,贫困人口减至551万,贫困发生率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高,“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

我国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的现行标准,是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的2300元。国家统计局自2010年后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扶贫标准作年度调整。比如,2015年我国曾公布2855元的扶贫标准,这是最低扶贫标准。据国务院扶贫办调研,对于新脱贫边缘人口,5000元是“危险线”,一旦低于此线,就容易再次陷入绝对贫困。

表2. 我国贫困标准的变化

年份	1986年标准 (元)	2001年标准 (元)	2011年标准 (元)
1985	206		
2000	625	865	
2007	785	1067	
2008		1196	
2010		1274	2300
2015			2855
2018			(2995)
2020			(5000)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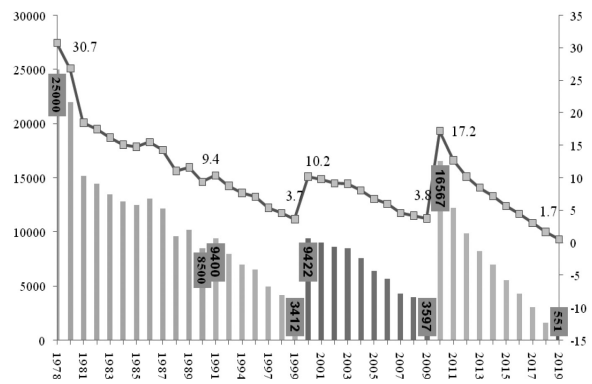


图3. 我国不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万人)和贫困发生率(%)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综合比较国际、国内贫困标准,可以看出:

第一,我国现行标准符合国情与承受能力,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我国动态调整贫困标准,充分考虑了财力和扶贫目标群体,在基本消除1978年和2008年标准下贫困人口的基础上,现行标准所代表的生活水平,基本保证了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

第二,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逐步衔接。我国制定的前两个贫困标准明显低于国际标准。目前我国2300元的贫困标准,按世界银行测算相当于每人每天2.3美元,已高于1.9美元的国际绝对贫困标准。

第三,适时提高标准利国利民。我国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276美元,是发达国家的1/5左右,迈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历史性成就。我们测算,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达到美国的1/3至1/2。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标准还有提高空间。这对内可使人民受益,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外则可有力驳斥“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谬论,同时也有利于我国争取国际主动,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如按5.5美元的相对贫困标准,则2010年贫困率为53.4%,此后年均下降5.2个百分点,到2015年为27.2%;如果2015年后年均下降4个百分点,到2020年贫困率将只有7%左右,相对贫困人口也就是1亿左右,这符合我国过去3次制定贫困标准时,将最终贫困人口定为1亿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我国2000年贫困标准是1985年的4.2倍,2010年贫困标准是2000年的2.7倍,如果2020年贫困标准近5.5美元,将

是2010年2.3美元的2.4倍,也算是适中的标准。所以,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后,采用的相对贫困标准可介于世界银行推荐的3.2美元—5.5美元之间。如果更多地考虑完成新的减贫任务,可采用接近于3.2美元的标准;如果更多地考虑其统计意义并与国际衔接,可采用接近于5.5美元的标准。从横向比较看,即使我国相对贫困率在7%—10%,在国际上也不算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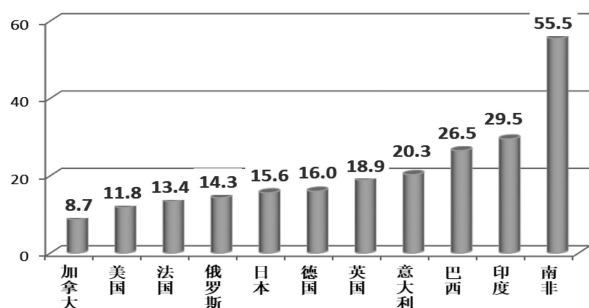


图4. 按本国贫困线衡量的主要国家贫困率(%)

数据来源: 各国统计局最新数据。

三、基尼系数应作为衡量相对贫困的重要指标

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后,未来15年将进入减少相对贫困阶段,并逐步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相对贫困是基于收入差距的一种贫困类型,基尼系数作为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指标,也可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衡量相对贫困的主要参考指标。

多数国家都定期发布基尼系数来反映国内贫富差距状况。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说明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是警戒线;0.4—0.5之间为差距过大;0.5—0.6之间为差距悬殊;0.6以上表示比较危险。

(一) 从我国40多年的发展看,基尼系数呈倒U型,目前略偏高并趋于下降

改革开放打破了绝对平均主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25,到90年代初期已经达到0.42。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基尼系数从0.469升至2008年的最高点0.491,此后缓慢下降,2015年降至0.462,此后三年有所回升,2018年为0.468,2019年又降至0.465。世界银行认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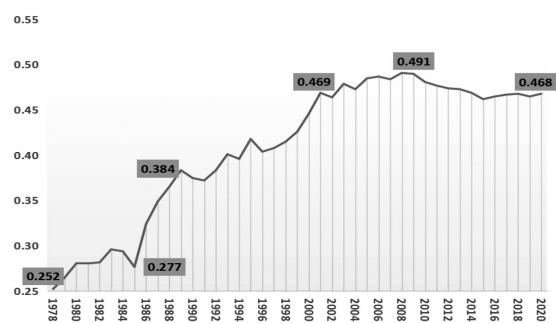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从我国发展实际情况看,这种变化具有一定合理性:

一是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我国实现了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且带动更多人脱贫致富。这种收入差距不等于收入不公,而是消灭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前进的鞭策。

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化的正常反映。市场竞争具有“马太效应”,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结果。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曲线”理论认为在市场化、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为“先扩大,后缩小”。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出现阶段性收入差距扩大有其经济合理性。

三是缩小差距政策既及时又适度。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两个大局”构想也是邓小平定下的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从多方面缩小发展差距与贫富差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转移支付等政策实施力度加大,对控制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贡献重大;加之农村劳动力流动、农业税减免、农民变市民等一系列缩小差距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效遏制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我国基尼系数于2008年后趋降。

(二) 从国家(地区)比较看,基尼系数高低与社会稳定安宁密切相关

根据世界银行、哈佛大学 SWIID 数据库统计数据,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见附表)分布情况如下。

(1) 0.3以下共有20个,北欧及独联体国家各占一半。前者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高,社保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至 1/3, 调节后贫富差距较小; 后者产业结构单一, 经济发展活力不足。

(2) 0.3—0.4 之间共有 74 个, 以发达国家为主, 其中英国、法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均在 0.3—0.35 区间。

(3) 0.4—0.5 之间共有 45 个, 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智利、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大于 0.4, 财富集中度较高。

(4) 大于 0.5 的共有 14 个, 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南美各国受新自由主义影响, 社会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

(5) 全球最低的是乌克兰, 为 0.25; 最高的是南非, 为 0.63。这 153 个国家和地区的算术平均数为 0.383。

(6) 历史地看, 过去 20 年发展中国家的高基尼系数国家有所减少, 比如据《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 基尼系数超过 0.6 的有 4 个, 最高的纳米比亚达到 0.74, 现在超过 0.6 的仅有南非。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则有所上升, 比如日本、德国及部分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提高了 4—7 个基点左右, 日本从 0.25 提高到 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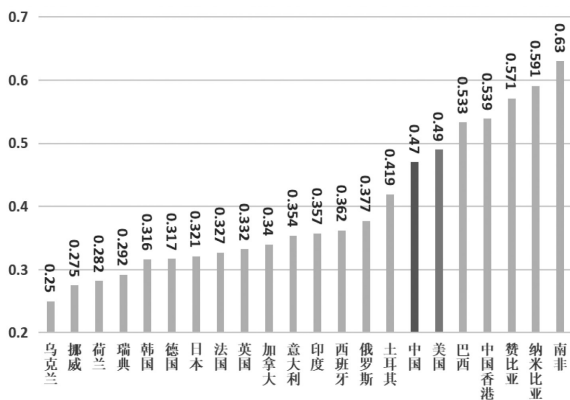


图 6. 部分国家（地区）基尼系数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商务部。

基尼系数过高的外在体现是社会不稳、政局动荡、民生凋敝。从发展中国家看, 拉美和非洲国家基尼系数高, 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情况也多。从发达经济体看, 基尼系数总体较低, 在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前 50 个经济体中, 基尼系数排前三位的是美国 (0.49)、智利 (0.47) 和中国香港 (0.54), 而它们在 2019 年正好是反全球化或动荡之地。这看似巧合, 实有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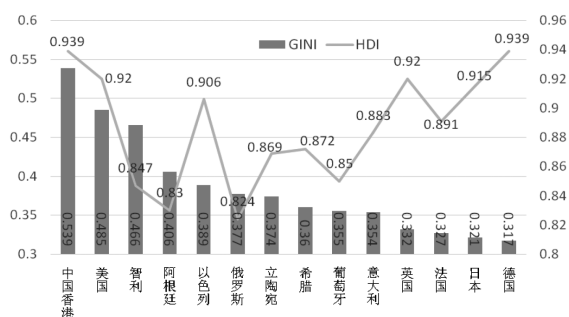


图 7. 部分人类发展指数前 50 名国家（地区）的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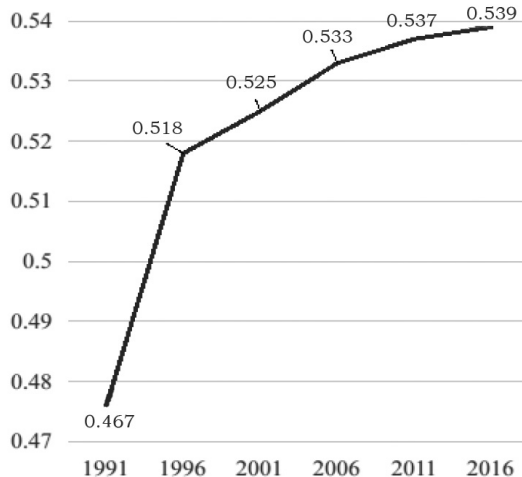


图 8. 中国香港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发达国家中, 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比较突出。美国基尼系数在 1929 年大萧条前夕高达 0.49, 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都在 0.36—0.39 之间低位徘徊, 80 年代后持续上升, 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上升到 0.47, 2018 年进一步上升到 0.485。总体来看, 贫富差距过大也是美国两次严重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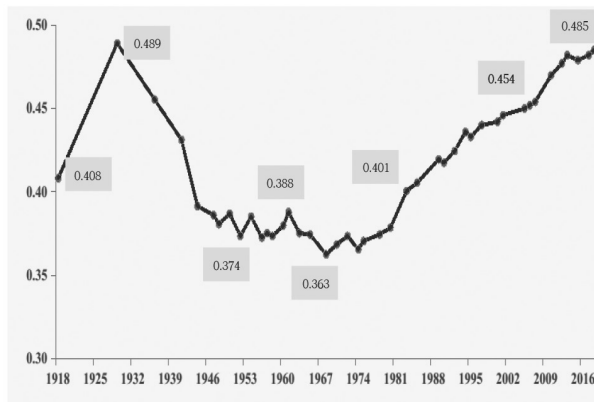


图 9. 美国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

相反, 北欧发达国家作为高福利国家的代表,

倡导“公平为主、兼顾效率”,多数国家基尼系数低于0.3,社会鸿沟小,发展相对和谐。西欧、日韩的基尼系数也比较低,基本都在0.35以下。

(三)从世界基尼系数看,全球贫富差距处于“危险”阶段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和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两次强调,“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4],[5]}要“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4]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是全球关注的发展问题。虽然多数国家都定期发布基尼系数以反映国内贫富差距情况,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从未正式发布世界基尼系数。

我们借鉴世界银行专家拉克纳(Lakner,2016.8)和米兰诺维奇(Milanovic,2009.9)等的研究,依据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有收入分组数的146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测算了2000年以来的世界基尼系数。这一系数总体上在0.694—0.788之间,仍然非常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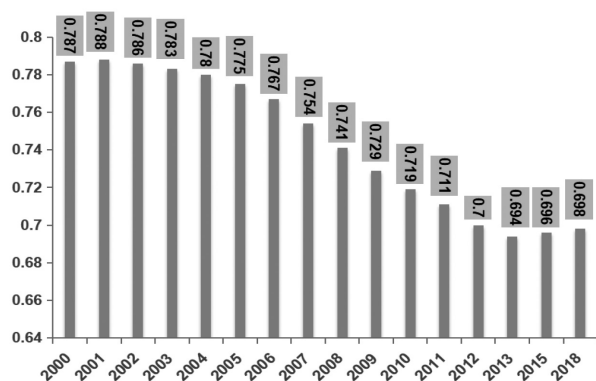


图 10. 世界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原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统计局课题组。

一是世界贫富差距触目惊心。世界基尼系数畸高,2000—2018年平均高达0.74左右,接近全球各国平均值的1.8倍,并且高于贫富差距最大的南非的0.63。最高/最低收入倍数也证明全球贫富差距过大,个别年份如2013年全球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为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65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人均收入为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132倍。

二是全球“南升北降”推动世界基尼系数平缓下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金砖国家等新

兴经济体群体崛起,国际格局“南升北降”,加之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世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787下滑至2013年的0.694,近年又略有回升。

三是全球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全球贫富差距过大,既有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因素,也有全球经济治理不完善的因素。各国税后基尼系数要比税前低0.15—0.2个百分点,而全球无税收、无转移支付、无扶贫政策,更无中国式的对口支援,“国”与“不国”差异很大。在全球化过程中,各国获益不平衡、国家内的获益也不平衡,受损者或自认为的受损者就会起而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所以,习近平主席强调要缩小世界发展赤字,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无疑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

综上所述:

第一,基尼系数过高或过低都不好。基尼系数过低,或过度高福利,容易使经济发展缺少活力;基尼系数过高,贫富差距过大,则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合理的基尼系数目标应适应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制定时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认真权衡。

第二,我国基尼系数还有下调空间。各国可随发展阶段的变化,及时调节基尼系数高低,使之保持在适度、合理水平。考虑到我国地区差异、国民心态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宗旨,如果基尼系数从当前的0.47缓慢下降到2050年的0.38左右,则比较理想,而且也与世界基尼系数算术平均数0.383的水平接近。

第三,应缩小全球贫富差距过大的发展鸿沟,占领道义制高点。0.7—0.8的世界基尼系数,表明全球贫富差距巨大,这种贫富悬殊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是不可容忍的。发展鸿沟、发展赤字的存在是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缩小贫富鸿沟、减少矛盾冲突,应努力降低世界基尼系数,而目前近0.7的基尼系数还有较大下降和调节空间。考虑到没有世界政府和世界转移支付,不可能将基尼系数再调低0.15—0.20,今后二三十年,将世界基尼系数降到0.6左右,可算是一个相对合意的目标。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推动国际社会为之共同努力,并将之纳入世界发展议程,为我国争取更大话语权。

四、建议我国采用 3.2 美元—5.5 美元的相对贫困标准, 将基尼系数纳入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与联合国机构共同发布世界基尼系数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我国反贫困工作已站在新起点上, 工作重心从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 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2][12]} 针对主要矛盾变化, 抓住减少相对贫困这一工作重点, 理清工作思路, 初步建议如下:

第一, 适时适度提高相对贫困标准, 可采用国际认可的 3.2 美元—5.5 美元的新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实事求是, 就能兴党兴国”,^[6] 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2][12]} 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已处于中上收入国家行列的实际, 可考虑借鉴世界银行推荐的贫困标准。按相对贫困人口 1 亿人左右倒推, 可将标准提高到 3.2 美元—5.5 美元之间; 而如按相对贫困率在 10% 以内推算, 5.5 美元的标准也在备选之列。但究竟是 3.2 美元、4.5 美元还是 5.5 美元更好, 需要根据国家战略优先项仔细权衡。制定一个新标准, 应既有利于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地位, 也有利于我国把握国际战略主动。

第二, 可将基尼系数纳入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体现在每一个五年规划之中。 贫富差距适度非常重要, 过大或过小都会损害经济健康和社会稳定。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略大, 可考虑在以后的规划中, 适时纳入基尼系数指标, 这在起到宏观导向作用的同时, 也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建议到“十四五”规划完成时, 我国将基尼系数稳定在 0.45 左右, 此后在每一个五年规划中降 0.01 左右, 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时降至 0.38 左右。这样, 就可把“先富—后富—共富”辩证地统一起来, 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第三, 倡议共同核算世界基尼系数, 致力于缩小全球贫富差距。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 从未正式计算、发布世界基尼系数, 这

不排除有其利益考量。即使如米兰诺维奇等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学者对世界基尼系数作过学术测算, 相关数据也没有正式发布。我国可动员国内统计专家力量, 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 共同测算并发布权威的全球贫富差距指标——世界基尼系数, 以推动缩小全球发展鸿沟, 减少全球化阻力, 减少全球不安定因素。经初步测算, 二三十年后, 将世界基尼系数降至 0.6 左右是相对理想的目标。我国可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将其列入联合国相关工作议程。

第四, 扩大国际减贫合作, 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减贫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精准扶贫是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目标的唯一途径, 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我国可把分享减贫和发展经验、促进国际多双边合作作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能力的抓手。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 促进世界经济更加开放,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以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来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同时, 推动发展问题上的南北合作, 促进形成国际合力, 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 赢得战略主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2 月 25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 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 年 3 月 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3]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5 [R/OL]. [https://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https://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
- [4] 习近平.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 (2016 年 9 月 4 日, 杭州) [N]. 人民日报, 2016-09-05.
- [5] 习近平. 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6 年 9 月 3 日, 杭州) [N]. 人民日报, 2016-09-04.
- [6] 习近平.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N]. 学习时报, 2012-05-28.

[责任编辑 张 华]

(转至第 107 页)

附表. 全球 153 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					
国家(地区)	基尼系数	国家(地区)	基尼系数	国家(地区)	基尼系数
< 0.3 (20 个)		塔吉克斯坦	0.340	巴布亚新几内亚	0.419
乌克兰	0.250	拉脱维亚	0.342	刚果(金)	0.421
斯洛文尼亚	0.254	尼日尔	0.343	马达加斯加	0.426
白俄罗斯	0.254	埃塞俄比亚	0.350	安哥拉	0.427
捷克	0.259	0.35—0.4 (38 个)		乌干达	0.428
摩尔多瓦	0.259	越南	0.353	尼日利亚	0.430
斯洛伐克	0.265	利比里亚	0.353	多哥	0.431
芬兰	0.271	布基纳法索	0.353	津巴布韦	0.432
吉尔吉斯斯坦	0.273	意大利	0.354	秘鲁	0.433
挪威	0.275	苏丹	0.354	乍得	0.433
哈萨克斯坦	0.275	葡萄牙	0.355	加纳	0.435
阿尔及利亚	0.276	北马其顿	0.356	卢旺达	0.437
比利时	0.277	澳大利亚	0.358	玻利维亚	0.440
冰岛	0.278	罗马尼亚	0.359	菲律宾	0.444
荷兰	0.282	冈比亚	0.359	厄瓜多尔	0.447
丹麦	0.282	希腊	0.360	马拉维	0.447
东帝汶	0.287	西班牙	0.362	0.45—0.5 (19 个)	
阿尔巴尼亚	0.290	老挝	0.364	科摩罗	0.453
瑞典	0.292	泰国	0.365	多米尼加	0.457
马耳他	0.294	斐济	0.367	新加坡	0.458
伊拉克	0.295	也门	0.367	尼加拉瓜	0.462
0.3—0.35 (36 个)		所罗门群岛	0.371	南苏丹	0.463
匈牙利	0.304	立陶宛	0.374	智利	0.466
奥地利	0.305	保加利亚	0.374	喀麦隆	0.466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308	不丹	0.374	中国	0.468
克罗地亚	0.311	汤加	0.376	塞舌尔	0.468
韩国	0.316	瓦努阿图	0.376	佛得角	0.472
德国	0.317	俄罗斯	0.377	贝宁	0.478
波兰	0.318	坦桑尼亚	0.378	墨西哥	0.483
爱尔兰	0.318	格鲁吉亚	0.379	哥斯达黎加	0.483
黎巴嫩	0.318	加蓬	0.380	危地马拉	0.483
埃及	0.318	萨尔瓦多	0.380	美国	0.485
黑山	0.319	印度尼西亚	0.381	巴拉圭	0.488
日本	0.321	缅甸	0.381	刚果(布)	0.489
瑞士	0.323	马尔代夫	0.384	哥伦比亚	0.497
蒙古	0.323	毛里求斯	0.385	巴拿马	0.499
孟加拉国	0.324	布隆迪	0.386	0.5—0.6 (13 个)	
毛里塔尼亚	0.326	萨摩亚	0.387	洪都拉斯	0.505
法国	0.327	以色列	0.389	几内亚比绍	0.507
爱沙尼亚	0.327	乌拉圭	0.395	印度	0.509
突尼斯	0.328	摩洛哥	0.395	圣卢西亚	0.512
尼泊尔	0.328	塞尔维亚	0.396	斯威士兰	0.515
波黑	0.330	斯里兰卡	0.398	巴西	0.533
马里	0.330	0.4—0.45 (26 个)		博茨瓦纳	0.533
英国	0.332	伊朗	0.400	中国香港	0.539
巴基斯坦	0.33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401	莫桑比克	0.540
亚美尼亚	0.336	塞内加尔	0.403	莱索托	0.542
约旦	0.337	肯尼亚	0.408	中非	0.562
巴勒斯坦	0.337	马来西亚	0.410	赞比亚	0.571
几内亚	0.337	海地	0.411	纳米比亚	0.591
卢森堡	0.338	阿根廷	0.412	> 0.6 (1 个)	
加拿大	0.340	科特迪瓦	0.415	南非	0.630
塞浦路斯	0.340	吉布提	0.416	总平均值	0.383
塞拉利昂	0.340	土耳其	0.419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各国家(地区)统计机构、哈佛 SWIID 数据库。